

炎黄春秋

第 **5** 期
2005年

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

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记略

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

阎明复：我亲见的康生

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

目 录

春秋笔

- 1 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张培森
6 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徐庆全

人物志

- 13 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阎红彦.....袁子清
20 冯雪峰坎坷的一生.....季音
25 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杨秉鉴

求实篇

- 28 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丛进
32 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谜.....章立凡

一家言

- 36 论政党执政文明与党政分开.....许耀桐

亲历记

- 40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阎明复
46 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记略.....吴江

往事录

- 49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范丽红
54 汪精卫卖国文字是如何披露出来的.....王鹏
58 抗战时一场气象情报争夺战.....蔡天新

怀人篇

- 62 郑重治史 惠泽吾辈
——怀念父亲郑惠.....呼燕燕 等
66 我的老伴金如柏.....郑织文

品书斋

- 70 政治史意义下的文学史写作
——《周扬与冯雪峰》序言.....周巍峙

沉思录

- 74 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苏育英 郭谟侠

古今谈

- 77 长城 汉字 黄河 长江.....官伟勋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征
冯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庄 李普 李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锲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实 徐孔(常务)
杨继绳 吴思

执行主编: 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4.80元

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

● 张培森

张闻天一生追求真理,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思想遗产。而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则是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遗产中的一大亮点。在全党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研究一下张闻天的这份遗产自然是会有所裨益的。

19岁提出“健全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

这是青年张闻天1919年7月11日在一篇题为“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文章中提出的。这时他还是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的一名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已经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觉醒起来的张闻天积极投身运动,群众斗争高潮刚过,便写下了这篇他早年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文章的独到之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都还热衷于“忠告运动”、“呼声革命”等改良主张的时候,这位19岁的青年学子却鲜明发出从根本上“废除”军阀统治,建设“健全的民主共和国”的呼唤。

那么这个“健全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又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他在紧接着发表的另一篇题为《中华民国平民主义》中作了回答,指出:“在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所以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所以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还说:“于法律范围内,人人自由,各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各具独立自主的能力。分子发达,国家亦发达了。”

张闻天的上述这个政治理想应该说恰恰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一致。虽然

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历史的安排,却正是这位当初抱定这样理想的19岁的青年学子,后来成了中共党史上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任总书记。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经过28年奋斗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却又经历过那么多的曲折和教训,以至今天还在为完善一个“健全的民主共和国”而作不断的努力。

旧的思想系统不破,类似的旧制度还能够重新被创造出来

党成立不久,1922年春作为当时还是一名党外人士的张闻天,同党的一大代表之一的李汉俊,在报刊上就中国近代社会长期“纷乱”造成的原因和出路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今天看来双方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分歧,不过对于张闻天,却是在他同对方商讨问题所写的一篇《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文章中,表现出他本人思想的一个飞跃,这就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这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来说明一切社会革命(文章列举了“英国的清教徒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美利坚的独立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

但文章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文中一个深刻的见解却是在这个根本原因的前提下,说到了作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他不同意李汉俊把辛亥革命前后“君主制度而立宪,立宪而共和”,以及共和至今这段历史所产生的混乱笼统地都说成是“中国进步急速的表现”。他指出:“凡纷乱而不能破坏这纷乱社会中的人民所抱的旧有‘思想系统’Idea-System,那么尽管纷乱,尽管今天提倡科学,明天提倡民主主义都是



引論

世界各國與交通一天一天的便利，所以關係也一天一天的密切了。現在這種密切的關係，在任何問題中都表示着非常明白而顯著的影響。在平常人看來，其間非但止於款款定了基礎得確的影響，及於全球洲者及於全球。此外如格的價值問題，如定立問題，如國際問題，都與世界有密切的關係。進一步說，這些各種的問題，相互間又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如定立問題與國際問題不可分割的關係。而二問題又與立問題與國際問題有密切的關係。換一句說，現在世界上，任何問題都有世界的性質。種種分類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大的問題。我們研究問題的人，第一要了世界問題，第二要了世界所包括的世界。

東方雜誌 第三十卷 第四號 張聞天

賠款與戰債

張聞天

的定立，第三要了所他種種重要問題的關係，然後對於該問題下判斷的時候，才敢有更大的關係。

這當然不是一人的事，必有多人的力量，才能有顯著的結果。一個人的力量，必是渺小的。但是我們必向從大的地方看。從小的地方看，這是一切的行動的動向。

我現在所研究的，就是這類的問題。這類的問題，與國際問題，與二個問題是相連的。這類的問題，也是複雜的問題，也是困難的問題。經濟家，銀行家，社會學家，都只解決的。現在把這一步一步說來。

倫敦會議之後

三項會議是在一九一八年之後，一九二一年之前，戰爭才了結。我們知道，這是不給世界上的現狀到這地步。

《东方》杂志发表的张闻天从美国寄回的论文

我们拥护科学如其单单拥护这些向来以为是真理的真理，结果，科学上的定律会变成宗教上的信条；那么这种拥护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我们所谓拥护科学并不是如此。我们所拥护的是科学态度，不是从科学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何谓科学的态度？着重个人的理知和经验，就是科学的态度。可见拥护由科学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确是像一般人所说的足以危害思想的自由，而拥护科学的态度正是主张个人的思想自由。科学的真精神就是个人的思想自由！”

无济于世的。由这旧有思想系统上所产生的制度，尽管崩坏，但是使这思想系统而不破坏，（他 它）还是能够重新创造出类似的制度的。”

纵观中国历史，有编年史记载的封建王朝就长达二千七百多年，而辛亥革命终结封建专制至今总算起来也还不到一百年。这样长的封建统治社会的历史，应该足够地看到其积淀的封建文化思想意识之深，是决不可能靠一朝一夕所能肃清的。否则人们就不好理解新中国成立了近 20 年，还竟然会出现将中共党员的权力公然从党章上砍去，而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总纲这样的怪事。

科学的真精神是个人的思想自由

张闻天的这个论断是在 1922 年 4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宗教运动杂谈》中提出的。所谓的“非宗教运动”，其直接背景乃是中共党领导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然而张闻天的文章却是借题发挥，其中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从哲学层面上谈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科学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他首先指出：“科学上所发现的真理是时时变换的，换句话说，就是科学本身是进化的，今天所发现的在明天不一定还是真理，今年发现的在明年也不一定是真理。”因此，接着他说：“所以

人们知道，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论”是 1905 年，而将其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则是 1916 年，1921 年（也就是张闻天写此文的前一年）他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在评价爱因斯坦这位 20 世纪伟人时称，他的“相对论”不仅对物理学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人们的真理观和道德观上也打破了绝对性，使人们“不仅是不那么相信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而且还有真理和道德的绝对性”。而张闻天这位东方学人在这里所阐述的真理观和方法论应该说与受此启发有关，其意义不可小视，不但在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史上值得书上一笔，而特别是由此而逻辑得出的鲜明的社会政治主张，对于今天我们探讨如何从体制和人文环境上保障理论和科学的创新，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党内要进行民主教育，要建立各种组织的民主制度

这是张闻天抗战时期 1940 年在一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是从 1935 年遵义会议至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不到 4 年的时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他虽然已经从总书记的岗位上主动退了下来，但有一段时间还没有离开中央核心。1940 年 6 月 10

日中央书记处一次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王明等出席的，讨论纪念抗战三周年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他在这次会上的个人发言中突出地谈了民主问题。他指出：“目前要团结抗战，这个过去说过。现在要以民主为中心问题，没有民主是不能团结进步的。”接着他就说到共产党自身的民主问题：“在我们区域中也要实行民主，因此在党内也要进行民主教育，发告同志书也号召党员学习民主，对外发表宣言，也以民主问题为中心。”最后他还特别强调说：“要全党实行民主。有的同志对于党与群众的关系尚未弄清，还不了解群众是我们的老子，反而使党成为群众的老子。”

6月20日，也就是上述发言十天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及边区某些党组织和党员存在严重的脱离群众现象时，又一次强调了民主问题，文章认为：“党必须大胆的发展党内与群众中的民主作风，建立各种组织的民主制度，发扬党内党外的自我批评，以揭发与清除各种组织内所存在的这些违反群众利益的严重现象。”

张闻天在中央会议上如此地重视和强调民主并非偶然，而是有他一贯的思想和行动基础的。早在中央苏区他就鉴于干部普遍存在强迫命令，而专门撰写了论苏维埃民主的文章，批评一些同志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看不到“苏维埃政权的德谟克拉西（民主）的一方面”。为了对付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提出苏维埃公民不但要学会如何使用选举权，而且要学会使用“召回权（罢免权）”与“改选权”。及至长征中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后，不但作风民主，被毛泽东誉为“明君”，而且初步建立了一套中央集体领导制度，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战略转变历史使命的实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上述关于民主的谈话前不久，即1940年1月在陕甘宁文代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明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特征和方向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比人们后来所熟知的方针的提法要多一个“民主的”，而他所解释的“民主的”的内容则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开始了依法办事的时期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去东北做开拓根据地的工作，担任了三年合江省省委书记，1949年4月又调任辽东省委书记。直至新中国诞生，这位曾为人民共和国奠基做出过不朽贡献的领导人仍然还在基层默默无闻地耕耘。今天人们想象不到的是，这位当年在辽东担任省委书记的领导人，竟然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三个月会说出一番现在听起来也还觉得颇为新鲜的言论。这就是他1949年12月，在辽东省委会议讨论司法工作以及辽东省人民法院召开的司法会议上，先后两次专门谈法治问题的讲话。他说：“过去我们依靠武装力量镇压反动势力，这个阶段已经结束”，“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依法办事的时期”。“我们要以法律来维护社会的稳定，用法律来保证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他还说：“将来审讯有的案件可由各方面派代表参加，这样让群众了解司法工作，同时法律的威信也可以建立起来”。“一个案子要当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来搞，以后我们要写新闻、社论、判决书。有些案子还可以巡视审判，这样来接近群众。”

现代民主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而司法的公开则又是人民政权的必然要求。张闻天以上的这番话归纳起来恰恰就是：“一要确立法律的权威，二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可是回顾建国以来在民主法制建设问题上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在一个长期只有皇权传统，而缺乏“确定无疑的法律传统”的社会，要真正做到这两点又是何等的不易。”

执政党怕的是听不到不同意见，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的空气和环境

众所周知，张闻天1959年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错误而被罢官，可是人们今天如若重新读一读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这篇发言，就会发现其中不仅有在经济问题上的铮铮陈词，而且在民主问题上更有披肝沥胆的谏言。他说：“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

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他还强调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当说到党内民主作风时，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可是没有想到就这样一篇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发言，却使他罗致十七年的冤案直至逝世。

及至罢官以后，身处逆境的张闻天不但没有中止他对民主这个问题的思考，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路线上，从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上继续探索这个问题。1961年8月他在自己私下的一份笔记（他当时已经被剥夺了党内外一切发言权）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利于党内民主，人民内部的民主。”同月他又在另一篇笔记中写道：“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民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自由争论的空气，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统治的理论，所以更需要如此。）人民思想的活跃，科学文化的繁荣，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

回想经过五七年的“反右派”，又经过五九年的“反右倾”，“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之说正在以压倒之势覆盖祖国大地的时候，张闻天的上述这番话今天读来诚可谓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而后来的事实告诉人们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是民主的大践踏，最终酿成一场空前的大浩劫，社会经济、文化的大破坏。

人民群众是主人

就在张闻天写出上述一番话不到五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革”的狂潮中，一方面大批老干部惨遭批斗、迫害，另

一方面则是林彪、四人帮一批标榜“高举”的新贵们大搞特权，恣意横行。人们当然没有料到，就在“文革”进行到第五个年头，1971年发生了林彪这个疯狂鼓吹个人崇拜的总代表、已经被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叛逃的9·13事件。也就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流放在广东肇庆的张闻天又写下了《人民群众是主人》这篇文稿。

文稿中最有警示意义的一段话这样写道：“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为何在执政条件下领导者容易犯脱离群众的错误？文稿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领导者在观念上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由于党是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党的领导干部“地位特殊，工作特殊，生活也特殊”，因而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主人，而群众则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人民群众方面也往往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把党的领导者看作是“救世主”，再加上看到领导者“有权有势”，唯恐得罪他们而遭受惩处或迫害。为此文稿郑重指出：“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文稿还根据党处于执政这一条件的变化，对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在这个领导方法中，必须自始至终贯彻着人民群众是主人，而党不过是勤务员的根本观点。”“‘从群众中来’，只有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即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的讨论，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各种意见，才有可能做到。没有民主，‘从群众中来’就会变成空谈。”

张闻天30多年前写下的这些话，可以说是这位老革命家对包括“文革”在内建国以来前20多年整个党执政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思考的总结。今天距离张闻天撰写这篇文稿又过去了30多年，应当承认这30多年我们党在改善党的领导 and 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也要看到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有着深厚土壤的国度里，要建设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还是

任重而道远。如果不忘记历史经验教训的话,老革命家张闻天留给我们的这番遗训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重要警示的意义。

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

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所谓执政党的执政,是指执政党依据宪法和法律,组织、调控和操作国家政权机器,通过政权机构处理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活动。由于国家政权是法制机构,因此执政党的执政,除了从政党本身的角度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外,而从领导政府的角度而言,更多的也是更重要的是法治活动。可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一个教训是往往习惯于执政前的一套工作方式,把党的政治领导方式和政治斗争手段简单地照搬到执政活动中去,以至长期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而张闻天早在30年代中央苏区时就批评过那种由党直接包办政权工作,或者把它当作“无关紧要”而对其“根本不理”的错误倾向。建国以后他早就对把人民代表大会只当作一种形式表示不满,1971年在他写的上述《人民群众是主人》文稿中更是严厉批评了那种认为要取消这一“形式”的错误论调,指出:“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就是尊重群众的表现。把代表大会当作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就是不尊重群众的表现。”现在需要的是“充实内容”,而不是“废除形式”。两年之后他再次写下了《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1973年12月)这篇关系党的执政问题的重要文稿。

文稿开宗明义指出:“党领导着我们的国家”,“国家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的指示”;然而另一方面,“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并作出适合于群众自己的意见和需要的,并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的相应的决定、命令和法律,然后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国人民中公布施行。”而这个过程就是“党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也是党实现其对国家的领导作用时“所不能逾越的和必不可少的过程”。这是因为,虽然“党领导国家,但它本

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居于国家之上,不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的意志和决心而自己实行专政。”

那么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又究竟表现在哪里?文稿认为,“党的领导的任务,只能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众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以推动国家机关改进工作;同时,要“大量吸收、培养和提拔非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机关的各方面工作”,使“人民群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反之,“任何企图以少数人的活动,即使是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来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一定会徒劳无功的。”

最后文稿强调了国家的法纪问题,指出:“国家的一切命令和法律,对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是有效的,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应该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模范。”任何共产党员,“违反了国家的法纪,同普通群众一样,应该受到国法的制裁,决不能因为他是党员就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民主同法制不可分,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民主。联系到“文革”,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我们在50年代就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那么60年代为何连堂堂的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人身安全都保护不了,法律的权威又是何在?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政权体系的权威性和国家法纪的权威性的降低,以至有法不依盛行,何谈保障民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定发展?张闻天这里不仅严厉鞭挞了“文革”中对法制的破坏和践踏,而且深深地触及到了“文革”前我国政治体制中已经存在的严重弊端。要看到张闻天以上的这番话是在“文革”那种乌云遮日,鬼魅横行,而自身却又处于流放南疆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写的,今日读来不能不令人强烈地感到这位老革命家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以及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责任编辑 萧 徐)

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

● 徐庆全

胡绳先生 80 诞辰时，写了《八十初度》诗并一首 80 自寿铭。诗有“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句，铭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语。诗与铭对照读，颇令人感慨。孔子讲自己“三十而立”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胡绳却说自己“七十八十，粗知天命”；“惑而不解”达 30 年。这 30 年，用胡绳自己意思来说，大致“是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 1957 年到 1987 年这段时间。（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第 161 页）

李普在《悼胡绳》一文中（《炎黄春秋》2000 年第 12 期），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这一评价，与胡绳 80 自寿的诗与铭相对照，是很确切的。

现今，学者们喜欢提“某某人现象”。有现象，自然有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本质是什么？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是焉。杨继绳把这三个阶段简而言之谓“两头真”，可谓一语中的。就胡绳而言，也可归结到“两头真”现象之中。而他晚年探求真理的勇气和闪光的思想，则是“回归自我”后的“真”的本质体现。

“回归自我”的心路历程

胡绳 15 岁时，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18 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20 岁，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30 岁，写了《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这两部著作，成为四五十年代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后，这位“少年早慧”、被夏衍称之为“神童”的理论家，虽然仍时有著作问世，但当年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已不复存在。在胡绳的人生历程中，就进入了“惑而不解”的阶段。对此，胡绳自己有过概括：

从 1957 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胡绳全书》第二卷 引言）

从 1957 年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左”的倾向发展并愈演愈烈的 20 年。在这 20 年中，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困惑的，远不止胡绳一人，所以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胡绳这种“茫然”一直持续到 1987 年——“垂三十载”，又多了十年。他在与郑惠等人谈话中明确地谈到，“文革”结束，对于思想理论领域的方向问题，大约到 1987 年他在思想上才整理清楚，而这距离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晚了十年。而在这十年间，胡绳差不多有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即使写出东西来，也给他的朋友留下这样的

印象：“感到他在作文处事中那拘谨的一面大大发展了”（李普《悼胡绳》《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当然，这并不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历史大转变的十年期间，胡绳如同1957年到“文革”结束20年间一样，始终处于一成不变的困惑状态。诚如郑惠所说：“总的说来，他是伴随着形势发展的主流而逐步前进的。但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他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

在现今已经达“七十八十”而对所经历的历史有过深切思考的老前辈的回忆中，大都说自己在1978年以后多了一点独立思考，少了一点盲从，却很少提到在1978年到1987年10年大转变期间所有的困惑。作为一个著名的理论家、思想家，胡绳却坦言，自己在这10年中间“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不过，追溯一下这10年的历史背景，就可以理解，胡绳这样说，着实表现了他对历史的自省意识。

从1978年到1987年社会大转变的10年间，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有人曾这样概括说：“双年反左”，单年反右。这样的概括虽然不能说很准确，但大致说明了这10年间在大方向上的摇摆——当然，从主流上来说，一直是反左”的。

在这期间，胡绳在做什么？答案恐怕只能这样：他在思索中为“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蕴积着力量。

谈到胡绳，他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作为，一直为人所诟病。胡绳在“文革”中大部分时间是批斗对象，住过牛棚，备受摧残。可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他却犯了和“两个凡是”相关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个中最深层的原因是思想框框。1979年1月24日，胡绳在理论务虚会中谈到这一时期的认识时说：

我在反对这种说法时，自己陷入矛盾。我也认为这里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我自以为也是从实际、从政治出发来看问题的。当时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经过若干年的政治动乱，群众中存在着很大的思想纷乱，以为马列主义不灵了，毛泽东思想不灵了，社会主义不灵了，现在报刊上片面（当时我认为有片面性）强调实践的权威，同时说，马列也有错误，毛泽东也有错误，闸门一开，是值得担心的。现在看来，我这种担心是错误的。

胡绳还说：

我虽然对那十多年间的许多事情有许多带根本性的疑问，但没有勇气把它提出来，其实群众中已经提出许多疑问，并且努力加以解决，而我却总是担心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

把胡绳当作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官员、政治人物来看待，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不仅因为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还因为知识分子与文化官员这双重身份双重责任之间，又常常出现紧张的冲突与矛盾。李辉在评价周扬时指出：对于仕途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己，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都如此，姑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胡绳大致与周扬一样，也是



1998年1月，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为胡绳80寿辰举行宴会，胡绳与夫人吴全衡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切交谈

仕途中的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真理标准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对立的思潮中,胡绳当然是“从政治出发来看问题的”,但在汪东兴、李鑫(两人都是“两个凡是”的得力倡导者)领导下“毛选办公室”工作的背景,胡绳似是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使他的思想多了一些框框,即使是从政治出发看待真理标准大讨论,看待两种思潮的对立,也离不开“两个凡是”的束缚。

对于这次错误,胡绳没有替自己辩护洗刷,反而检讨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李慎之《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诸如此类的检讨,胡绳自觉地进行了很多次,理论务虚会上的检讨,就有两次。这样的检讨,不是避重就轻,而是触及灵魂的。

不能小看胡绳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影响。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这次经历,使他从此摆脱了本本和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反思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艰难地然而坚决地找回了自我。可是,对于一位仕途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像胡绳这样具备理论洞察力的人来说,找回自我值得庆幸,可是,庆幸之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困惑。

在西方,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当代的许多学者也愿意用这些西方的判断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这一行为准则,既是一个对社会认可和被社会认可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的要求原则和自我的认同标准。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前者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后者,只有具有了这种自我要求,才能做到不为世俗所影响,保持自我的批判立场和清醒的认识。但是,在中国,对于仕途上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自我要求原则和自我认同标准,还必须在“党性”的范围内,这两者时常会相互打架的。因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像周扬在《邓拓文集序言》里所说的,当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的时候,特别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情绪,从而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的时候,作为一个仕途上的知识分子,要如何面对呢?难道要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高明吗?当然不行。所以,这就

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立场是否坚持的问题了(参见叶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

胡绳在与郑惠谈到这十年的困惑时,说过这样一个例子:1985年12月,胡绳代表社会科学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汇报的题目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认定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现象十分严重,强调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动摇。而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则强调,近百年来历史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实践为依据,勇于冲破过时的论断,提出新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充实和发展。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胡耀邦对社科院汇报提纲的一些说法不以为然,很不高兴,后来这件事变得很难办,也就没有什么结果了。郑惠说,正是在此前后,胡绳说他差不多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

面对这种冲突,胡绳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不难,但作为一名官员,也就面临着难以选择的困惑。知识分子的立场判断使他不愿随波逐流,但党的纪律他也不能违背,对此他也是痛苦的。郑惠谈到的另一件事,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1987年,胡绳发表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长文,受到思想界和社会上的普遍赞扬,被誉为“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但据李慎之回忆,胡绳当年在一次社科院党组会上听到对他的赞扬时对李说:“其实我不过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胡绳这样说,当然是意味深长的。郑惠说:“这里所说的一半问题是什么?不难看出,就是指中国在按照历史的逻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之后,为什么不从容地建设新民主主义而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呢?为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又出现了那么多挫折和失误呢?胡绳在这篇长文中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此时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整理清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了。”即使在“慢慢把思想整理清楚”的1987年,胡绳行文中还必须有所顾忌,不能畅所欲言。不过,对于胡绳来说,一旦“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也就从困惑中走出来,进入到思想发展的新的阶段了。

郑惠认为“，反映胡绳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胡绳在1989年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绳一改以往的作风，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思考。他在文章中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大问题：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二、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三、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讲到经济体制改革要过商品经济关，政治体制改革要过民主政治关，讲到“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而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坚持不了的”。还讲到“我们应该勇于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文章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的思潮，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抱残守缺，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其影响”。胡绳的文章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在1989年，否定改革开放、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的思潮又一次掀起；一些所谓理论家又一次从否定改革开放的目的出发，挑起“姓资姓社”的喧嚣。因此，郑惠认为：“胡绳这篇文章，同这种思潮针锋相对，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新时期的路线和理论，有许多新见解，表明他确实已走出长期的思想困惑，进入‘知天命’的新境界了”。

摆脱困惑的胡绳，虽然仍是官员，甚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政协副主席，但理论上却焕发了青春。而一旦“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后，胡绳的惊人胆识也就显现出来了。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绳晚年理论的重大建树，是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著名学者吴江认为“，这也是胡绳在其一生中最后抱病为社会主义操心的一个问题”（《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



2000年5月29日，胡绳在福建漳州市人民广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等，改变了过去“左”的思维模式下，那种简单直接地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主张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一新思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实践上也为改革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证明。但是，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禁锢，有一些所谓理论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是抱有抵触情绪的；又由于受实践中对邓小平理论歪曲变形现象的影响，不少人对邓小平理论也心存顾虑。要消除影响，解除顾虑，除了用事实说话外，还需要对这一理论加以正确地阐释，彻底说清楚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我们这个“左”的思潮曾经泛滥过的社会中，以往“兴无灭资”的旧范式，旧的思维方式，依然有很大的市场。要在理论上重新阐发这一问题，清理旧有的“左”的思维模式，是相当艰难的。胡绳曾意味深长地说：

共产党的确是很为难啊，它的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结

果你倒要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实在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这个问题却越搞越糊涂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应当重新清理了《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1页)。

要重新清理这些问题,阐发邓小平理论,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需要有直面责难的勇气。胡绳以关注改革开放和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空洞的教条,创造性地阐发邓小平理论,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绳很早就关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早在1985年,他就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为题,论证了必须运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根据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阐释了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关系。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能否解决好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问题,胡绳也向郑惠多次谈过自己的思考。他说,现在西欧、北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组织社

会化大生产的普遍经验等等,都达到了人类社会已有的最高程度。社会主义要代之而兴,就必须在这一切方面至少与他们并驾齐驱,以至超过他们。而现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得到这一切,除了向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文明学习以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可能是二十世纪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过去提出“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简单化的错误的口号和作法,都表现了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失误。

1994年6月,胡绳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长文,从四个方面阐发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个主题。胡绳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思想,认为这是对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生产关系至上”的错误认识的突破;在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胡绳指出,这一个新概念的重要性在于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在谈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胡绳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

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胡绳认为,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

同年12月,胡绳在一个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马



胡绳全家福

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讲演。这篇讲演特别谈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建设的科学的问题。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的。在建设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这些见解引起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和高度赞扬。

20世纪90年代末，胡绳在病重的最后几年，继续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并取得新的重要的成果。他在1998年8月发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1999年3月发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进一步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用民粹主义的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是中国革命诸多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和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了历史的理论的考察，认为直到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才使这个问题得到透彻的解决，那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胡绳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失误的思想根源，并认为重新学习和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处理，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

胡绳在回顾和总结人类在20世纪中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之后，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惟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胡绳还满怀信心地预言，在新世纪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201—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在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胡绳晚年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论述，是基于总结人类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对

邓小平理论进行阐述和传播。他在病入膏肓的残年，仍不遗余力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新论点。就学术探讨而言，是十分值得称道的。至于观点本身是否存在瑕疵，本可以进行平等的学术探讨，大可不必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却出了些棒喝和流言”。龚育之回忆说：“曾有人问我：‘听人说，胡绳认为三百年不要谈社会主义，怎么回事？’这真是匪夷所思！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三百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的乐观坚信论变成了三百年不谈社会主义的悲观绝望论！”（《送别归来琐忆》《百年潮》2000年12期）

实际上，只要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学者都可以看出，胡绳晚年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从根本上来讲，是阐述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诚如吴江所言：“谈邓小平理论如果撇开或不重视”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弄清楚邓小平理论的全貌？”

剖析“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1998年12月，胡绳抱病参加了湖南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生105周年学术会议，最后一次面对公众发表学术演讲。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这也是胡绳最后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

《再评价》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对建国后我们党犯一系列“左”的错误作了最深刻的理论剖析。他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评论，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

层针对意义的(参见李一鑫《胡绳周扬现象背后》《炎黄春秋》2002年7期)。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当时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会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民粹派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

早在1935年,胡绳就接触到俄国民粹派的问题。上个世纪40年代后,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多次涉及民粹主义问题。针对太平天国纲领中描画的不要商业、不要城市、尽力保持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图案,胡绳批评说:“这种图案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这种图案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在论述孙中山的举政治改革、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时,胡绳指出,孙中山认为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这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胡绳由此发挥说,对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不能厚责于前人,倒是要看到其中的某些弱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曾有过,而且是通过后期实践才逐步克服的。胡绳由此认为,中国几个不同阶级的革命代表人物往往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想使落后的中国更快地进步,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大痛苦,因此不约而同地产生跳过资本主义提早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是有他们的共同背景的。

具体到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民粹主义色彩,胡绳也作了系统地历史考察。胡绳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甚至说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胡绳指出,在那个时候,说共产党搞革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毛主席是我们党内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国后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放弃了。在这以后三年急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真正做到使一切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绝种”。1958年又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化,梦想一夜之间跨入共产主义。胡绳指出,在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当时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此后二十多年间与公社制度相联系的种种混乱思想,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等等,都是如此,都在实践中起了坏作用(参见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第170-176页)。

由此说来,胡绳再评价》一文中对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的剖析,决不是什么一时即兴之作,而是他长期思想积累达到的成果。这一新论点是十分精辟和富有远见的,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极为有益。(龚育之《犹思奋笔追班马》《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1期)

但是,胡绳提出这一观点后,却受到一些粗暴的“围攻”。围攻者从无限上纲到人身辱骂,重弹“文革”大批判的老调。对此,胡绳不但坦然处之,并且在给吴江信中,对这种“围攻”(胡绳原话)表示不屑回答。说:“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英雄好汉了。”

代表胡绳晚年思想的著作,收入在他逝世前不到10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他“知天命”也就是比较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命运和自己命运的著作了。写这些著作的时候,胡绳年纪渐入老境,思想却是年青的,是与时代的前进而俱进的。就像他的又一首诗中说的:“此心不与年俱老”(龚育之《胡绳的最后著作》《百年潮》2001年4期)。胡绳在理论上实现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了一个光彩的“胡绳学术晚年”;同时,“回归自我”后的“真”,也打造出一个后人“须仰视”的不为名誉所动的勇于探求真理的光辉形象。

今年11月5日,是胡绳逝世5周年忌日。愿此文能化作一缕馨香,祭奠这位大师的英灵。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 阎红彦

袁子清

阎红彦同志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奉调从四川到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年1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这期间,全国经历了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在1961—1965年一系列艰苦的调整工作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阎红彦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和群众的思想脉搏。他坚决反对照抄照搬上级的指示,坚持从云南的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经济上的调整,他积极主动地倡导进一步放宽政策。对政治上“左”的错误,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抵制。这在边疆民族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边疆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保证边疆稳定为根本任务

云南每个县都有少数民族,有8个民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分布在边疆和山区。边疆地区有29个县,面积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三,人口有24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边疆人口的70%,其中有13个民族在4000多公里的边防线跨境而居。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分别处在封建领主制、农奴制,甚至原始公社的末期。直到1955年,边疆才开始进行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或土地改革。1958年初,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有10%。这一年“大跃进”中,边疆开展了“反三论”(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条件论)斗争,“一步登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导致边疆局势动荡不安,边民13万人非正常外流。

阎红彦到任后,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批判“反三论”和“五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危害。他说:“农民从1958年以来,只看到‘共产风’,没有尝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反三论不是没有常识就是故意说假话,是刀枪不入的主观主义。”针对当时流行的“左”比右好的思潮,他说:“‘左’并不比右好,都有立场和方法问题。你的愿望很好,但是愿望不能作为处理具体政策的依据。把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办,是错误的。”

“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阎红彦强调,边疆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他说:“判断一个制度是否优越,就要看它生产的东西多不多,群众生活好不好。”“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就肯定不是好政策。”“生产的发展,是关系群众生活的最大实际,是广大群众最根本的要求。”“抓住生产,就抓住了民心!”“脱离生产,必然脱离实际,也就必然脱离群众,就会失掉民心。”“生产好了,群众满意了,什么事都好办。”

阎红彦认为,要发展生产,边疆稳定是个大前提。1960年12月8

日,根据中央关于西藏必须采取稳定发展方针的指示,省委关于边疆地区执行“十二条”的指示提出:边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阎红彦说,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保证边疆的稳定局面,以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斗争。边疆的一切政策措施,要服从大局,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团结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大多数,有利于加强对内外敌人的斗争。

云南农村 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边疆不提两条道路斗争,不搞“整党内走资派”,不能搞文化大革命”

1959年12月5日,在开展反右倾斗争,强调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下,阎红彦对云南省边委的一份报告批示:在边疆不要笼统地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2年10月,中央要求全国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阎红彦和云南省长于一川研究认为,云南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进行思想教育,而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开展这项运动。这个想法请示邓小平得到了支持,后经省委常委会和扩大的工作会议讨论同意。应各级干部的要求,省委于1962年12月21日发出文件。西南局常务书记看到文件后,指责这是公然违抗毛主席讲话,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唱对台戏,进行严厉追查。

阎红彦非常反感,说:“简直是教条主义!现在云南情况刚好一点,是不是也要把它搞乱,让人吃不上饭,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我就天天搞运动。”他为此夜不能寐,后来说:“老顶着也不行。我一个人倒了不要紧,不能把省委其他同志都牵连进去。”他给西南局常务书记写了信,承认文件的提法有错误,说明了情况,承担了责任。但始终得不到回音。

1963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阎红彦。会后,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他听取了省委的检查,并到农村做了调查,肯定了云南的农村形势,说问题在于

对阶级斗争思想认识不够,文件的文字处理欠妥。为时半年的这场风波终于告一段落。阎红彦深有感触地说:“想给老百姓做点好事,真难啊!”

1965年1月,中央发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阎红彦根据实际情况和前两年蹲点、试点的经验,提出无论点上、面上,都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对边疆民族地区,他先是提出1963至1965年暂时不动,后经反复调查研究,提出“边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在他的坚持下,省委决定边疆社教运动的内容是五抓(即抓培养民族干部、抓生产、抓生活、抓文化教育和抓卫生工作)和两带(科学知识、先进思想)。

1966年8月23日,昆明地区造反派开始“炮轰省委”和批斗阎红彦。11月,云南各级党政机关被冲击后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阎红彦在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忍辱负重,坚持原则,坚持省委的集体领导。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查抄、进驻了这位开国上将的家。他的生命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他仍一再强调:“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搞‘文化大革命’。”12月27日,省委为纠正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错误,发出《关于师宗、玉溪等县一些单位取消回族食堂,强迫回族职工吃猪肉的通报》,要求坚决制止。此时距阎红彦被害身亡只有11天,距省委被“造反派”夺权仅仅一个月。

不能因为建国营农场就向傣族群众征地和让他们搬迁

1960年,我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之中。橡胶,作为关系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战略物资,在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德宏试种成功。农垦部在西双版纳筹建的国营农场,解决了发展计划、资金、技术和职工队伍等问题,需要云南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土地的划拨和征用。阎红彦到西双版纳调研时,农场方面提出,考虑到橡胶属于战略物资,只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不宜让群众个人种植。为了落实种植计划,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种种矛盾,便于管理,要求云南帮助解决在农场规划范围内居住的傣族群众的搬迁、安置和向他们征地

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要求是合乎逻辑的。人们没有想到,阎红彦十分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 and 许多细节,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他说,要不要向农民征用土地和让傣族群众搬迁,既关系到橡胶生产的发展和农场建设,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还涉及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处理得好不好,影响重大。

他指出,我们掌权了,有些干部往往只简单地考虑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上级任务,而不注意从实际出发,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群众商量。本来想更好地完成任务,却往往事与愿违,也损害了与群众的关系。

他说,要在边疆民族地区建农场,发展橡胶生产,离开群众则寸步难行。所以必须搞好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要依靠群众,首先要帮助群众。你考虑了群众的需要,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你不考虑群众的利益,甚至有意无意地损害群众利益,总是想方设法地防范群众,对付群众,那是对付不了群众的,也处理不好和群众的关系。

阎红彦提出,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最好不采取征地、让群众搬迁的办法,也不采取让群众带土地一并划入农场当工人的办法。因为那会带来许多矛盾和难以处理的困难。可以采取不改变所有制,和群众共同种橡胶的办法。就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安排下,农场在完成自身种植计划的同时,帮助群众发展橡胶生产。在资金、规划、种苗、技术上给群众以帮助,将来割胶时,由农场统一收购、加工。这样,农场可以有保证地完成种植计划,拿到橡胶产品,又可以同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提高技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既可以团结群众稳定边疆,农场也可以站稳脚跟。至于所有制问题,应该好解决。因为那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尽快、尽可能多地拿到橡胶产品。只要能发展,谁种都可以。不管土地、胶林归谁所有,所产橡胶产品都掌握在国家手里,那有什么不好呢?

在那个急于实现单一公有制的年代,人们对这一席话感到耳目一新,听他讲得在理,终于接受了。实行这种办法不但效果好,而且形成了国家在云南发展橡胶生产的鲜明特色。

“把制止肿病死人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只要能安排出时间,阎红彦就下去进行调查,去体恤民情,听取意见,发现问题,商量对策,为省委因地制宜地做出决策和制订政策,提供意见和依据,或者向中央提出建议。1960年春夏之间,阎红彦在边疆民族地区澜沧县调查时,遇到一个老太婆在风雨中一颠一跛地翻山爬坡,到公共食堂去吃饭,浑身上下像从泥水中滚过一样。群众七嘴八舌地诉苦说,她跑的路还不算远,最远的有30里,每天骑上毛驴来吃饭,吃完饭刚回到家,又准备来吃下一顿。大家问阎红彦: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阎红彦被震惊了。在当晚的干部会议上,他气愤地说:“30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稍微忠厚一点的人也不该这样做嘛!”他对县委书记说:“要根据群众的意愿,边疆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

他的主张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更没有人敢执行。因为当时说公共食堂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有的干部就是因为对公共食堂有意见,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降级,送农场劳动。阎红彦



1961年4月8日,阎红彦陪同周恩来总理在西双版纳欢度傣族泼水节

后来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1961年5月9日,在弥渡县调查途中,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对人民群众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据实上书,为民请命。他用普遍与个别相结合的第一手材料,就放宽若干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6000多字的长信,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等意见。毛泽东对信的内容及其调查方法予以肯定和赞扬,并批转给全国各地和中央工作会议参考,对中央决定停办公共食堂起了积极作用,解决了公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个大问题。

1960年3月,阎红彦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调查中,竟然在白族聚居的剑川县金华公社路遇饿殍。一队队送葬队伍,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停下来查问。当得知州、县、公社领导干部因为“怕犯右倾错误”而置若罔闻、熟视无睹、知情不报时,阎红彦十分气愤。他几乎是在呐喊:“这哪里像共产党?这要失掉人心的!不能整天只唱赞美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

他当晚就回到昆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省委向全省发出“把制止肿病死入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的紧急通知。全省上下着手建立了责任制度,限期控制发病和死亡。安排了为浮肿群众发放每人每天八两的救济粮。当年组织3万名医务人员下乡为病号集中免费治疗,同时要求为广大群众安排好劳逸结合。阎红彦强调:“要敢于负责,敢于坚持原则。什么是原则?合乎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原则。”他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说:“只要你认真了解分析了情况,把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认真负责地解决问题,那就不怕问题多。我们怕的是阳奉阴违,不反映问题,又不反映真实情况的浮夸作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肿病死入的蔓延和党群关系的恶化得到遏制,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恢复,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浮夸风。

该单干的允许单干要“百摇不动”

1960年11月,阎红彦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政策的“十二条”组织研究和主持制定了在不同地区进一步放宽政策的补充规定。如边疆地区一律不办公共食堂。内地高山分散地区分别实行

大队、生产队、作业组所有制。远离生产队的单家独户或三家两户,作为生产队的“挂钩户”,实行单独经营。生产队、作业组、个体户实行农作物、畜牧业、林业和副业的生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深受各族群众欢迎的政策,当时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1961年3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农业六十条(草案)》时,阎红彦建议调整社队规模。他说,在一些多民族杂居的山区,社队规模过大,不仅把穷富拉平,使生产受到重大损失,而且还妨碍民族团结。5月,他在大理州弥渡县和州县干部进一步商量如何给生产队放权,决定在四个大队试行,在大队的框架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谁也没有想到,消息一传开,一个月之内便在全州推广到大队总数的95.8%,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1962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项调整工作1961年底在云南全省已经完成。

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和给生产队放权获得成功,大大增强了阎红彦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继续调整农村政策的信心和决心。对边疆民族地区,他提出回到1958年以前的实际上去,能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允许单干。他利用1962年春节邓小平来云南的机会,汇报了上述设想。邓小平明确表示同意,说边疆的合作社能办就办,不能办就不办。于是,省委决定全面审查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省委组织了几个工作团,阎红彦也亲自深入下去,重新审查办社条件,实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坚持集体的,退回到互助组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单一民族的初级社。在一些分散山区允许单干。允许边疆农民长期保留自留地和零星果木、竹蓬、柴山、小鱼塘、分养牲畜。对缺乏劳动力的个体农民,允许用合理工资雇佣短工,或以畜力换人工。在一些地区还允许自由借贷和自由买卖。

有人担心这样搞会出现阶级分化、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阎红彦说,改变或调整所有制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抽象地评判某一种生产关系的优劣。阶级分化是可能的,不要怕。最可怕的是减产。不能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敢发展生产,还是要发展生产,再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经过

各级党委耐心细致的工作,边疆入社农户由 90% 调整为 53%。

民族上层人士可以有两个家,一个在昆明,一个在自己家乡

云南有民族上层人士一万余人,宗教上层人士两万余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团结整个民族,巩固和稳定边疆,都有重要作用。1958年在民主改革补课中,错误地斗争了上层人士和他们的家庭,没收了底财、浮财,破坏了正常宗教活动。省委统战部和边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将上层人士中 294 人集中到黑林铺整风,搞人人过关。许多人被定为“民族主义分子”、“特务嫌疑分子”、“叛乱首要分子”等。一些被视为不可靠的人被留在昆明定居,严重违反了民族、宗教政策,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也损害了党的形象。

1962年6月7日,省委召开民族上层人士座谈会。阎红彦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省委关于长期团结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政策精神,代表省委对上述错误作了检查和赔礼道歉,宣布凡是那次搞错了的都要甄别,损失了的要赔偿,戴得不合理的帽子要摘掉,降级和扣发工资的要恢复。阎红彦还提出,被留在昆明定居的,愿留愿回听其自便,也可以有两个家,来来往往。可以有两个家,是阎红彦从实际出发,认真执行民族政策的匠心独具之处,体现了省委改正错误、团结党外朋友的真诚愿望和豁达胸怀。

此后,云南民族工作得以健康发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恢复和保护。各项调整措施受到民族上层人士和各族群众的欢迎,边疆形势迅速好转。一位民族上层人士亲自写了一个“天地君亲师阎”的大条幅,挂在自己堂屋的正中间,以表达跟随共产党的决心和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拥护和颂扬。

阎红彦批评党内一些干部光会下命令、搞运动,不去和人家商量。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包办主义,党的领导不是包办一

切。包下来的结果,积极性都没有了。他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主张民族干部一定要有职有权。他认为,少数民族干部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衡量边疆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是不能解放的。他要求全省党政军、群众团体和所有农场、工厂、企事业单位,都要吸收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并且要列入工作计划,要下苦功夫。他要求坚决扫除民族干部中三十岁以下的文盲,年纪大的要抽一半时间学习或轮训。他要求军队多征收少数民族参军,教他们学汉语、学文化,把他们看作军队的骨干,也要看作地方上的骨干。部队民族工作队的成员要有三分之一吸收当地少数民族,逐渐发展到三分之二,最后要做到指导员也是民族干部。他根据几年进行调查研究形成的思路,组织省边委、省委组织部于 1966 年 2 月制订了《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

发展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多种经营是一项战略任务

1962年在楚雄彝族自治州调查途中停在路边休息时,少年做过放羊娃的阎红彦发现山坡上放牧的羊群中,老羊、瘦羊多,便和羊倌攀谈起来。羊倌说,为完成羊的增长指标,保证“存栏数”,不



1966年2月,阎红彦(前排中)在云南农村调查

让群众杀羊、卖羊,所以老羊、瘦羊多,养羊也没有积极性。阎红彦很快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调研,省委做出了大牲畜和羊要按一定比例杀、卖、吃,并把“出栏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受到群众欢迎。阎红彦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农民对养猪吃不到肉的生猪派购政策有意见。经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大胆实行养猪吃、卖各半的政策,多养多吃,大得人心。到1965年,全省畜牧业收入提高到占农业总产值的20%,猪比1960年增加74.5%,羊增加70%,羊的收购量增加4倍多,全省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养大小牲畜一头多。1966年,农民户均养猪数跃居全国第一,羊的存栏数为全国第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1964年平均每户已有大牲畜两头,猪3.3头,人均占有粮食780多斤,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4月,为解除农民怕增产粮食自己不能多分的顾虑,阎红彦主持省委会议决定,从今年起,粮食增产部分实行“三三制”,即按国家超购、集体储备、社员增加口粮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分配,深受群众欢迎。

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山大、地瘦、缺水,种粮条件差又拘守“以粮为纲”方针,造成生产水平低,群众生活困难。阎红彦到这些地区调查,往往听到的是介绍穷山恶水,看到的是愁眉苦脸。他在苗、彝、回等民族居住的昭通地区走了七个县以后提出: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要多动脑筋,避短扬长,发展多种经营,包括大小牲畜、山林特产等等。比如这里的牛羊、油桐果、松籽、食用菌、鸡、天麻、苹果等等都可以发展,还要搞好加工业和采摘业。这里竹子很多,可以从四川请手工业师傅来,教你们生产竹筷子、工艺品、竹桌椅、竹木家具,你们请人有困难,我可以帮助联系。总之,只要发动群众,办法会多得很。

阎红彦说,增加收入,增加积累,巩固集体经济,增加工业原料,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主要靠开发多种经营。因此,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十分重视畜牧业,开展多种经营,要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去进行。1963年1月,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多种经营的指示,提出14项措施和具体要求。在阎红彦倡议下,省委成立了山区工作委员会,派出1000多人的山区工作队,增加了山区发展生产的专款,还试行了高山和分散山区以畜产品、土特产品抵交公粮的政策,促进了山区多种经

营的发展和落后面貌的改变。

1962年4月,省委以《各级党委都要以极大的注意力研究市场问题》为题,批发了阎红彦在楚雄、大理、德宏地区对商业工作调查后给省委写的13000字的长信。信中指出,市场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环节。只有依靠正确的经济政策,依靠先进的流通关系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率的提高。他提出商业工作要有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要积极组织地方货源,积极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纠正乱进货、乱调运。他还主张坚持开放初级市场,国营商业要参与初级市场发挥领导作用,要组织地方货源,调剂市场价格,挂价收购农民卖不完的产品。

阎红彦倡导教会群众洗脸、刷牙、磨豆腐、缝衣服,群众说他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知心人

经过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云南1962年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1963年正式成为粮食调出省,1964年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年。粮、猪、羊、大牲畜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烤烟、糖大幅度增长,油菜籽增长近一倍。1964年全省造林面积是1961年的5倍。从1964年9月起,猪肉在全省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数十种凭票供应的商品完全放开。农民人均分配收入,1964年比1961年增加了31.4%(边疆农民增加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5年比1957年增加64.7%。1965年工业总产值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创历史最好水平。因此,1964、1965年成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建立后最好的年份之一。

1965年7月下旬,阎红彦把调查研究的重点转入边疆。

在靠近国境线的景颇、拉祜族,特别是佤族山寨,阎红彦看到群众穿的脏、破、烂,有的只有一块遮羞布。不理发、不洗脸、不刷牙,有的人用镰刀理发。没有医生,不看病,只会求神信鬼。找些菜来只会煮,不会吃油,更不会炒菜。许多人全家没有一条被子,只有一个火塘,一口吊锅。生产也只会一把砍刀,刀耕火种。他看后心情十分沉重,这样

简单的生产,简单的生活,边疆如何稳定?谈何发展?在耿马一个乡54个年轻人中,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4个。阎红彦指出,省委批转了不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文件,爱国主义在这些地方不都是一堆空话吗?他认为,边疆学校的课本,第一课应该是“我是中国人”,第二课是“我们国家有多大”。

阎红彦强调,我们制定政策,要考虑到边疆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这样一个特殊的实际,不仅要看到解放后的十几年,也要看到过去的几千年。他认为,在边疆,不

提高文化,不加强教育工作,要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并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稳定边疆,都是困难的。各民族群众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放。所以,文化建设是一个根本建设问题。

文化建设从何入手?他说,边防部队和外来的干部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要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提倡学文化、讲卫生,发展商品经济。还要教会他们理发、洗脸、刷牙,穿衣服、盖被子,炒菜、炖肉,种地、施肥等等,使他们生活复杂化,促进思想意识复杂化,进而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不断进步。

他提出,边疆地区文化教育卫生的经费、编制、招生人数都要增加。不同地区办学校可以分别采取国家办、集体办、民办、民办公助、农场办学,以及办农业中学、工读学校、耕读小学等多种形式,多吸取学龄儿童和群众入学。工读学校要培养篾匠、木匠、泥瓦匠、缝纫匠。为方便群众看病,要降低药费,并酌情减免。部队的医院、卫生所要向群众开放,给群众看病,经费可由国家和部队适当补贴。

在阎红彦倡导下,省委和昆明军区决定大力加强。1964年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组织的民族工作队,在民族地区扶植生产,传授技术。部队派出5000人,地方党政机关经常有三分之一干部参加民族工作队。阎红彦为民族工作队交任务、教方



1966年2月,阎红彦(右二)在云南农村调查

法,还具体交代人员如何配备。民族工作队和边防部队普遍开展了三员(文化教员、卫生员、理发员)、五匠(木匠、铁匠、篾匠、石匠、泥瓦匠)活动,深入边疆民族村寨,从教群众洗脸、刷牙、吃饭用筷子做起,直到教会腌咸菜、磨豆腐、缝衣服、盖瓦房……在阎红彦极力倡导下,边防部队的试验田主要是给少数民族做样板,影响和带动群众改变刀耕火种习惯,学会科学种田。

一件件具体细致的工作,春风化雨般地改变着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升着民族的素质,带来了边疆的繁荣兴旺,各族人民对阎红彦的爱戴之情油然而生。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大批判”的风雨沧桑,也全然改变不了阎红彦给人们留下的美好印象。到了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新华社记者和撰写阎红彦传的党史工作者分别到云南走访,人们都说,边疆人民至今仍在深深地怀念着阎红彦,称颂他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1999年10月,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纪念阎红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说:阎红彦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同志。云南各族人民把他主持省委工作的时期称作云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他把自己的名字与云南这片红土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将永远活在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 萧 徐)

冯雪峰坎坷的一生

● 季 音

冯雪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经是左翼文坛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新星,是人们公认的我国“鲁迅学”权威。可是,他的后半生却历尽坎坷,饱受苦难。他的遭遇,深深地打上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烙印。

长征路上的著名作家

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叫神坛村的山村,家里世代务农,他在九岁时才放下牛鞭,走进了学堂,是这个贫困农民家庭唯一的读书人。冯雪峰由于天资聪颖,外加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良。小学毕业后,他背着家人偷偷跑到金华,投考金华中学,以第一名被录取。不久,他又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当地的浙江第七师范。读师范是有官费补助的,这就大大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就在这个学校里,冯雪峰投入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罢课风潮,最后被学校开除。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受到的打击。

在这次事件后,他跑到杭州,考进了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这是一所富有革命精神、思想活跃的名校,他在这里接受了老一辈文学家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师长的教诲,也在同学中结识了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伙伴,这些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在开拓新文学的道路上很快就结合起来。受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冯雪峰,开始热衷于创作新诗,不久,他和好友应修人、潘漠华和汪静之等人,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出版了新诗集《湖畔》。诗集以清新的文风,在社会上受到热烈欢迎,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都给以很高评价,从此,冯雪峰等人被誉为“湖畔诗人”。

冯雪峰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步,是1925年他来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北京。他一边打工,做家

庭教师,一边到北大旁听,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鲁迅的讲课。他以惊人的毅力自修日语,没有多久,他就开始以日文翻译诗歌、散文、小说和进步的文艺理论。他逐步成为一个翻译家。

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白色恐怖弥漫全国,革命队伍里不少怯弱者有的悲观动摇,有的落荒而走,甚至投降变节。就在这真正考验人的严峻时刻,冯雪峰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漫漫的革命征程。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他在上海经柔石介绍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奉党组织之命,与鲁迅先生商谈,并最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实现了进步作家的“大团结”,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3年,冯雪峰奉调到中央苏区瑞金,不久就参加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据说长征队伍里,他是唯一的著名作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4月上旬,党把冯雪峰从山西调回到陕北瓦窑堡,决定以特派员的身份把冯派到上海去工作。临行,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分别找他谈话,详细交待了任务。

4月上旬,冯雪峰到上海后,很快就展开了工作,他第一件办的就是建立与中央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这是周恩来临行时嘱咐他要办的大事,因为自从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电台被特务砸烂,党中央与上海失去了联系。不久,冯雪峰通过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关系,很快把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从此,恢复了党中央与上海的联系。

这年8月,遭到破坏后的上海地下党,急需有统一的领导,上级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由冯雪峰担任副主任(潘汉年为主任),开展了重建地下党和其它各方面的工作。据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尧山同志回忆,冯雪峰来到上海后,受到了上海地下党同志的热烈欢迎,他对冯

雪峰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雪峰同志对当时工作的指导，基本上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特别应提到的是，对上海地下党的整理，贯彻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为上海地下党初步的整理，及以后巩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期间，冯雪峰与鲁迅先生亲密合作，在文坛上披荆斩棘，进行了不少开拓性努力，写出多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直到1936年10月19日，一代伟人鲁迅先生去世，冯雪峰代表党中央主持了隆重的治丧仪式。他们两人之间有历史意义的合作，至此划上了句号。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章。

集中营一支燃烧的火炬

我是在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囚牢里，认识冯雪峰的。

那是1941年1月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特务在闽浙赣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1年1月25日，军统特务对浙江金华的进步文化界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一夜间就非法逮捕了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浙江潮》、《浙江妇女》杂志等单位的七个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次大逮捕震动了金华的文化界与新闻界。一位好心人给正在浙江义乌老家的冯雪峰写了封信，通报了金华大逮捕的消息，要他多加小心云云。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军统特务手中，就在2月26日的黄昏，冯雪峰被逮捕了。

冯雪峰押到集中营比我们晚。记得那是4月间的一个上午，集中营大门口又拥进一伙人，中间押着两个囚犯，一个皮肤白净，神态镇定（后来才知道他是浙江民族日报社社长王闻识）。另一个中年人头发很长，病容满面，但两眼炯炯有神。是谁又落入了虎口？我们正在猜疑，同牢的难友郭静唐很快就认出，那后一个看来身体很弱的中年人就是冯雪峰。因为在30年代，他们曾经共同在上海从事过进步的出版事业。

冯雪峰被捕后，最初被关押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茅家岭监狱。这个监狱在上饶集中营里被称为“地狱里的地狱”，是一处最残酷最暗无天日的囚房。冯雪峰入狱不久，就传染

上了监狱里最流行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回归热”，连日的高烧把他折磨得半死。残忍的牢头怕他死在监狱里，不等他康复，就把他押送到集中营。

由于回归热流行，集中营里也不断有人死去，人心惶惶。幸好，这时由难友郭静唐出钱，到外面买来了特效药606药剂，把传染病控制住了。冯雪峰来到集中营以后，经过这种特效药的治疗，病基本上痊愈。

冯雪峰病后本来身体很弱，外加生活的极端艰苦，没有多久，他又患上了肋膜炎，整日疼痛难忍。即使如此，残忍的特务队长依然驱使他和我们从事种种苦役。集中营里有种种折磨罪犯的花招，命令全体囚犯围着大广场无休止的跑步，就是其中之一。冯雪峰也常常被强令加入。我常常看到他用手按着发炎的两肋挣扎着跑，没跑几圈就栽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由于缺医少药，他的肋膜炎日趋严重，疮口红肿流脓，再无力从事苦役。于是，他只好整天靠坐在草铺上，一个人孤寂地打发时光。有时，我看到他在一页小纸片上写些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写诗。当年的“湖畔诗人”，在残酷的地狱里又拿起笔来，控诉旧世界的罪恶，发出战斗的呼号。



冯雪峰 20 世纪 30 年代摄于上海



1931年4月20日,冯雪峰一家与鲁迅先生一家合影
后排左为何爱玉,右为许广平

上饶集中营对面远处有座灵山,遥望郁郁葱葱,挺拔俊秀,雨天时迷迷蒙蒙,似披上一层神秘的轻纱。这里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方志敏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冯雪峰经常远眺着这座灵山,陷入沉思。不久他写了一首《灵山歌》,诗是这样开篇的:

我们看得见灵山,
一座不屈的山!
它显得多么伟美——
崎岖,峥嵘,
一连串的高峰直矗到天际。
有时它蒙罩在梦一般的云里,
它自己也显得和云一般的奇伟……
这地方的人又指给我,就在这灵山,
伟大的战斗者,重聚了大军
坚持大义的血旗——
披靡着东南整个的地区,……

从这山,我懂得了历史悲剧的不可免,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为什么奔赴那
悲剧而毫无惧色,而永不退屈!……

诗言志。这首《灵山歌》,是冯雪峰抒发内心真情的歌。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残酷迫害,他决心以方志敏烈士为榜样,为革命奔赴那悲剧而毫无惧色。”

冯雪峰还有一首诗,题为《火》,其中有这样一段:

火!哦,如果是火!
你投掷在黑夜!
你燃烧在黑夜!
我心中有一团火,
我要投出到黑夜去!
让它在那里燃烧,
而让它越燃越炽烈!

冯雪峰在诗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自己身在黑暗无比的集中营里,成为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狱中战友们的斗争道路。

事实正是这样。他毕竟是一个久经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他在狱中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用了个“冯福春”的假名,声称自己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小编辑,与共产党根本不沾边,是被错抓进来的。

任凭特务分子的百般审讯,追问,他都这样回答。特务们对他半信半疑,却始终摸不到他的底细。冯雪峰尽管常在病中,却始终关怀着狱中地下党领导的对敌斗争,通过可靠渠道,对同志们提出各种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地下党的领导人也知道冯雪峰是个老党员,遇到重大问题,也悄悄向他去请教。

有一回,集中营特务开展了一个诱逼“囚犯”们自首的活动,强令每个人签名在报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凡自首者可以从宽发落,在生活上得到优待。有些人发生了动摇。冯雪峰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通过地下支部,指出必须坚决粉碎这个阴谋。后来在几个老同志巧妙周旋下,特务这个鬼花招终于未能实现,只有极少数几个人上了当。

集中营对敌斗争的主力,是被俘的新四军干部。1942年5月与6月,以他们为主,发动了两

次集体暴动，即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两次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一批同志跳出了魔窟。雪峰对这两次暴动，都积极支持。

冯雪峰同时也主张，有些难友由于情况不同，可以采取分散越狱的办法。他直接帮助计惜英等与他关在一起的三同志越狱成功。新四军著名画家赖少其与邵宇，决定伺机逃跑，他们去征求雪峰的意见。雪峰全力支持，并拿出了身上仅有的钱，供他们作路费。他还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可靠朋友的地址，要赖少其越狱后可到这些地方藏身。

雪峰由于体弱多病，越狱对他来说当然是困难的，他只能采取其它办法出狱。1942年冬，由于敌特始终不了解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又加上他长期疾病缠身，特务对这个老病号感到头痛。这年11月，由郭静唐、宦乡两人出面交涉，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帮助冯雪峰走出了囚禁两年多的上饶集中营。

冯雪峰出狱后，疗养了一个短时间，待健康稍有恢复，即于次年5月到了桂林，找到了党组织，6月间即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召来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情况。这样，雪峰又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从此，又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国统区的文化战线上。

“左”的逆流里的受难者

1953年春，我调到北京工作。四月间的一天，我们几个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幸存者，一起来到苏州胡同宿舍看望冯雪峰。我们都为能在新中国的阳光下重聚感到无比高兴。雪峰兴致勃勃，看来比过去健康得多。他说他参加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典，还以华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第一届常委。不久前，他组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了《文艺报》主编等领导职务。看来，工作十分繁忙，心情也很愉悦。我们相约，日后能再次欢聚。

不料一年后，政治风云突变，冯雪峰

开始走向逆境。最早遭到责难的是《红楼梦》研究事件。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艺报》转载并由冯雪峰写了个《编者按》。没想到这一下激怒了中央上层，毛泽东亲自批文，指责《文艺报》官老爷作风，压制新生力量。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气势汹汹地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矛头直指冯雪峰。

迫于万重压力，冯雪峰只好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随即，他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冤案。指责冯雪峰轻视新生力量是毫无根据的。相反，冯雪峰十分重视扶植年轻作家的成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帮助青年作家杜鹏程完成《保卫延安》的写作，就是个例子。为了帮助他写好这部小说，冯雪峰一次次把作者邀到家里，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几乎逐段逐段地提出修改意见。作品完成后，雪峰又写了长篇评介文章，向社会推荐这本由年轻作家写成的



1951年十月革命节在莫斯科红场参加检阅。前排右起依次为曹靖华、冯雪峰、茵子，后排右三为陈荒煤

第一部小说。杜鹏程对人说,冯雪峰对他的帮助,他永远不能忘记。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楼梦》事件刚过去,1957年,反右派斗争又起,揪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后不久,就把矛头指向冯雪峰,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通栏地位刊出了一则爆炸性新闻《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自此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斗会一个接一个,污水从四面八方向他泼来,他甚至被指责为破坏了党与鲁迅的关系,一个熟悉情况的人竟然斥责他:“不但吃鲁迅,还欺骗了鲁迅,损害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

面对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冯雪峰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有口难辩。

1958年4月,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

跟随党几十年历尽坎坷的冯雪峰,从此坠入迷惘中。当时他55岁,身体也还健康,可是却无事可做。怎么办?他对人说:“人活着总不能不做工作啊!”他想利用靠边站的这段时间,完成一部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乌代之死》。无疑,他是写长征最合适的作家。过去他在家乡义乌养病时已经写了几十万字,可惜在他被捕后丢失。现在有了时间,他决心把这件未完成的大事做完。他把这个意图报告了组织上,得到的回答是:“你没有资格写长征!”雪峰长叹一声,只好又把笔搁下。

在这种情况下,雪峰真是苦恼到了极点,他写了两首旧体诗,排遣自己忧郁的心情。一首诗为《塞童》:

天赐塞翁千里驹	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御术	立即翻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	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	祸福玄谈只自欺

另一首题为《未深思》:

嫦娥性急未深思	咽下仙丹即起飞
只道月宫绝浊俗	不知上界尚凄清
对空曼舞难寻伴	遣夜幽谈又与谁
最是还乡也不得	上天有术下无梯

读了这两首凄怆、深沉的诗,令人叹息。雪峰几十年来经历了长征、坐牢等无数艰难险阻,不

料到了晚年,突然祸从天降,被“自己人”打翻在地;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在1961年摘去右派帽子之后,他曾经几次给党组织打报告,要求重新入党,都遭到拒绝。

既然不准写反映长征的小说,又没有多少重要工作,依然壮志满怀的冯雪峰,决定写一部太平天国的长篇。他为此几乎花了15年时间,断断续续搜集了大量史料,拟出了写作提纲,并且亲自跑到广西,去作实地考察,体验生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完成这部他日思夜想的长篇巨作。也许,这是他晚年一个很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降临,雪峰又陷入新的苦难。他被关进“牛棚”,以后又发配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尽管他那时已是66岁高龄,造反派仍然驱使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从事各种沉重的体力劳动。到了后期,他被调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他对鲁迅先生相知甚深,就让他在家里做些校订《鲁迅日记》一类的工作,但不准到单位上班。

到了1976年,眼看天边已露出一丝曙光,令人遗憾的是,在“四人帮”即将覆没的前夕,他未能目睹祖国走出灾难,在1976年1月31日,抱憾离开人世。雪峰没有留下遗嘱,留下的只是在弥留之际,痛哭流涕地一再表示希望能让他回到党的队伍。

耐人寻味的是,冯雪峰去世后,先后开了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1976年7月16日。他的一些亲朋挚友一再呼吁要为这位文艺界的先驱举行悼念仪式。后经姚文元批示,追悼会只能低规格,严格限制人数,而且不准致悼词。尽管如此,那天仍然来了300余人,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楚图南、宦乡等著名人士都来了,人们只能流着泪,默默地鞠躬志哀。

1979年,冯雪峰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同年11月17日,再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胡耀邦还亲临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

两次追悼会,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令人感慨万端。毕竟,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

● 杨秉鉴

矢志从教 不入仕途

袁吉六,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农历四月初十,歿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四月二日,享年64岁,是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祖籍今湖南省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

袁吉六三岁丧母,父亲袁家绩,是清光绪甲午科秀才。袁家一贫如洗,主要靠卖豆腐为生。但袁吉六并未因家庭生活极度艰苦而放弃学业。他从小立下“囊萤、映雪,虽贫不辍”的豪志,凭自己的聪明资质,发奋读书,终于学有所成。清光绪年间,袁吉六身着简装,肩背包袱书笔,赶赴县城考试。袁吉六文思敏捷,立意新颖,论据充分而准确,考出最好的成绩,获得府试资格。

同年,府督考秀才,举行岁试。袁吉六满怀信心,欣然前往。因袁吉六家贫,沿途寄宿不食客餐,仅以苞谷粉和锅粩充饥。考试这天早晨,袁吉六事先将几块锅粩塞进左手衣袖内,准备在考试饿时食用。进入考场应试不久,被监考官察觉,疑是“夹带”弄假,便责令其站起接受检查。袁吉六内心明白,未等考官动手,便毫无惧色地主动站起,将衣袖筒往桌上一抖。考官们一看,原来是几块苞谷锅粩。监考官始知他是一个乡村的穷苦学生,不但未加责怪,还暗表同情,便默默走开……考试结束,袁吉六成绩优异,考中秀才。家乡人无不为之欣喜,都称他为“锅粩秀才”。

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袁吉六又赴省院参加乡试,考中丁酉科举人。他的举人学衔高人一等,皇封钦赐旗匾一块,授予“见官大三级”之权,次年本应上京参加会试,后因病未能前往。

袁吉六中举后,不入仕途,矢志从教,致力于苗族、土家族、汉族人民的教育事业,造就不少人才。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闓曾请袁吉六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被袁吉六婉言谢绝。谭延闓见袁吉六是个以不入仕途为荣的人,便请他任国史馆总编修,也被袁吉六推脱。1913年,老乡陈润霖任湖南省第四师范校长,请袁吉六去省立师范任教,袁吉六碍于老乡面子,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前往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员。

授课一师 培育栋梁

1914年3月,省署将“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令省立第四师范并入一师。袁吉六在一师任教时,对学生要求极严,且能循循善诱,是当时学校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教员。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先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一部第八班。袁吉六是第八班的国文教师。由于袁吉六是教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又留着胡须,所以人们一般都称他为“袁大胡子”。袁吉六讲解精辟,学识渊博,深受学生欢迎。在此期间,袁吉六先生前后教过毛泽东五年半的时间(按学制毛泽东多读了半年)。

袁吉六是一师最通文字学的国文教员,最重古文的教学。袁吉六对毛泽东十分器重,尤其赞赏他的文学才能,并介绍他读古典文学作品。袁吉六对毛泽东的才华和品德非常赏识,并预言:“挽国家危难,其大任必斯人也!”毛泽东对袁吉六也很敬佩,他曾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

时风趣地说：“我学会了古体文，多亏了袁大胡子。”

由于受梁启超“新文体”的影响，毛泽东喜欢半文半白的文章。袁吉六称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袁吉六除在课堂里讲授古文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找毛泽东到自己房里个别辅导，指教他“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最欣赏袁吉六的这种方法，并且一贯喜读国文，对于文学，他有很深的爱好，曾仔细读过《昭明文选》、《诗经》、《楚辞》等，也喜欢孔融、韩愈等人的文集。有一次，毛泽东从一家旧书店买来了一部《韩昌黎全集》，看到错字甚多，又请袁吉六圈点，毛泽东将批注过的版本逐篇熟读，并开始学作古文。袁吉六先生对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很是赞赏，夸他的文章“大有孔融笔意”。常批给学生“传观”。传观后的文章贴在事务室的对面走廊里，每贴出一篇，同学们都争相阅读。可是，毛泽东从不满足，总是抓紧一切练习写作的机会，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坚持袁吉六传授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观点。除了在书上密加圈点和写眉批外，还经常写读书笔记，凡有什么心得体会或新的见解，都及时记载下来，不断积累。他在一师五年半的学习时间内，所写的《课堂录》、《随感录》、《日记》等就有几大篮。

袁吉六先生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他还敢于碰硬，见义勇为。1915年上半年，省议会做了一个新的规定，秋季开学时，每个师范生要缴纳十元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的穷苦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一师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司而向政府建议的。于是，有人提出要赶走张干。加之，原四师部分同学对合校后要读半年书，早有不满情绪，于是一场赶走校长张干的学潮发生了。在第九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很快就罢课了，并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事实。毛泽东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对同学们说，我们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宝座上拉下来，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于是，毛泽东在后山君子亭起草了一个传单，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在印刷局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

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写上“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复课”的纸条。督学无奈，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张干为此大怒，要挂牌开除毛泽东在内的17个“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对此极为反感，便挺身而出，会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再三顶住，并和张干讲明“爱竹当留当路笋，惜花不剪碍窗枝”的道理。张干只好被迫把开除学生的决议废除。事隔35年后的1950年10月，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和周世钊去看望毛主席，谈到张干还在长沙当中学教员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张干这个人，原我不高兴他……现在看起来，当时赶张干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多读半年书也没什么不好呢！”

袁吉六先生在引导学生思想进步激发学生爱国爱民等方面也身体力行。

1915年，袁世凯要做皇帝，唆使他的党徒从北京到各省去组织“筹安会”，制造“劝进”空气，当时湖南反对帝制的空气很浓。长沙船山学社绝大部分社员，包括一些有骨气的老人和青年都一致反对帝制。一师有个教员叫廖名缙在船山学社讲学，大谈帝制不符合民意，希望大家起来反对。然而，廖名缙却在一师课堂上又宣传帝制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时在一师教书而富于正义感的徐特立、袁吉六等老师，深恶廖名缙卑鄙无耻，鼓吹劝进派的恶毒行径。徐特立、袁吉六等用一部分学生的名义给廖名缙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这样的：“先生在船山学社反对帝制，在第一师范鼓吹帝制，一人之身，两种面目……吾等处积威之下，无以为报，将来有机会之时，当不忘先生之赐也。”廖得信后，知道自己的行径引起了公愤，再也不敢鼓吹帝制了。袁吉六先生所教的一师第八班，共有毛泽东等三十位同学。当时正是国内连年内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紧，以及国际上“协约”、“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大战时期。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正逐步实现，新文化运动正逐步兴起。毛泽东、周世钊、贺果、邹蕴真等同学，在袁吉六的教诲下，使他们后来能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热心社会活动，进行农村调查，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教民的道路。

主席不忘袁大胡子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之后,一心致力于革命事业,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但他仍然挂念着自己的恩师袁吉六先生。全国解放之后,缅怀先师的心情更为强烈。

1951年,毛泽东亲自向湖南省的领导同志写信,寻找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氏的下落,并派人接戴氏来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戴氏在北京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单独会见,并设家宴款待。毛泽东要长沙民政局,每月发给戴氏生活费30元。当毛泽东了解到先师袁吉六先生墓葬未曾修葺时,慨然解囊相助,赠款400元为先师修墓。

1952年,毛泽东回湖南时,为纪念先师,亲书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七字,嘱地方政府为先生立碑。

1963年,戴氏老人患结石病住院,并施割治手术。湖南省委统战部派工作人员到医院探望病情,还送800元人民币作为医疗费用。此期间,毛泽东正好回湖南,还亲自去看望袁师母。1965年春,毛主席在中南海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同志作客,用家乡菜招待客人。席间,谈起第一师范的袁吉六先生。章士钊慨而言曰:“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着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主席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

(责任编辑 王海印)

淮海战役败将孙良诚的最后结局

● 朱 泽

《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刊登朱太刚写的《淮海战役中的一位无名英雄》文章,介绍了堵截孙良诚部队逃窜而英勇牺牲的董继民同志的光辉事迹。这位无名英雄,确是可歌可泣。遗憾的是,文章最后加了个多余的尾巴:“在这里谈一下孙良诚的最后结局。孙良诚投诚后,我军当即释放了他,并劝他切勿去南京蒋介石处。孙良诚不听劝告,于翌日回到南京,几天后被蒋介石枪毙于南京雨花台。”显然,他把孙良诚的最后结局的历史事实搞错了。

事实是,孙良诚投诚后主动提出要去蚌埠争取刘峙,并要我军派一个负责干部和几个随员一同前往,做刘峙的工作。当时,正好有我打入国民党保密局(军统)的周镐同志,因敌人有所察觉,而撤回解放区。领导就派周镐带随员数人,跟孙良诚去蚌埠见刘峙。实际上是孙良诚勾结刘峙搞的骗局。他们一到蚌埠,周镐等人就被刘峙关押,成为阶下囚,孙良诚则成为座上客。不久,周镐被押解到南京,关在保密局看守所,地址就是周镐原住的南京宁海路保密局机关附近。后来周镐被杀害在雨花台。雨花台烈士陈列馆悬挂过周镐烈士的照片。有篇《从保密将军到革命烈士》文章,就讲的这件事。孙良诚及其所部,

设骗局杀害革命干部远非这一次。1945年春,驻上冈的孙部四十师,派出一个人找到建阳县县政府,声称有个营准备起义,投奔新四军,营长派他来先行联络,并出示营长的印章为证,要求我军派一名干部,随他到上冈和营长面议,起义时派部队在据点外接应。我们派到上冈西郊去接应的武工队,无功而返。八一五寇宣布投降后,盐阜区大股伪军工作委员会,派徐渠同志给孙部第四军送劝降书,经上冈即被四十师扣留,押送盐城,为伪第四军杀害。盐城解放前夕,被捕的申德辉等12人统统被杀害。孙良诚及其所部,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孙良诚是个名副其实的战犯。

孙良诚最终下场如何呢?据了解,他由蚌埠来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请功,结果被反面无情的蒋介石投入监狱。他确在南京被关押过,以后又被保释了。1949年初,从无锡来到上海,住到小老婆处。宁、沪解放后,周镐烈士的遗孀一直追寻孙良诚的下落。苍天不负有心人,她到底找到了孙良诚,并向军管会告发,孙良诚被捕入狱。以后孙良诚被押送到山东战犯管理所,1952年3月病死,这就是战犯孙良诚的最后结局。

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 从进

当我全神贯注地连续几个晚上观看十集文献电视片《李先念》后,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连声称赞这部片子编得好。

它浓缩地介绍了作为革命家、军事家李先念的生平,而且突出地将西路军历史真相,作出了确切的历史交待和说明,完成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拨乱反正,是中共党史和军史研究的一大成就。

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1936年10月21800人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甘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过去的党史认为,这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上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直工作相处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

对这一问题如何定性和解说,关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红军两万多将士的荣辱声誉,理应作出正确回答才对,决不应再继续将错就错下去。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报送到了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将《疑》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之,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寄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党史研究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廖盖隆副主任将此文交给本室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

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

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作为对回答者的回答。

双方文章观点互相对立,但由于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属绝密级,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无影响。

与此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并开始了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并

得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林浩和院党史教研室领导段浩然的支持。

由于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一时间,某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此事决非偶然,有强烈针对性。朱玉和我商量,由我出面在几份有影响的史学杂志上,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请教、磋商以至争论。人们很快被吸引过来,议论纷纷。

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越宣称不讨论,人们的兴趣和议论越多。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疑》文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时间(约一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

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我在此前研究和撰文争论的过程中,广为收集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各种版本和教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西路军问题的表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而基本的调子和说法,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是来自(或抄自)《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一条注释。建国初期为出版《毛选》,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胡乔木为主,负责进

紀念死難的西路軍英烈
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

李先念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

李先念题词

行文字加工和注释的领导工作,参加者还有田家英。重要改动和增加,要报毛泽东知晓。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注释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法,我多年前通读《毛选》时就早已熟知,此时我重新研读,产生了大的疑问。其中的断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此文的注释则说:“1936年秋季,……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我觉得这个断语和这条注释的文字表达有点费尽心思强作文章的味道。仔细查过史实,发现与史实严重不符。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虽然受到大的损伤,但大半兵力尚在,仍在继续艰苦地战斗前进之中;第二,1936年12月党中央还没有精力、时间和其他客观条



永昌县红军西路军军碑

件来集中解决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到1937年3月中央才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作出结论。据此,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以一两句话来宣称张国焘路线已经破产了,何况这种宣称与西路军的失败相联系,而西路军在此时还没有失败呢!

于是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是后来加上的,行文上则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由此,我们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

1982年3月12日,我将这一新的发现写成《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寄给《红旗》杂志社。文稿由编辑郭德宏同志负责审阅处理。

同年11月24日,郭德宏同志给我复函说:“收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我详读之后,觉得您讲的是有道理的,立即送交《内部文稿》编辑部负责同志。他看后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内部文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1982年12月6日,我将文稿又投给了《文献和研究》编辑部,附了一信说:“希望能在贵刊上发表,我认为,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

1982年12月22日《文献和研究》编辑组给我复函说:“大作《对毛选中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疑问》已拜读。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牵涉较广,本刊目前不准备刊用,故特退还。谢谢你对本刊的关心支持。”对这个答复处理我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也只有理解了罢!于是我又转向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杂志。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

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章《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

但是,一道收回令却起了提醒作用。有的人还没来得及注意细看,得知此令后急找来看和争抢着看,对收回规定,多数人置之不理。收回的期刊寥寥无几。

上面又强令《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以别的内容另编发一期,使用原来序号作为取代,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中央重视,小平同志支持研究并对先念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表态给予肯定支持,史学界的人们也极关注西路军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再三阻拦、压制、严加控制,以致又严重干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上卷的写作和出版。1991年7月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



西路军烈士陵园

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电视片《李先念》不久前公开播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最近又播放了专题电视片《碧血黄沙——70年前的西路军魂》,通过其欧洲台、美洲台、东南亚台传向世界,将西路军问题真相向国人乃至世界华人作出了真实公正的交待说明。至此,人们已经可以向早已不在世几十年的当年西路军将士们的英灵说句告慰的话了:先辈们,您们如今已经可以闭目安息了。

回想西路军问题从朱玉提出、我们配合到终于解决的全过程,历时长达24年。没有邓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的直接过问和批示,以及中央常委其他各同志支持,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丛进,原系国防大学教授,大校)

(责任编辑 萧 徐)

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谜

● 章立凡

1936年“七君子案件”和“西安事变”相继爆发,迄今已近68年,当事人多已不在人世。“七君子案”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控罪中救国会领袖的活动与“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但由于过去的研究一直忽略这一点,某些谜团至今未曾打开。笔者的父亲章乃器是救国会领导人中与张学良的主要联系人,双方却都没有留下多少记录。兹就所涉猎的史料和见闻中探颐索隐,提出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一些线索,以飨读者和历史学者。

张、杨的表态和《起诉书》的指控

救国会“七君子”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后20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通电上说: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

《通电》还将“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列为八项救国主张的第三项。三天后,张学良在西安发表讲演,曾谈到蒋介石就“七君子案”对他的“重斥”: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另据杨天石先生《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一文记述,蒋介石当时还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虎城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兵谏”计划已经成型。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拘禁。翌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七君子”提起公诉。《起诉书》第九条举出控称,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西安有救国会的活动,并举出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曾就“绥远事变”致电张学良:“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

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的文字为证，专门指控救国会领袖们对“西安事变”的责任：

此电拍发后，为时仅浃旬，即有西安事变发生，而张学良之通电，又明明以释放该被告等为要挟。且核其彼此所揭橥之主张，亦复完全相同，其双方互相联络之情形，已堪认定。虽被告原电仅系怂恿张学良联合各将领督促政府对外出兵，尚不能证明西安暴动系出于被告等所策划，而其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要属无可讳言。……其所倡另建抗敌政权一节，尤与张学良通电所为改组政府之主张，适相吻合。此外又复散发种种刊物，鼓吹人民救国阵线等谬说，淆乱听闻，使人民与政府间起分化之作用。是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更属罪证确凿，灼然无疑。

《答辩状》的辩白和张学良的证言

指控救国会“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是极其严重的控罪，对此“七君子”在《答辩状》中坚决予以否认：

查西安事变发生于去年十二月廿二日，而被告等早于同年十一月廿二日被捕。当时正被羁押于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身在囹圄，不但无法与外人勾结，且即该项事变亦无从知悉。

关于救国会与张学良勾结一节，则辩称：

联合一致，抗敌救亡，为大多数国民之要求，且为自中山先生垂训以来，中央一贯之政见，并为国难发生以来政府逐渐施行之政策……救国会自无法禁止他人类似之主张，更不能为张学良所发全不同之通电负责。至张学良以释放被告等为条件，乃张学良行为，与被押业经两旬之被告等何涉？且我国上下要求释被告等者实不止张学良一人。以此为被告等勾结军人之证据，揆诸



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与马相侗（坐者）等合影

事理，实不可通。

关于西安救国会《答辩状》称“未知该地有此组织”；至于救国会敦促张学良援绥抗日的电报，则举出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曾同时致国民政府及傅作义的电文，内容大致相同，均在督促坚决抗日与出兵援绥”：

呼吁援绥，与西安兵谏，实属风马牛不相及之两事……若谓督促出援，即为勾结，主张抗敌，即属轨外；则当时报载此类文电甚多，岂均在应受检举之列耶！

1937年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时，这一问题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持续了7个半小时的审理中，除重复第一次审理提出的一些问题外，着重就“西安事变”与救国会的关系问题进行讯问。检察官翁赞年在庭上指称：“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

“七君子”全体否认这项控罪，并和全体辩护律师一致要求向张学良调查。检察官一再以“已在起诉书载明，不必调查”为理由拒绝接受，辩护律师群起与之展开了激烈辩论。律师们抗言道：“起诉书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法庭上争辩激烈，检察官理屈词穷，庭长不得不宣告暂时退庭评议，结果决定向军事委员会调查审问张学良的案卷，定期开审。

随后，江苏高等法院致函军事委员会调查张

学良的案卷。7月6日军事委员会查复如下：

贵院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五六三三号公函,以受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嘱检送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卷宗,以资参证等由。查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内,与沈钧儒有关之供词仅：“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的失却,汉奸日日的增加,而爱国志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等数语,相应函请查照为荷。

章乃器与西安方面的秘密联系

一封公开电报引发了“西安事变”？确实太不合理。控方说是,辩方说非,扯出张学良作证,仍无结果。随后“七七事变”爆发,“七君子”出狱,就不再有人追究此事了,但真相究竟如何？

其实“七君子”中的章乃器,与西安方面是有秘密联系的,但具体内容却至今是个谜。

张学良在1957年回顾“西安事变”时,曾谈到章乃器等人对他的影响：

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章乃器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也不出。”

张学良具体谈及与救国会领导人交往的文字,似乎只有这一处。先父章乃器在“文革”期间所写《我和救国会》中,谈到与张学良的交往也只有一处：“救国会接受过宋子文和桂系的两笔捐款,分别由宋庆龄、陈劭先转交”,除了上述两处自动交来的捐款以外,我不曾伸手向任何人要过钱,连见到张学良都没有向他募捐”。

自“七君子案”以来,救国会领导人和张学良都讳言双方的关系,以保护对方。当时父亲的一些回忆录是以外调材料的形式写的,会有各种人看到。他之所以没有多写,可能是由于张学良当时还不自由。记得父亲在“文革”初期得知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被抢,还谈到过会不会泄密的问题。

我曾问过父亲：“张学良当时和你谈了什么？”他回答说：“我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与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的。他曾向我解释,人

家骂我‘不抵抗将军’,但东北是我家乡,‘不抵抗’是别有苦衷,今后会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心迹。”父亲只说到此为止,我当时少不更事,也没有追问下去。

另据父亲在救国会时期的助手吴大琨在1983年回忆,救国会和当时南京的冯玉祥,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都有交往”：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看到过王炳南(西北救国会的代表)介绍来的张语还到过章乃器家。章对我说过：“大琨,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意指西安方面),你可帮我大忙。”

吴大琨当时就住在章家,很多事情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七君子”被捕的当夜他正在章家开会,父亲被巡捕房带走后,他曾与胡子婴商量：

敌人捕人,必要弄到证据,可能还要回来搜查,于是我们动手把有关救国会为日商纱厂罢工募捐的单据、名册等材料立即销毁,还打开了章乃器的抽屉,在他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

此事也可与章当时的夫人胡子婴在“反右”期间的一篇文章相印证：

在他(指章乃器)入狱的当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钱锁在抽屉里,叫我取用,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他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报的密码本。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给他毁掉或藏过。

胡子婴未提及有无与东北军的密码本,可能是因为这是一篇揭发材料,只能拣不好听的说(当时李宗仁在美国,白崇禧在台湾,在人们心目中仍是“战犯”),也可能与张学良当时仍被囚禁有关。

胡子婴说有“密码本”,而吴大琨说的是“密电本”,所述过程和细节也略有不同。如果另有“密电本”的话,完全有可能包含电文内容。

留给历史的谜团

从上述各种史料推断,救国会领导人与张、杨存在着秘密联系,不是空穴来风。“七君子案”作为触发“西安事变”重要动因之一,是没有疑问的。国民党CC派的陈果夫在事变爆发后的国

民党高层紧急会议上,主张枪毙狱中的救国会领袖泄愤(被冯玉祥阻止),应当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与后来《起诉书》上的控罪是一以贯之的思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与蒋介石存在着权力斗争,在改组政府和转变国策问题上,与张、杨应该是有联系和默契的。改组派的陈公博也曾谈到,当时东北军早有异动的消息,差不多也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早就知道了。”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共策动的。

当时中共中央与救国会的秘密联系,是以章乃器为主要对象的。毛泽东曾先后指派冯雪峰、潘汉年与救国会接洽,都是直接找章乃器。这从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和9月18日致救国会领袖信件的人名排序上,也可看出端倪:一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二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第一封信件的油印本,即从章家搜出,成为“七君子案”的重要物证。

桂系策动“两广事变”倒蒋时,曾邀请救国会派人参加,指名要章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但救国会从大局出发,予以婉拒。作为会务的实际负责人,章乃器确实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人物有联系,可能有多渠道获知政局将有大变动。但若如吴大琨所述,则此信息应首先来自西安,甚至是来自杨虎城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等人。

此事恰可与张学良的回忆相印证:他晚年称杨为“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是指杨受王炳南等共产党人影响至深。张自洛阳归返西安之后,曾与杨虎城大发牢骚,杨他对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小家伙们”即指王炳南等人。从吴大琨的记述推断,采用非常手段的方案,当在10月间王炳南派张语还见章乃器之前即已形成。杨虎城既有此腹案,待到张学良在救国会领袖被捕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便趁机向张提出。“七君子案”和张学良的冲动型性



西安事变指挥部 -- 杨虎城公馆

格,是促成“兵谏”的催化剂。

“七君子案”和“西安事变”联袂发生,国民党高层(如CC派)从形迹上认为有联系,才会在“七君子案”《起诉书》中列出“勾结军人”等控罪,终因未能抓到具体证据,在质证中败北。如果当时密电本、密码本被搜到,则可能是另一番情形了。为保护对方和自保,当时“七君子”和张学良都回避相互间的关系,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密电往来之事,在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也没有涉及,可能是因为不知情。张学良晚年出于各种考虑,一直避谈“西安事变”的详细内幕,最终带走了很多的秘密,实令人遗憾。

毛泽东曾在对柳 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救国会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

正是这一武一文两种力量的影响,引发了“西安事变”,促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大局。随着主要当事人的相继辞世,除非有新的历史证据出现,章乃器与西安之间密电往还的内容如何,“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之间有无更深的内幕关系,可能永远成为历史悬案。特将相关的线索列出,希望研究者们见仁见智,从史料中引发新的探索。(责任编辑 萧 徐)

论政党执政文明与党政分开

●
许耀桐

所谓政党执政文明,是指政党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公正、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推行公共政务,发挥公共职能的作用,推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体地说,政党执政文明包含下述若干重要的内在规定。

政党自身民主

政党执政要文明,政党自身必须是民主的、开放的。历史上的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政党,虽然也曾是通过赢得社会民主选举而上台执政,但由于它在党内实行专制独裁,不可能以自由、民主的方式,公正、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因而带来的不可能是执政文明,而是执政黑暗,造成政治倒退。

作为民主性的政党,党内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普通党员依附干部,全体党员必须效忠党的领袖的情况。党内的各级职务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不称职的应予以罢免。党内的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的,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政策、方针、纲领以及各项决定,都是经过自由、民主的讨论,按照民主程序作出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内的事务是公开的,实行公开性的原则,党的干部要受到监督,允许对他们的言行进行批评。

民主性的政党以参与政治选举为己任,在民主国家的条件下,选举是民主性政党通往权力殿堂的惟一阶梯。共产党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也只是为了实行民主、扩大民主。民主性的政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可以允许其追求连续的执政,只能通过政治选举的道路,不是对原有执政地位的自我固定化。

政党间接执政

政党执政,是以选派党的干部担任国家职务,构成的执政形式。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代表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只有一个。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凡是花纳税人税款的机构和人员,都是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样的公共机构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构,还有的是一些公共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等。除这种公共机构、公职人员外,不应有其它并存的机构。党政必须分开。执政党的干部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后,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工作和活动的。执政党和政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执政党提出治国的方略、政策,推出党的领袖、干部成为政府的领导者。执政党的职能在于提出施政纲领,政府的职能在于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并加以实施、执行。

合法执政

现代国家和社会是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和社会,因此,执政党执

政必须注重合法性问题。让马克·夸克的专著《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准确地概括了合法性的三个要素:被统治者的首肯,价值观念和社会的认同,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

首先,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在民众中不断增强和扩大执政的合法性。民众的认可和支 持,是执政党取得权力和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一个得不到民众认可和支 持的统治政体,虽然依靠权力的强制性能够进行统治,并能满足一定的经济发展要求,但终究因合法性的丧失,难以支撑下去。

其次,合法性的要求在于政党执政必须符合进步的政治价值观念并得到社会认同。政党执政要顺应和推进民主、共和、宪政自由的发展,并自觉地以这些政治理念作为衡量标准。实行公民选举、候选人进行竞选,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石,抽掉选举和竞选这样的环节,就没有民主可言了。没有民主,也就没有共和、宪政。共和与宪政是以民主为基础,以民意为依据,以民心为向背。比民主更深一层的是人的自由,民主的基础植根于自由。自由,是政治领域的活动中能为彻底地贯彻民主原则铺平道路的力量。执政的合理性还在于树立追求民众幸福、社会稳定和国家强盛的理念。

第三,合法性的要求在于政党执政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并厉行法治。

受制约执政

执政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否则必然滋生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孟德斯鸠把不受监督、滥用权力的政府称为“暴虐政府”。

执政党执政要受到制约和监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另一个方面是来自社会民意的监督,包括政治党派、社团、新闻舆论、民意调查等等监督。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监督执政的最为关键、最为有效的手段。任何一种政治权力作为运行完整的一个过程,客观上应该分成决策、执行、监督三种形式或环节。它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互相制衡。

社会民意的发展和发达,是监督政党执政最为广泛、最为敏感的手段。实行民意监督的必要条件是政务公开,民众有获取信息的自由。同时,民

众还有结社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在民意受到钳制的社会,自由成为虚幻,监督实际上已不可能进行。

在政党执政文明的诸内涵中,政党自身民主是执政文明的核心,政党的间接执政是执政文明的必然,合法性执政是政党执政文明的基础,受制约执政是政党执政文明的前提。归根到底,政党执政,涉及到与政权的关系。要做到政党执政文明,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问题,始终是围绕党政不分和党政分开的焦点展开的,但这两种执政方式之争,决不是一般的执政方法问题。党政不分和党政分开,体现了党政关系的根本性质。党政不分,必然是直接执政;党政分开,必然是间接执政。党政不分、直接执政是以党权为中心,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直接干预、命令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非民主式的执政;而党政分开、间接执政是以政权为中心,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提出大政方针的建议、通过法律程序立法、由国家政权决策执行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民主式的执政。因此,在党政关系问题上,是选择党政不分,还是选择党政分开,归根到底体现的是非民主与民主的性质区别。

如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权,就必然会要求实行党政分开。这个问题是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曾经作了透彻的分析。早在1941年他就指出,抗日的革命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共产党要在政权中掌握优势,优势从何而得?小平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他指出,如果采用“以党治国”的方式,就会破坏民主政权的性质。党政不分正是维护专制独断的工具,本身具有专制的特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

社 1994 年版)

在共产党执政史上,列宁第一个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但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的几任领导人没有一个愿意放弃专断独行的党体制。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同志不谈党政分开问题了,相反,还恢复了战争年代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时,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坚持党的领导被确认为由党直接管理和包揽一切,“党委负责”、“书记挂帅”等领导原则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各级党组织逐步包揽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事务。在立法工作中,党中央当时直接向全社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指示;在行政工作上,党组织那时完全处于行政第一线,国家政务事无巨细都须经党委决定;在司法工作中,党委也是直接审批案件;相当程度上党的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国家化、权力化、行政化。总之,当时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个人,权力的运作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制约,最终不幸地导致了“文革”中那样的个人专断和权力的滥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但从那时到现在,虽说政治体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党政职能、党权和政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列宁早就指出,党与政的职能不同。他说,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分来处理问题”,而党只对党员“开除党籍而不实行强制”。党对国家的领导属于政党的政治权威,属于政治权威的领导,而不是国家权力的领导。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自愿服从的力量,以政治号召力、说服力和政治影响力为特征,以人民的自愿服从和自觉拥戴为实现标志。只有国家才是政权,可以使用行政、司法手段实施强制。党不是国家机关,不享有国家权力。

由于党不是政权组织,所以党的地位不能高于国家,更不能取代国家。列宁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高于参政党”。虽然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这种领导关系不是上下

级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党员介入、思想沟通、路线指导、政策说服、获得转化的间接关系。

党当然也有权力,但是,党的权力不同于国家政权的权力。

首先,两种权力的来源不一样。国家政权是由全体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源于全体人民的授予,而我们的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各民族的先进分子自愿结合组成的政治组织,党的权力源于全体党员的授予。

其次,两种权力的大小不一样。国家权力的行使,体现全国人民包括党员在内的意志,党的权力的行使,体现的是全体党员的意志。当然,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党的这种代表人民利益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党对国家的领导,也要服从人民的意志,受人民意志的约束,因此,首先要尊重国家权力。

最后,两种权力的目的不一样。党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目的,是支持和保障人民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除此之外,党没有自身的权力目的。而国家权力是要由人民来行使的,这个目的也就构成了党的目的。

所谓党政不分,主要就是党政组织上的不分,党政组织混在一起,造成职能的交叉重叠。

关于党政组织分开的思路,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构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

党如何执政

党的领导是通过政治、思想的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

党的执政是提出治国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党提出宏观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全社会的行动,而不可陷于具体琐细的行政事务和经济管理的事务中。

党的执政是提出立法建议并指导立法。依法

领导或依法治国,即党的领导法制化,是政治领导的一种基本形式。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即通过法律和法令来实现党的领导。这意味着党把自己的领导活动纳入国家法治的轨道。

党的执政是选拔和推荐重要干部到国家政权机关中任职。党的执政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党的干部在政权中工作来实现的,要以国家政权作为执政中心。党必须把自己的领袖人物和主要干部推荐到国家权力机关中去。值得指出的是,党推荐

重要干部”,不是推荐所有的干部,是“推荐”而不是直接委任或决定,必须走法律的程序。党就是通过执政的这些党的领袖和干部来贯彻党治国的施政方针、主张。

党的执政是监督国家政权中的党的领袖、干部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来保证党的决议得到执行。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杜晋)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5.00
红色第一家族	马社香	30.00	5.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 25 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 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食无禁忌	(美)巴里·西尔斯 比尔·劳伦	19.00	5.00
党史札记 (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 (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周扬与冯雪峰》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周扬与冯雪峰的名字,一直被历史反复书写着。他们两人如何从蜜月期而交恶,他们的命运如何因“两个口号”的争论而扭结在一起,并在“文革”中难逃受批判的命运,他们的手又如何再度尽劫波后紧紧相握,留下了象征他们关系的《两只锦鸡》的美丽语言……本书以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材料,从政治史意义下描述了两人的曲折的人生道路,揭示了历史迷雾中的文坛恩怨。

《陈独秀风雨人生》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 60 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 30 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在刚过去的 20 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食无禁忌》本书的英文原名叫《健康区》,讲的是如何搭配不同食物的比例,以达到激素平衡,从而进入“健康区”。美国斯坦福大学游泳队请本书作者制订菜谱,结果,1992 年一举夺得八枚奥运金牌。据作者说,他推荐的食谱以 1982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防治心脏病和癌症大有益处。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 阎明复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有所接触”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面对康生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陪同康生见毛岸青

1959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1届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康生。

当时康生约摸60岁左右年纪,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

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磨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我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我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我们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剩下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这时康生问:“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然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



1967年,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由左至右)在一次群众集会上

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30分钟左右，准备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江青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杨尚昆在回忆党的历史时，谈到30年代的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

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 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我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

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我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这是你们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

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 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农业中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

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我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平，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平，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平，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

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 重掌社会部

康生 1937 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 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 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 30 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 30 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

双双自杀身亡。1968 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 年 2 月 4 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 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我们翻译界的权威。我们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 1974 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

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有关苏枚的案例,来说明康生的“迫害狂”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2002年年底,我因患重病肌无力症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

间,结识了著名的王新德、郑剑晖等医学教授。王老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护在毛主席病床边参加抢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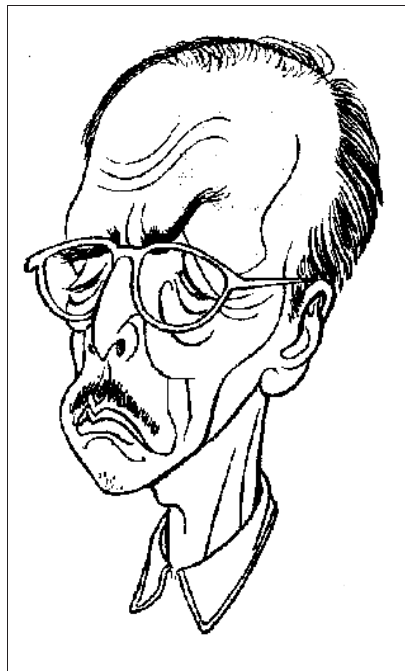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几位教授闲谈中,我获悉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王新德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

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脱了一劫。

由此案可见康生这个“迫害狂”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为所欲为了!

(责任编辑:林耀)



丁聪所作康生漫画

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记略

● 吴 江

1958年开始的那场大跃进影响深远,大跃进失败后其它惊人事变接踵而来。所谓惊人事变是由国内外两大事件交织而成的。其一是1953年斯大林之死和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以及他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短命改革,引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大挫折,使局势动荡,随之造成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其二是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党内意见分歧并由此最终引起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

这里只说前者。1953年斯大林之死无形中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党的关系丧失了一个由历史形成的制约力和平衡点,各国党的独立倾向加强了。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黑暗统治的内幕和由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此举开社会主义改革的先例,但它却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震荡、大分裂。大批共产党员退党。尤其是引发了匈牙利、波兰两国的骚乱事件,影响巨大。这本来是东欧国家对于苏联强加给他们的外来体制的一种抗议,这些国家意图发动一场改革运动。然而苏联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亦于此时发表了两篇专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从“左”的方面把两国的骚乱事件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被削弱的结果,这在客观上恰是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张目。稍后不久,当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整风运动中遭遇到党内外的诸多批评时,终至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反右派”斗争,极大地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爱国心。这也与上述观点有关,即错误地认为中国也出现了“匈牙利事件”的苗头。这是一方面。

然而,当苏联共产党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将大国沙文主义施加于中国,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

指挥棒转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对苏联当时加之于中国的各项无理要求(如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共同舰队等)坚决拒绝,毫不买账,这就导致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开始激化。当然,我们在这时也应当看到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毛泽东所起的作用。斯大林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中国与苏联并列为世界上两个大党、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或实际作为方面都不甘心屈居于苏联之下,而力图超过之。1956年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就是体现了毛泽东这位独出心裁企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同时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也应当首先在中国胜利实现,至少不应落后于苏联。毛泽东之所以不顾一切满怀信心地发动大跃进运动,说到底,也与他的这种雄心有关。

由于中苏两党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有分歧,于是一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开始了。我也因此两进钓鱼台(后称国宾馆),从事“反修”写作。

当时的所谓“反修”除了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外,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是保卫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主要学派),特别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斯大林则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免为国际反动势力所乘。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的观点。7月,苏联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

术合作的各项协议。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争论愈演愈烈。苏共及其影响下的一些共产党国家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党。中国党于是集中一批人在钓鱼台,从1962年12月起陆续发表7篇文章予以答复和回击。其中《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一篇由我执笔,经陈伯达修改,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当时批判修正主义曾以南斯拉夫作为靶子,实际上矛头针对着苏共,针对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曾试图按照自己的国情独立走自己的路,为此激怒了斯大林,被加以“反苏”、“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南共承受了巨大压力,以坚毅的精神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平反了这件事,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重新与之恢复了关系。我们虽然也与之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在与苏共论战的条件下,却指桑骂槐地拿南斯拉夫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至今想起来实在是一件憾事。这件事我也有份。因为1962年我也曾撰文批判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卡德尔,批驳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以及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共处”问题上的看法。卡德尔的某些看法虽也有失当的地方,但当时南共领导人提出这些问题来让人思考也是有益的,何况这是各国党的自由权利,对错都是各党自己的事。卡德尔在他的书中不少地方表现出南共独到的见解,对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也说了一些尖锐的话,在某些方面也涉及到中共。我的批判以《我们的时代与卡德尔的辩证法》为题,虽以学术形式出现,但对卡德尔的观点持过分批判的态度。此文除了以个人名义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外,还由当时中

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特批,由中联部将这篇文章翻译印发给中国驻各国使馆作为宣传材料之用,这便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1963年可说是“反修年”。这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中苏争论因此进一步升级。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在总书记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于1963年夏季进驻钓鱼台,撰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成员除正副组长康生、吴冷西外,有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和我,共七人(这七个人,现在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个了),并配备助手和组织专门翻译班子。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共撰写9篇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故称“九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写评论的工作程序如下:先定出题目分头撰写文章提纲,每篇提纲经领导小组初步讨论后,再由邓小平亲自到场审查定案(叫“定盘子”),然后写成文章,由小组讨论修改定稿。每篇定稿最后经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反修领导小组人员参加,邓小平为最后拍板人。当时毛泽东似在南方,我去书记处讨论定稿后并未留意这些文章最后是否经过毛泽东之手。很久以后,是负责党史研究工作的龚育之告诉我,这些文章都经毛泽东最后审阅,有的还有修改。

我在这次国际反修论战中无建树。分配给我的题目是关于当前世界的矛盾。这个题目如果从反修的角度,必然要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来,因为修正主义就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所污染。然而我考虑的却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问题。我觉得只有讲清这个问题才能打开人们对于当时



1961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报告

世界矛盾的视野。我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有讲清这个矛盾才有利于反修的大局。我的这个想法出乎领导小组的意料,他们觉得这个想法新鲜,但又感到没有把握。因此我虽写出初稿,但拖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故(我猜想是由康生促动)这个题目传到了陈伯达那里,陈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他把我叫去,说由他承担下来。因此另组一个写作班子(有我、邓力群、范若愚3人帮他),并移师“新六所”,费时一月有余,文章越写越长,三四万字也停不下来,势成“骑虎”。此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此项写作不得不中途停止。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撤销领导职务,狼狈下台,而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恰于此时上天。小组为此写了一篇专论作为“第九评”。这场国际论战到此也算以胜利告终了。但是斗争并未因此结束。苏共新领导在对华政策上仍继承赫鲁晓夫那一套,没有丝毫改变。中苏两党关系从此也宣告中断。

这场论战早已成为历史。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固然是不对的,应当反对,但是“九评”的“左”倾思想越到后来越看得明显,这也是一种不祥之兆。1978年至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从国际论战谈到国内的“左”,直接批评“九评”,他说:

二十年来国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

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在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自己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而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去鼓励继续搞个人迷信。

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进入了20世纪的80年代,诸多国际政治风云消逝之后,主持“九评”写作的邓小平也进行了反思,他向外国朋友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

邓小平还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这样说可以认为是把事情摆平了。这也是对于过去特定历史时期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这段历史总算已经翻过去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 范丽红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问题，不仅涉及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而且有助于了解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与日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他们父子在特殊的环境背景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满蒙铁路悬案”的由来

“满蒙铁路悬案”问题由来已久，它是 20 世纪初，日本以铁路权益为名妄图扩大对华侵略的产物。早在 1912 年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日本乘他有政治、经济上的需求和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提出“满蒙五路”权益的要求，希望修筑四郑（四平街 - 郑家屯）、郑洮（郑家屯 - 洮南）、开海（开原 - 海龙）、海吉（海龙 - 吉林）、抚顺 - 山城（或兴京）等五条铁路。日本是想以铁路权益作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工具。1913 年 10 月 5 日，中日双方互换了《借款修造铁路预约之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北洋政府迫于中国民众的反日爱国情绪，不敢履行五路协定，只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

继《四郑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之后，1917 年到 1918 年间，北京政府又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共计以

3600 万元的借款合同，攫取了吉长铁路“委托”满铁经营的管理权和吉会铁路的修筑权，获得了海龙 - 吉林、长春 - 洮南、洮南 - 热河之一点至某海港的“满蒙四路”的修筑权。后来，北京政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日本在同北洋政府的铁路交涉中，“满蒙五路”、“满蒙四路”、“吉长”、“吉会”铁路计划和借款本利均都落空。于是，日本决定以东北地方军阀实力派张作霖为交涉对手，企图假手张作霖实现其夺取路权的阴谋计划。日本与东北当局的“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由此开始。

“满蒙铁路悬案交涉”导致张作霖与日本矛盾日趋尖锐

众所周知，张作霖在统一东北乃至几次入关角逐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均得到了日本的好意援助，为投桃报李，一度“满蒙五路”计划在张作霖的积极合作下，四平街 - 郑家屯铁路于 1917 年筑成通车。郑家屯 - 洮南、郑家屯 - 通辽两延长线的承建，也在张作霖与北京政府进行沟通下，顺利达成交易。日本在获得两延长线修筑权后，立即向奉天当局提出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有势力人物的赞成”。郑通线于 1921 年筑通。日本按原计划应接着修筑郑洮线，因第一次直奉战争，未能开工。战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日本从此越过北京政府径自与张作霖交涉修筑郑洮铁路。双方商妥由满铁先付 800 万元工程费，中国方面由张作霖“通融款项”，并负责作保，1923 年，郑洮铁路全线通车。

1924 年 4 月，日本政府指派满铁理事松冈赴

奉天与张作霖进行会谈,开始交涉修筑开原-朝阳镇、吉林-敦化、长春-大赉、洮南-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这时张作霖正在积极加紧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了获得日军军费、军械援助,当即答应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并责成王永江与日本进行谈判,张作霖声明“当协商之际奉天省方面一定尽力斡旋”。应该承认,张作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早年确有对日妥协与勾结的一面,致使日本对满蒙铁路权益的要求得到了一定满足。

在东北的铁路计划得到张作霖的默许后,日本变得更加野心勃勃。1925年9月,日本政府指使满铁重新确定了从1925年起20年内修建35条线,总长8828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肆无忌惮地干涉和破坏中国铁路建设。日本这一无视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东北民众的强烈反抗。1925年,东北兴起“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以及日本直接控制的旅大,接连发生群众集会,提出“收回旅大租借地”、“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东三省民报》对日本的侵略罪行和张作霖的亲日政策也进行了某些揭露。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力图借助英美等国的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以便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

张作霖不顾日本之反对,于1924年成立了自营自建铁路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筑建东北铁路网。从1925年以后,张作霖以“自行筹款”方式,陆续建造了奉海(奉天-海龙)、吉海(吉林-海龙)、打通(打虎山-通辽)等铁路。并计划着手修建东北两大干线:一是从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瑗珲的西部干线;一是联系京奉路,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的东部干线。张作霖还筹备建筑葫芦岛。其计划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联系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口,同时,在南满铁路的沿线设卡征收货场税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我东北财富的掠夺。上述措施无疑具有张作霖企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从1925年以后,东北出现了一个东三省当局和商民投资修建铁路的热潮,这对打破日本长期控制东北铁路干线和垄断铁路运输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日本深为不满,认为东北修

筑的铁路是“南满铁路平行线”,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为此,日本曾多次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和抗议,反对中国建路筑港。张作霖对日本的抗议和警告,未加理睬。张作霖与日的矛盾日益尖锐。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采取所谓“满蒙积极政策”,加强对奉系军阀的控制。为贯彻“东方会议”精神,日本决定扩大铁路权限,向奉方提出建筑吉会(吉林-朝鲜会宁)、洮齐(洮南-齐齐哈尔)、吉五(吉林-五常)、延海(延吉-海林)、齐黑(齐齐哈尔-黑河)等六大铁路;所有东三省境内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概不许建筑的要求。旨在把朝鲜同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铁路连成一体,一旦建成日本便可以从朝鲜直接侵入“北满”腹地。这既有利于日本加强对东北的军事控制,又便于将掠夺的“北满”资源运往日本,日本实际上是想以推行“满蒙铁路计划”为突破口,实现其“满蒙分离政策”。“东方会议”同时决定,对张作霖采取高压政策及以武力驱逐其下台,代之以听命于日本的人物。

“东方会议”之后,田中内阁先后派遣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奉天当局解决“满蒙铁路悬案”,张作霖在处理这一棘手问题时均采取拖延策略。

1927年8月4日,吉田茂开始与奉天省长莫德惠进行交涉,态度非常蛮横,要求东北当局立即停止自筑铁路和不得反对日本在临江设领事馆,并威胁奉方,如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将考虑禁止京奉线专业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南满铁路拒绝载运奉军。张作霖对吉田茂的强硬态度非常反感,他说:“如果日方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我排除万难,自主的修建铁路。”7月29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本庄繁时进一步阐明其立场:“我最依赖之田中内阁成立不久就发生此种事态,若终将发生重大变化,便不胜遗憾。切望日本方面亦稳妥处理诸事,此意望转告田中首相。”

强硬外交失利后,日本决定采取怀柔的方法,派遣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作为首相特使与张作霖秘密会谈。为完成“满蒙铁路交涉”任务,

1927年8月,山本选派与张作霖素有深交的江藤丰二与町野武马与张进行初步交涉,当二人拿着“满蒙铁路计划”去见张作霖时,张作霖非常吃惊,他认为修建这几条铁路,犹如“怀里抱着炸弹”一样危险,表示不能接受。江藤丰二恐吓说:“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要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1927年11月15日,迫于内外压力,张作霖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议》上只签了一个“阅”字,这是张作霖在对日外交中所采用的一贯做法,以备日后翻悔之用。

根据协议规定,中国委托满铁建造以下五条铁路,即敦图(敦化-图门江),长大(长春-大赉),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伦),延海(延吉-海林)。张作霖深感这五条铁路好像插在横贯满洲的东满(中东)铁路上的五把钢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他自知《满蒙新五路协议》不仅仅是铁路问题,各铁路还有附属地,日本在“满蒙”的地位将由此而决定。因此张作霖反对日本将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的要求,总是推脱说如若那么做,势必出现“国论鼎沸”,奉系将“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对日本将密约变成公开协定的要求,采取拖延办法,迟迟不办理正式承包合同。

田中首相相对张作霖“关于铁路建设一事,究竟有无诚意”也表示担心。田中认为:“倘若确无诚意,尽管满铁社长带回签有‘阅’字的签字,包括缔造合同,恐张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证诸往例,事属必然。”至此,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中,张作霖已成了日本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障碍,很难再成为他们推行“满蒙政策”的好伙伴。经过精心策划,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将张作霖炸死。

“皇姑屯事件”的根源就是日本在满蒙铁路的侵略权益未得到满足的结果。

“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的继续及张学良与日关系的对立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日本关东军原本企图利用混乱制造事端,以武力占领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张学良子承父业主政东北后,日本决定同张学良就“满蒙新五路计划”继续展开交涉。此次

铁路交涉对于日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日本所谓的“大陆政策”主要是变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实现这个国策的基本方法,田中内阁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硬的军事侵略,即日军出兵强行占领东北;一种是软的经济侵略,即由日本借款修筑东北铁路。对于后一种方法,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也认为“这些铁路如果建造好,以后就没有文章可做了。”毋庸置疑,日本当然希望采取第一种方法。因此,迫不及待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借恭贺张学良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机,即提出了铁路交涉问题。甚至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也专程到沈阳规劝张学良借款修路。

张学良深知答应日本铁路要求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不仅是五条铁路问题,各铁路还附带有租借地,这无异于将东北变成日本的附属地,所以他采取了拒绝的态度。1928年7月23日,张学良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对日修约问题,余之意见,以为缔结条约,须缔约国双方合意之后,方能成为条约,否则专以片面的意见为前提而缔结之条约,即为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历来所缔结之各种条约,均属此种,故今后约满后,凡余与日本或其他各国缔结新约,自当以双方合意为条件,而努力达此平等目的。”

1928年10月间,满铁向东北当局提出日本借款修筑长大、吉会路问题。1928年10月3日,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等人商议对日交涉问题,做出了拒绝日本“满蒙新五路”借款要求的决议。10月7日,保安会正式答复满铁交涉代表江藤丰二,保安会不承认新合同。(指张作霖在北京所签预备合同)11月11日,东北代表邢士廉在上海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时亦表明了东北当局的态度:“吉会路草约发端于袁世凯时代,徐世昌成之,张作霖知此路为东省生死悠关,生前曾誓死反对,张学良决不签字。”11月16日,张学良在奉天接受记者访问时,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利用外资,兴拓实业、修筑铁路,余亦不反对,惟必中国人自动,更须看条件如何。”

其实,在张学良的内心正饱受丧父之痛,他深知张作霖的被害纯为日本所为,为寻求对日抗

争的强大后盾,摆脱日本的控制,张学良已决定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实现统一。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的频繁接触,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恐慌,日本公然进行干涉和威胁。面对日方的威胁,张学良庄严表示:“日方欺我太甚,誓死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12月29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阻挠,利用日本国内反对田中内阁的有利时机,毅然宣布服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东北易帜。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其意义深远:对内,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对外,摆脱了东北当局处处受日本人控制的尴尬局面,阻止和延缓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大举进攻和军事占领。东北易帜是年轻的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正面挑战,日本关于“满蒙铁路悬案”问题的纠缠,更加坚定了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的决心。

东北易帜后,1929年1月,日本派曾经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拜会张学良,“试图对铁路问题做最后努力”。1月10日,张学良与町野武马举行会晤。张学良宣称,有关铁路问题的谈判权利已上交中央,拒绝与日方直接谈判。这正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所力求的“中国人为中国人”的施政方针的具体体现,东北一切权利上交中央的思想理念,在张学良处理与日铁路交涉问题上,表现十分突出。

町野武马与张学良所进行的交涉失败后,转而与东北实力派人物杨宇霆私密商议,此前,杨宇霆在张作霖时代曾参与铁路交涉,二人准备就协商的问题发表声明。就在当天晚上,张学良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名义将杨宇霆及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处决于帅府老虎厅,史称“杨常事件”。有关“杨常事件”多年来史家说法不一,但总的来说它是东北当局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日本方面却认为,这是张学良关于铁路问题向日本所做的最后通牒。町野武马认为杨宇霆之死,使日本人借款修筑“满蒙新五路”的最后希望断绝了,提出必须和张学良决裂的主张。

就在日本积极与张学良就“满蒙铁路悬案”进行交涉期间,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护路斗争。东三省保路运动更是发展得如火如荼。1928年10月3日,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等人商议对日交涉问题,决定支持东

北民众的保路运动。1928年10月22日,由东三省议会和工商农各界代表组成的东三省路权保持会在沈阳正式成立。东三省路权保持会以“唤起舆论、援助政府保持路权,排除外人侵略为宗旨”,广泛发动东三省民众进行保路运动。

1928年10月26日,吉林发生两万余名学生、市民集会游行,反对日本修筑吉会路的爱国行动。在北平各校的东北学生也纷纷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敷设吉会、长大两路。11月9日,哈尔滨学生为响应吉林的爱国护路运动,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军警向游行学生鸣枪阻止,140余名学生受伤,造成“一一·九”惨案。张学良闻知此讯后,对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表态“学良行年二十有八,来日方长,岂能损失东省利权以贻后患,是以关于国家权利上决不让步。”

张学良对东三省人民在保路运动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声援,得到了东三省人民的拥护,时有“钧座恃重于先,国人奋争于后”的提法。在东三省保路运动,特别是在收回国权的热潮推动下,12月5日,张学良下令逮捕了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奉天亲日派赵欣伯等相继逃到大连。东北地区浓厚的反日气氛,成为张学良对日交涉的政治资本,在此背景下,张学良对日要求履行“满蒙新五路”的纠缠,坚决予以拒绝。

1929年3月26日,东北国民党党部在奉天召开成立大会,主张收回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1929年3月29日,张学良与满铁理事斋藤良卫会谈时声明:“就东三省来说,不仅张作相就是我也不能负责履行此项合同,所以尽管如此同我反复交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即使向南京政府交涉,恐怕亦无成功的可能。”张学良又郑重声明东北当局决不签正式借款和承包合同,并希望日方采取中日亲善的态度。至此,日本同张学良关于“满蒙新五路”交涉基本结束。

“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破产及张学良与日关系的决裂

张学良在抵制日本无理路权交涉的同时,加紧修筑东北自己的铁路,为此他改组了东北交通委员会,确定了自建、自营、独立发展东北铁路的方针。

自1928年7月至1931年9月,东北交通委员会主持修建了昂齐、齐克、洮索三条铁路,完成了沈海铁路延长线、呼海铁路北段、吉海铁路等线路的路轨铺设工作。其中,洮索铁路是日本提出的“满蒙新五路”要求中的重要目标,早在1925年,日本就把该路列入“满蒙铁路网”计划中,因为该路在“军事上极关重要”。张学良也清楚地意识到该线的重要性,不仅坚决拒绝了日本的筑路要求,还有在索伦一带屯兵垦田之举”,无疑是针对日本对东北路权侵略的有力回击。1930年9月,东北交通委员会制定了《建设东北铁路网计划》,预计10年内修筑以北宁铁路为轴心,连接葫芦岛港,纵横东北的三大干线的宏伟计划。张学良的排日思想十分明确。针对东北当局的铁路发展计划,日本政府惶恐不安,视其为“针对满铁,收复满铁的目的而修建的”。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更是直言“中国方面是计划依靠这些竞争线,将满铁两侧的货物运往连山湾或营口,使满铁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两侧四五十英里的地区之内,以便逐渐置满铁于死地,最后达到收回满铁的目的。”日本特别对张学良引入美国资本完成计划一事深感“事态决不能轻视”。

此时,在日本人眼里张学良同他父亲一样,已成为阻碍日本实施侵华政策的最大障碍,日本决定以武力实现对东北的占领。1930年10月,日本参谋本部根据东方会议的决策,在参照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早先出台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的侵华方案,确定了日本武力占领东三省的步骤,即第一阶段:武力占领东北建立亲日政权,取代张学良的地方政权;第二阶段:建立独立“国家”,从中国行政分割出去;第三阶段:吞并东北领土,并入日本版图。日本政府积极布置准备组织实施军事侵略前,又重开与张学良的铁路交涉谈判。鉴于张学良此前对日交涉的强硬态度,为缓和张学良对日的反感,日本政府决定改变其以往单纯抗议、对抗的办法,关于东北铁路的方针做了一些调整,不再逼迫中国方面借款筑路,而是要把东北自建自营的铁路,与南满铁路连成运输网,使东北自建自营的铁路变为满铁的延长线,以此达到对东北铁路实现全面控制的目的。

1930年12月,日本政府指派满铁出面与张

学良进行满蒙铁路交涉。1931年1月22日,日本特派外务省亚洲局长、满铁理事木村锐市为代表与张学良进行了会晤。双方商议决定就满蒙铁路的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谈判。为此东北交通委员会还成立了专门的交涉委员会,准备与日方谈判。但日方对铁路谈判并未表现出应有的诚意,而是一拖再拖。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是日本为掩盖它的军事占领计划所做的表面姿态,因为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中日双方关于铁路问题的谈判也未能举行。而且随着中日之间矛盾的激化,“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也就成了激化矛盾的重要舆论。此间,日本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制造“中国铁路包围满铁、危害日本‘生命线’”的谎言,为日本武力占领东北大造舆论。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致使日本政府与张学良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最终破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激化了张氏父子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日本采取断然的军事行动,以武力实现了对东北的占领。笔者认为尽管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长期推行侵华政策的结果,但“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的失败是导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氏父子围绕着“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与日本所展开的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挫败了日本妄图以修建铁路为名,扩大侵华权益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收回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它是符合广大东北人民意愿的爱国之举。

纵观张氏父子在“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还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特别是张学良在“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中,一味听命中央的思路和做法,影响到随后出现的中日冲突,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处理,并最终导致了他错误地执行了蒋介石对日冲突“不予抵抗”的政策,造成了终身的遗憾。

尽管如此,历史无法否认张氏父子在“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中为维护中华民族主权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后人也绝不应该抹煞他们的功绩。

(责任编辑 王海印)

汪精卫卖国文字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 王 鹏

1940年1月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首义”人员高宗武、陶希圣。当客轮驶入公海后,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随即,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际此意去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为止,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决不向外宣泄……”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不禁大惊失色,沮丧十分。然而,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中外。此“惊险”一幕,前后曲折。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而蒋介石对日的政策始终是迟疑不决的,一方面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侵略的浪潮中,他不得不勉强地举起抗日的大旗,又怕共产党势力强大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响应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对日调停,甚至时断时续暗中与日谈判媾和条件,意图是在合适的条件下,能够体面的结束战争,而面对日本苛刻的条件,他使用了惯用的政治手腕,即使不能与日媾和,也要击败国内的政治“对手”。

1937年11月,在国民党放弃上海前,蒋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门徒与戴笠的特务联手,组建了“别动总队”,在上海潜伏下来,对日军及其卵翼下的汉奸进行所谓的“挖心战”。因此,蒋介石命令在军事委员会的直辖下,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江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为常委兼书记长,主持此项工作。不料,国民党军队刚一撤走,这群人马上“一哄而散”,“江浙行动委员会”也就随之而瓦解了。上海成为孤岛后,杜月笙便离沪赴港。1939年汪精卫来沪进行组府活动时,蒋介石又想起杜月笙,意欲利用他的门徒破坏日汪“合作”。于是,蒋介石下令成立了一个“地下市政府”,名称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仍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等为常委。尽管杜未能亲自回沪主持工作,但他派徐采丞为私人驻沪代表,随后又加派他的总账房万墨林前来协助,这就说明他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既是政治性的,又有经济性的:所谓政治性是指他们除反汪任务而外,还在暗中勾结日本侵略者,搞“秘密交易”;所谓经济性是指他们勾结日方搞内地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活动。

《大公报》始终关注抗战的进程,对一切降日活动都予以揭露。在1939年3月间,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定》。4月5日《大公报》重庆版披露了这份骇人听闻的“协定”。《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为此撰写了题为《汪精卫的大阴谋》的社评,在对汪精卫的叛逆行径进行谴责后,发表了两点认识:“汪精卫的通敌卖国,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他在重庆时即已开始策动。汪氏的阴谋,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活动,是有相当规模的组织的。”王芸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谈了一点感想:“汪氏的阴谋,既策动如此之久,且有组织的行动,蛛丝马迹,布满沪渝,中央当早有所闻。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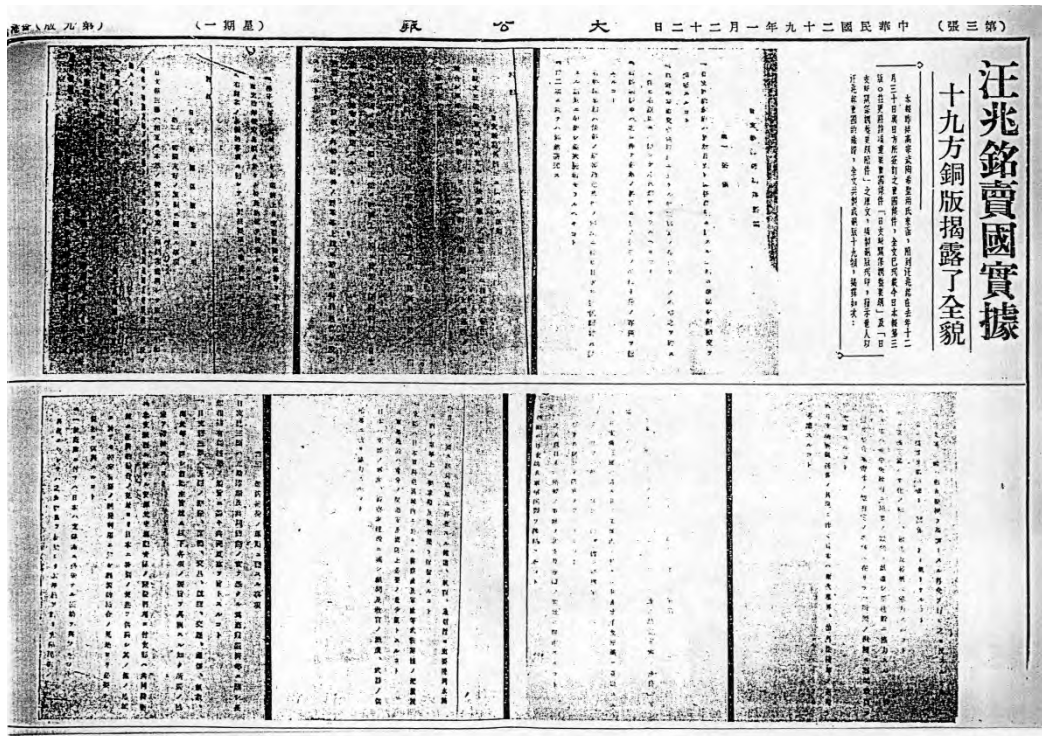
汪氏未离重庆之先,疏于防范,已是憾事;‘艳电’发表之后,中央只予除籍撤职的处分,并未发动国法,对于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遥法外,继续进行其大阴谋,宽大优容。语云:‘姑息养奸’,正汪事之谓。这是我们的感想。事至今日,中央再不容姑息,应速查明事实,发动国法,各治应待之罪。”这是指责蒋介石对汪精卫过于宽容,以致“姑息养奸”,并敦促国民党对附逆汉奸绳之以法,治之以罪。此外《大公报》重庆版还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法币,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

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他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汪精卫的行径,首先触怒了蒋介石。蒋不满意汪单独去和日方勾结,搞什么“和平运动”,而且准备成立的傀儡政府,也挂青天白日旗,也称国民政府。所以,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想抽它几根台柱,给汪拆台。因此,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的走卒。

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遂到香港向杜汇报。听罢,杜蹙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采丞兄,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汇报。”1939年11月5日,杜自港飞赴重庆,在张群的联络下,他

见到蒋介石。蒋面授机宜后,要求他从速返港,一切秘密进行。当时,杜感到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他又找到徐采丞,嘱咐急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跟他面谈;第二,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的送到香港来。黄溯初果真到了香港,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杜又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临走时蒋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托杜带去。杜月笙回到香港后,把蒋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徐按照杜的指令,把事情办妥,高宗武答应把“密约”交给蒋介石。

那么,高、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据朱子家回忆:“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宣传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也不过着



披露汪精卫卖国文字的《大公报》

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未酬,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缺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办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带着《要纲》秘密潜入香港。高、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每次如此。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一两天就送回来,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汪就命我往取。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现在细谈其内容不独没有必要,手上没有原本也无可能,反正这是见之报载人所共见之事。”另据参与谈判的日本人犬养健说:“当时密约会议,因恐高宗武泄露,所以警戒非常严密,日方由矢荻,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须留下,不得携出会场之外。据他们推测,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牢牢记住,一条一条写下,故与原约无异。”这说明高陶事先是有准备的。

此时正在香港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通过朋友的“串联”,1940年1月21日得到了秘本《要纲》和有关资料,还收到了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的亲笔信。高、陶在信中,极力解释参与密谈的卖国行径,其中有这样的话,1939年11月5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12月30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

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伴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湮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胡政之、张季鸾马上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们的住处,要金、徐立即把《要纲》内容抄下来,把原件拍照,并给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拍电报,通报此事,安排报道事项。徐铸成作为当事人,他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大约在1940年1月过春节的时候,一天下午,他们两位(指胡政之和张季鸾)把我和港馆经理金诚夫接到胡的家里,张简单地讲:‘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我从杜月笙手里讨来这份密约,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铸成,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你看完这密件后,即由诚夫抄录一份,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我们两人,埋头工作了两个小时,总算赶出来了。胡政之又核对了金的抄件,张则细看我写的社评稿,都点了头。张立即揣上密件原稿,坐上汽车,送去送还给杜月笙。”

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日汪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中有这样的卖国文字:“日华两国政府须根据‘附录一’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国交;在新国交恢复以前,既成政府经办事宜,目前加以继承,如情况许可时,再根据第一项原则加以调整;在事变继续进行,须谅解由此而发生的特殊情况的存在。”在“附录一”中,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行径更加暴露无遗:“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以互为善邻、团结一致成为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因此,规定基本事项如下:须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提携,特别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须确定

华北和蒙疆是国防上经济上日华之间紧密的合作地带。在长江下游地域,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还是销售一空。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在短短几天内《大公报》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连续发表社评,猛烈抨击:23日发表题为《附汪者应速悔悟》的社评,24日发表题为《暴露了汪日亡国条件》的社评,30日发表了题为《粉碎汪派“组府”阴谋》的社评。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经《大公报》香港版的及时披露,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

《大公报》香港版率先披露卖国文字后,汪精卫、周佛海等很是恼火,汪在24日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极力抵赖,竟说:“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周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愤慨之至。……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周在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两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泣下。”周在27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又谓此次高、陶发表文件,于吾辈大有不利,补救之法,在以事实证明其文件之不确。”日人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突然把作为日华两国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揭露了出来,发生了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的事件。……对于高、陶的暴露密约,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立即分别加以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但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我和板垣总参谋长从1月22日起到27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知道了这个报道,立即同汪、周、梅等会见。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

惟有长叹而已。”日人影佐祯昭在回忆中写道:高、陶“两人逃出上海,在香港把兴亚院指示的谈判草案原封不动地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

就在《大公报》香港版披露汪精卫的卖国文字前夕,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滋正在香港,他于1月21日也拿到这份文件,立即让中央通讯社向全国发布日汪密约的消息,22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还做了三栏的标题《汪逆卖国密约》、《经高宗武陶希圣揭破》、《条件苛刻甚于二十一条》,但并无密约的具体内容。23日《中央日报》才刊登了这份臭名昭著的密约的全部内容。23日《大公报》重庆版在《敌汪阴谋全盘暴露》的大标题下,也刊登了《要纲》,因《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事先得知消息,所以他还撰写了题为《汪阴谋的大暴露》的社评,揭露汪逆卖国实质。在23日的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蒋介石的《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称日汪密约“把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骨子里暗藏着机械利刃”;“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号召中华民国‘光复山河,荡涤汉奸腥膻,报复先烈仇恨’”。同日,中共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派卖国密约》的社论,指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坚持抗战的道路,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生路;一条就是对日投降的道路,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死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这次汪精卫的卖国文字被揭露《大公报》抢了“独家新闻”,而提供新闻材料的高宗武和陶希圣的命运却是耐人寻味的。高宗武此后在香港得到蒋介石奖励的5万元美金,并由蒋亲自批示给了“高其昌”的化名“官员护照”,得以出洋游历。他带着年轻的妻子赴美作了“寓公”。那时,5万元美金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从此,他在美国隐姓埋名,不谈抗战以及蒋汪之事。这是他接受蒋介石5万元美金的交换条件。之后,蒋还不断给他美元,陈布雷曾于1942年5月28日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而陶希圣呢?他事后到了重庆,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参与蒋的机密;陶还替蒋撰写了《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经陈布雷润色后发表。(责任编辑 萧 徐)

抗战时一场气象情报争夺战

● 蔡天新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各国战场的败局已定。中、美、英等盟军为了防止入侵东南亚各国的日军从东南沿海撤退，堵住日军海上退路，决定增兵台湾海峡，对东南亚战场的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但由于盟军对台湾海峡的气候条件不甚了解，一时不敢贸然出兵。所以，中国东南沿海的气象情报，成为整个战略的关键。经中、美两国谍报人员的多方侦察，发现台湾海峡的一个小岛屿上即乌丘岛航标站中存有丰富的气象资料。

找关系摸情况

乌丘岛坐落在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外的台湾海峡，隶属原莆田县湄洲镇管辖。乌丘岛分为大乌丘和小乌丘两个岛屿，大乌丘岛离原莆田市的平海镇只有 15 海里，小乌丘岛处在大乌丘岛的南部，与台湾隔海相望（现仍处于台湾当局统治之下）。由于岛屿面积小，又孤悬海外，故旧的民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个岛屿。但小乌丘岛地处台湾海峡中心点，是中国大陆通往海外的重要航道，在台湾海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0 世纪初，海上交通日益繁荣，台湾海峡过往船只增多，为了给海上通行的轮船导航，地方政府便在小乌丘岛上建立了一个航标站，并派人看管航标，记录海上气象变化情况，年长日久，便积累不少宝贵的气象资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掌握东南沿海的海上通道，动用武力占领了台湾海峡的众多岛屿，小乌丘岛是其中的一个。日军占领后，在小乌丘岛上建立了海上供给站，派兵守卫，封锁周围海域，禁止附近岛屿的渔民上岛，使本来就人烟稀少的孤岛，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为了尽快获得小乌丘岛上储存的气象资料，1945 年初，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梅乐斯海军准将同国民党军统总部联合签署命令，命令强调：据侦察在福建省莆田县沿海的乌丘岛灯塔里保存着最完整的气象资料，美国海军配合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以最短的时间夺取气象情报，移送盟军总部。命令签发后，中美合作所立即派人赶到福建，实施行动计划。福建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兼东南办事处主任李崇诗接受任务后，不敢怠慢，决定由中美合作所下属的东南训练班副主任兼第七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林超少将会同美方人员，共同筹划猎取气象资料的军事行动。林超接受任务后，马上着手前期的了解工作，但从美国海军提供的地图上查看，只发现湄洲湾外的海面上标有两个小黑点，根本查不到小乌丘岛的地点和方位。于是，林超又向福建省政府的地质部门打听小乌丘岛的情况，仍然一无所获。正当林超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想起刚刚就聘东南训练班警政系的教官刘浑生中校。2 年前刘浑生就任莆田县警察局局长，刚刚辞职来东南训练班不及 1 个月，对莆田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又是林超的学生，师生关系也不错。但由于刘浑生刚刚接受一项重要任务，正在闽东一带海湾勘察“盟军登陆点”。于是，林超马上向东南办事处主任李崇诗汇报，要求立即将刘浑生召回。一纸急电，刘浑生不敢怠慢，星

夜赶回东南训练班驻地建瓯的东峰。

当晚 林超少将邀请刘浑生共进晚餐。席间，林超和盘托出军统局本部的命令和完成该任务的难处，希望刘能助他一臂之力。一者由于师生关系，老师有难学生岂有不帮之理；二者此举乃抗日救国之大事，国人哪有推辞之词。刘浑生欣然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 林超带领刘浑生会同美方顾问、东南班负责人及特训班顾问张驰等有关人员，共同商讨了一个“夜袭乌丘屿，武装夺取气象资料”的周密行动方案。其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即日起成立“奇袭乌丘屿突击队”，归中校教官兼突击队指导刘浑生领导；二是突击队所需的特种武器和器材由美方负责提供，由美方派出2名军官负责特种器材的操作培训和维修；三是制定了突击队的组织机构和行动方案。突击队下设侦察组和行动队，前者从东南特训班第一突击营抽出10名具有侦察技能的莆仙籍学生组成，随刘浑生先期出发；后者由第一、第二突击营中挑选出150—200名善于水战的学员组成，编为一个中队，施以各种技术训练，随时待命出发。袭击方案由福建省东南办事处上报中美合作所总部，经美方代表华兹少校同意后，付诸实施。

1945年2月1日，时值除夕的前一天，10名侦察员在刘浑生的带领下，以回乡过年为由分散返回莆田。随后几天，这些身着便衣的特工人员，白天以走亲串戚为由，深入海边进行侦察，了解大、小乌丘屿的情况。晚上则陆续潜入刘浑生的驻所汇总情况。但因日军占领乌丘岛后，加强了封锁，几乎没人能接近日占岛。侦察员经过几天侦察，仅弄清了乌丘屿的大致轮廓、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岛屿周边的海水深度、潮汐流向、落差和岛上建筑物的外观等一般情况。对岛屿上的兵力分布、武器装备、岗哨布防等有用信息，一点都没有了解到。所以，大家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打入敌巢侦察，才能彻底弄清敌情。于是，刘浑生决定将10名队员分为5个组，一个组留在身边担任交通员和助手，其他4个组分别派驻莆田县的三江口、埭头、忠门、莆禧等4个海边活动点，并要求队员设法混入渔民中跟船出海捕鱼或下海走私，以便接近乌丘屿。同时，为了便于指挥，刘浑生也将指挥点搬迁到与乌丘屿隔海相望的莆

田平海镇。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江口驻点小组很快就有了意外收获。该组的叶、陈两队员在涵江结识了一个姓林的妓女，林某与驻乌丘岛的伪军大队长张秀宝（惠安人）曾是一对露水鸳鸯，便许以重金，邀其下海走私。由叶、陈二人出资金、船只和采购商品，办理有关货物出口手续等，由林某负责进岛与贩卖。计划从三江口偷运粮、酒、肉、禽、蛋品等至乌丘屿，以换取鱼干、鸦片、布匹等运回陆地贩卖，获利3人均分。无本生意对林某来说求之不得，她欣然应允。然而，首航时货物就被岛上哨兵扣押，林某要求面见张秀宝。情人天降，张秀宝喜出望外，上船检查货后，又盘问了叶、陈二人的底细，见所言与林某介绍的情况相同，遂深信不疑。此后，每隔3至5天就出航一趟，没多久，叶、陈两人就与海上的伪军们混熟了。加上他俩出手大方，很受伪军们欢迎，在同伪军的闲谈中了解到一些驻守小乌丘屿的日军情况，但仍然没有获得重要的情报。

在同大乌丘岛走私的同时，叶、陈又设法同小乌丘屿的日军做“生意”。他们结识了一个专给日军作翻译的汉奸，先送他一份厚礼，然后请他设法牵线搭桥，并许以重金酬谢。汉奸见有利可图，便极力推荐。日军因生活需要，答应叶、陈输送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特别强调要兴化米粉和莆田荔枝酒。但日军又怕泄露屿上的军事情报，规定只能在码头上交易，不准登岸。小乌丘屿只有一处靠船码头，其余地方都是悬崖峭壁、奇岩怪石，不能停泊船只。日军在码头上设了一个哨所，日夜派兵把守，不准中国人上屿，甚至连驻大乌丘岛的伪军头目接受任务也只在码头上传达。叶、陈的走私船得准靠泊后，千方百计同屿上的人员接触。在买卖中，他们又认识了屿上惟一的中国人，此人原籍莆田望江，自幼被雇到小乌丘屿与一个看灯的俄国人做伴。日军占领小乌丘屿后，俄国人逃命去了，而他却被日军留下来挑水做饭，久而久之，竟能通日语，因而自然成为叶、陈的买卖翻译。由于叶、陈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买卖甚合日军之意，并很快地同屿上的中国人成为好朋友。据了解日军对他控制很严，不准他离岛一步，最近2年，日军对他稍微信任之后，也只准许他住在小乌丘岛的老婆每星期来这里住一晚。为了进一步拉拢他，叶、陈

利用去大乌丘岛之机,多次给他老婆送礼,联络感情,并从这位“望江嫂”的口中套出小乌丘岛的许多日军情况。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叶、陈初步摸清了海上大、小乌丘岛的详情。原来大乌丘岛的面积有1平方公里左右,地势平坦,驻有伪军张秀宝大队,约有人枪200余,大、小船只10余艘,该大队名义上受驻南竿塘的“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逸舟指挥,实际上受驻小乌丘岛的日军小分队指挥。而小乌丘岛实际上只是露出海面的一块大礁石,面积约几十平方米,海拔约100多米。礁石之上原是乱石堆,以前为了建航标站将其铺成平地。在平地周围用乱石砌成一道约4米高、1.5米宽的围墙,围墙里建了一座10余米高的灯塔。面对大乌丘岛方向留有一个出口和一扇铁门,铁门日夜关闭,并有警犬守护。从铁门到码头有一条几百级高的石阶路,是通往灯塔的惟一通路。围墙内用石头砌成了5间房子,作为日军士兵的宿舍,还有一间电台室和一间地下储存室。屋前建了一座灯塔,塔楼分为3层,底层为一房一厅,房是那个看灯中国人的宿舍,厅则是日军的厨房和餐厅。中层是工作室,除了安装气象测绘设备外,还存放着几十年的气象记录资料,那便是突击队所要猎取的目标。顶层置有风向标、望远镜等设备,日军占领后又架设着一门能作360度旋转的勃郎宁机关炮。室外顶端悬挂着一盏能自动明灭的讯号灯,以警示海上的来往船只。灯塔的底面是个天然洞穴,洞底有一眼清泉,安装着提水设备,泉水不但可供驻守人员饮用,而且还可供应过往的日海军舰艇的急用。洞内还存有几百桶汽油,专门为日军舰艇紧急加油备用的。小乌丘岛原驻守日军30余人,1943年后因正面战场兵力不足,岛上人员陆续被抽掉走,当时只剩15人。连同家属6人,总共21人。其中军官、军曹各1人,士兵编制一个加强班,分别承担电台、警戒、驾船等勤务,测量气象和讯号管理由电台人员兼任。从兵力分布和装备用途的情况看,小乌丘岛不但是日军海上的导航站,而且还是日军在东南沿海的一个临时补给点。所以,袭击小乌丘岛不仅可夺取有关的气象资料,而且可以摧毁日海军的海上中转站。

经过一个月的侦察,侦察组初步摸清了大、小乌丘岛的具体情况,虽然在此期间刘浑生与林超

日日通话,汇报侦察的进展情况,但刘浑生还是专门向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递交了一份“已接近目标”的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大、小乌丘岛的地理位置、兵力分布、军事防务和交通、气候等情况,并提出突击方案。建议组织一支人员精悍勇敢、善于水陆作战的突击队,并立即带足各种战备器材,调到莆田平海进行应急训练,以熟悉水战环境。

两套方案预备,乘“东风”一举成功

林超收到报告后,立即上报军统局,并马上实施战斗方案。3月上旬,东南办事处在东南训练班中抽调了180名受过基础训练的学员,组成了一支临时突击队,以罗中中校为队长,又配备了一名姓李的上尉为副队长。美国海军方面也派出教官富勒上尉、礼本各中尉和3名美军机械军士和1名叫李保罗的翻译参加突击队。为了防止暴露行动计划,突击队以演习为名,从闽北的建阳出发,经南平、闽清,辗转永泰,于第三天夜间抵达莆田城内的梅峰寺。罗中中校一到莆田即同刘浑生中校接头。刘向突击队通报了敌情,并讨论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一个是以叶、陈的走私船为工具,进行正面强攻,因岛上日军兵力较少,我军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将其击败;二是等待雾天分两路偷袭。一路偷渡到小乌丘岛的正面,解决码头哨兵,并负责大乌丘岛方面的警戒,得手之后发出信号;另一路作为突击队的主力,偷渡到小乌丘岛的背面,将船停靠在离岛最近的地方,然后涉水到围墙下,爬上围墙,潜伏屋顶,当听到码头的得手信号声后,立即投弹,先炸死警犬和炸毁电台,然后组织火力冲开一条血路,直闯灯塔,猎取气象资料,夺取屋顶的机关炮,并用火力阻止大乌丘岛方面伪军的增援。任务完成后炸毁油库,摧毁灯塔,然后从正门撤兵,退回莆田平海。

东南办事处经过反复研究,批准了突击队的第二套作战方案。但第二套方案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须等待雾天;二是必须准备船只。于是,还是通过叶、陈那架“走私船”的艄公,不惜代价租用了4条民船和艄公。然后在船内装上美军装备的马达,并挑选了50名体格强壮、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让他们换上便衣,打扮成渔民,跟船出海,以适应海上作战环境。

然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连几天海上气候良好,使突击队的军事行动迟迟难以付诸实施。1945年3月中旬,机会终于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测,次晨海面将有大雾。林超少将立即命令突击队立即行动。当晚8时许,突击队分乘5条民船从莆田平海下海。队员们佯装为出海捕捞的渔民,将枪支弹药包装成“货物”藏在船舱里。走在前头的1号船是叶、陈的走私船,船舱内潜伏着3名武艺高超的突击队员,直奔码头,负责解决码头的哨兵;第2、3、4号船各配10至12名主力队员,由上尉李副队长带队,作为主攻队,5号船作为预备接应的船只,备有临时维修部件、药品及通讯器材,战斗时并不靠岸,在小乌丘屿码头与其背面礁石之间游弋,随时准备接应。罗中队长、刘浑生和2名美军教官都在这条船上,实际上5号船是此次战斗行动的临时指挥部。

当晚,湄洲湾外风平浪静,夜幕深沉,为了不惊动大乌丘岛的伪军,突击队的渔船不开动马达,顺着潮水缓缓前进,一路上没有遇上敌情和其他渔船。夜里11时许,海上刮起东北风,空中乌云渐布,海雾骤起,且愈来愈浓,能见度极差。这时,突击队已接近小乌丘屿,按原计划立即兵分3路,向小乌丘屿包抄而去。主攻队靠近登陆点后,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们纷纷跳入水中,徒涉到岸边的乱石堆上,进而冲到围墙下,搭上事先准备的软梯,一个个队员敏捷地翻上了墙,潜伏在日军宿舍的屋顶上。

与此同时,叶、陈带领的1号船也靠近码头,他们一边手持白布摇动示意,一边降下风帆直靠码头。因叶、陈是岛上的老卖主,日军哨兵均认识,每次走私船靠岸,都会额外给哨兵一些食品“咪西咪西”。所以,哨兵并不怀疑,站在船头看了一眼后,准备回哨所内叫醒另外2名哨兵一起去“验货”。哨兵刚转身,潜伏在船舱里的突击队员一跃而上,将其扳倒。其他突击队员迅速冲进哨所,将2名正在酣睡的日兵干掉。这一切行动只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叶、陈见袭击成功,立即发出信号。只听一声令下,埋伏在屋顶的突击队员纷纷将手榴弹扔进日军住宿的5间房里。刹那间,炸声雷动,大多数日军尚未醒来便一命呜呼。个别侥幸活命的日军,提着衣裤四处逃窜,但顷刻之间又全部倒在突击队的枪口之下。全歼了房内的日军之后,

李副队长立即带领一个小组冲进灯塔楼,几个队员冲进二层,搜取目的物,其余的队员冲上顶层控制了机关炮。队员们用麻袋将42本厚厚的海洋气象资料装了起来,抬进了船舱。其他的人员分头打扫战场,但只见横七竖八地躺着21具尸体,却遍寻不着那位莆田老乡。突击队员按计划油库里安放了定时炸弹,但又怕这位老乡尚未离岛,又发动队员四处寻找了一遍,仍未找着。由于时间紧迫,突击队只好集队撤离。分别登上2、3、4号船,发动马达立即返航。1号船因没有安装马达,故弃而不用,其他的船只在5号船的指挥下,迅速撤离小乌丘屿。

突击队撤退10分钟之后,埋藏在油库的定时炸弹引爆,只听一声巨响,小乌丘屿上火光冲天,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小乌丘屿上的枪声和爆炸声惊动了大乌丘岛的伪军,电台的中断也引起日海军基地的疑惑。1小时后,日海军基地派出一架侦察机在岛屿上空盘旋,观察岛上的情况。但因大雾垂海,能见度极低,日机既探不明乌丘岛上的情况,也没发现突击队的船队,从而使突击队能够安全撤离。

乌丘屿一战,虽然战斗规模不大,却是中美盟军精密策划、联手出击的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尽管击毙日军数量不多,但所缴获的东南沿海气象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抗战期间中方人员过分相信盟军,致使宝贵的气象资料未加整理和复制就拱手相送,这也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

(责任编辑 萧 徐)

敬告读者

2004年合订本已装订成册,请速汇款邮购。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2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1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2000年精装 无; 简装 70元

1999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汇款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 :100045 电话 :010-68532048

郑重治史 惠泽吾辈

——怀念父亲郑惠

● 呼燕燕 呼郑南 呼满红

爸爸去世已经整整两年了，我们一直不相信他离开了我们且永不回来，仿佛他只是出差在外或参加什么重要文件的起草，一时不能回家，突然有一天他又会提着公文包兴冲冲地回来，可这样的情景始终不能再现。多少次逢年过节，阖家团聚，惟不见爸爸，全家人不免悲从中来，伤痛不已。然而爸爸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留在我心中，他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同志、朋友、家人的件件往事总是那么鲜活地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在我们眼中，爸爸的生活没有上班下班之分，没有工作休息之别，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总是在读书或写作。他多年工作在中央理论宣传部门，因具有较高的理论文字水平，对工作认真尽责、精益求精，一直得到领导的信任，他直接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编写工作，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宪法、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等。我们很小时就知道，每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工作，爸爸为了赶写文章住在招待所经常几个星期不回家，回家来看到的也是他伏在书堆和稿纸之间的情形。在我们看来，爸爸的工作既枯燥又乏味，家里的事都要靠妈妈一人承担，对我们的关心也不够。然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国家日益兴旺繁荣，爸爸参与起草的这些重要文献的意义也日益显现出来，渐渐为我们所理解，爸爸不是只会看书、写字的书生，而是为国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理

论工作者。

爸爸对待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出了名的，他曾告诉我们，他多次参与起草的党和国家会议的重要文章、重大报告，正式印刷前他都要做最后校对，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爸爸书生气很重，除了读书写作，不会关心自己的健康，不会为自己争待遇。工作虽然劳累，但爸爸不求自己出名，甘做无名英雄。每天兴致勃勃地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他博览群书，写就了大量文章。然而当我们整理他堆积如山的书稿时，却发现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却很有限。正如同事们评价他的：半生俯首做嫁衣，文牍等身书生累。爸爸的许多老领导老同事曾说过，像《胡乔木文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等书籍，理论性、政治性很强，但涉及的内容复杂散乱，整理编撰需要水平高、熟悉情况又不惜力的人默默奉献，这些书离开你爸爸是很难编撰完成的。

爸爸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信仰坚定，对待工作任劳任怨，但思想上从不因循守旧，政治上决不盲从投机。1957年为了替划为右派的徐宗勉叔叔说话，主持公道，他自己入党差点儿转不了正。文革中为反对陈伯达，他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在干校整整劳动6年。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他努力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眼界更为开阔，心情更为振奋。对于后期遭遇的一些挫折和不公对待，他坦然承受，对于来自极“左”势力的攻讦，他奋起反击。在家中少见他抑郁消沉反而常常听到他兴奋的笑声。离休后，他干得最为痛快、最能体现他思想意志

的事,就是创办《百年潮》杂志,从创刊号起,他一一到老同志家约稿,从些须小事到每一篇文章,他都倾注了全部精力,为我们树立了呕心沥血做成一番事业的典范。《百年潮》文章的质量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与爸爸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爸爸自少年起就关心国家兴亡,大学期间投身革命,晚年他回忆起1948年11月离开北平奔赴冀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又亲历北平解放的经历,作诗二首:

一

又逢风鹤迭惊时,挥泪离平伴雨丝。
劳燕纷纷奔绿野,古城默默望红旗。
问关伍子轻生死,投止张生览画诗。
莫道书生难革命,长衫卸罢换征衣。

二

欢庆平津解放时,古城春雪白如丝。
万家歌唱千家舞,水样人流火样旗。
地覆天翻惊广宇,时移世易树碑诗。
战和声里军威壮,南望烽烟整炮衣。

热情充溢的诗句表达了他献身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一生追求真理,无怨无悔的心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爸爸心地善良,和蔼友善,对同志、友人、家人总是充满温情,因而他人缘极好,生病住院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看望。他病逝后,许多同志朋友满怀感情地向我们回忆起与他的友谊和曾经得到过的帮助:文革中曾被打成走资派而长期在外地工作的王里伯伯,是爸爸想方设法,帮他调回北京工作,他听说爸爸病逝的消息,

禁不住失声痛哭;单位里刚分配来的年轻人住房困难,爸爸立即帮助解决;龚育之叔叔与爸爸自中学同学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爸爸敬重龚叔叔,对他的工作、健康极为关心,龚叔叔搬家住房条件得以改善,爸爸也为之高兴,写诗祝贺:

勤修案牍不修窝,部长书生气若何。
诸葛庐低才自旺,子云亭小客常多。
龙离旧泽深藏尾,鹤换新巢巧唱歌。
穷达浮沉身外事,故人长忆亦长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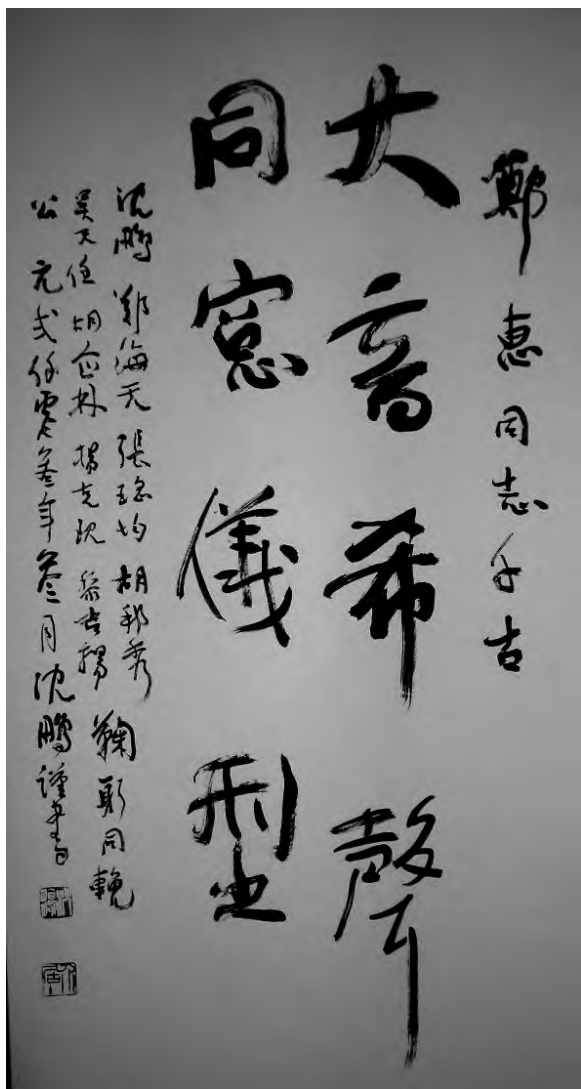
有一次龚叔叔因病住院手术,爸爸密切关注,得知手术成功,病愈出院,他欣喜万分,又赠词一首:

老大频怀旧。数平生,交游海内,几人诗友?烽火长沙曾共砚,击楫湘江酌酒。还试比,文章魁首。旭日东升乾坤换,趁青春,唱向光明路。管鲍谊,切磋久。

才华俊逸云龙走。发翻新,眦然奏刃,显君身手。屈贾深遗家国恨,今古娥眉见诟。风雨夜,鸡鸣相守。晚岁惊险刀圭劫,幸安痊,红树经霜



郑惠在北京医院与全家人合影



郑惠去世后，老友沈鹏书写的挽联

秀。望霁月，祝高寿！

爸爸结交的众多朋友中有许多忘年之交：有的是老领导，像胡绳老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老上级，爸爸视为良师益友，一方面认真虚心求教学习，另一方面又经常一起研究问题，交流思想，甚至争辩不休。有时又诗词唱和，相互切磋。

一次爸爸和胡绳老回干校看望，写诗一首：

重到高基日，风招淡淡云。
城宽村路近，农富稼耕新。
校址依稀认，乡情缱绻亲。
沧桑惊巨变，欣作白头吟。

胡绳老为他批改：诗意亲切，语句平稳。惟“亲”“新”同韵，“吟”尚可说是邻韵，“云”则相距较远。可考虑换一句，用“人”字押韵。

几十年深入的沟通理解，使他们在许多理

论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在许多重要文献中得以体现。而后来与爸爸结识、共事的许多年轻人，又视爸爸为良师益友，因为他思想开放，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处事公道。他们常与爸爸谈心，爸爸也总是尽其所能，给他们无私的爱护和有力的扶持。

爸爸视亲情乡情重如山岳，外地来京的亲友，不管事先通报的还是突然袭击的，爸爸总是热情款待，尽量让住在家里，于是家里常备多套客用被褥，被我们戏称为湖南驻京招待站。爸爸一生很勤俭，但对他人却很慷慨，有几个年轻的湖南老乡来京学习、工作，爸爸为他们交学费、交房租，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爸爸十分喜欢孩子，儿孙绕膝，是他最为舒心的天伦之乐，他对孩子爱护有加，期许甚高，但十分民主，从不苛求。妹妹满红做编辑工作，她写了文章后请爸爸过目，爸爸会很认真地修改，使文稿顿添光彩，妹妹的编辑水平很快提高，受益匪浅。爸爸最愿意与孩子们在一起，几天不见就想，外孙萧杨、天一都继承了外公喜欢读书、钻研等许多优点，萧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外公吟诵古诗文，耳濡目染，慢慢地也能和外公谈诗论文，深受喜爱。

爸爸为人谦和，说话轻言细语，加上深度近视，终日手不释卷的形象，使他确像叔叔阿姨们戏称的“老秀才”。他有“不食人间烟火”、“不理油盐酱醋”的一面，穿衣戴帽生活起居不求时髦，待人接物不设心机。但他更有内秀的一面，生活情趣丰富，乐观开朗，感情细腻，爸爸在家中有如大厦梁柱，有如温暖的壁炉，护佑着我们，给我们愉快生活的空间，无论他的智慧幽默还是他的迂拙迟钝都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欢乐。

爸爸喜欢诗词，对古诗词有很深入的研究，闲暇时背诗、高兴时写诗、与诗友和诗、为亲朋赠诗。家里到处可找到他不同时期写的诗、填的词，有些还保留着反复修改、逐字推敲的痕迹，让我们看到了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可惜我们没能请他一一注释，有些不了解写作背景和出处，但我们还是希望今后能出版他的诗集，来展现他诗人的情怀。

除了读书，爸爸也爱好音乐和体育。他会拉

手风琴,喜欢听音乐,特别是西方古典交响乐,而且常常琢磨作者和创作背景,力求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作品。他会打乒乓球、羽毛球,喜爱游泳,在大海里畅游时他不紧不慢,充分地享受着和大自然的亲近。

我们家长时间住房窄小,在干校多年更是无法言家,一旦回到北京,有了两间住房,爸爸似乎感到改善了许多,也要创造家庭的温馨,他亲自动手,设计打造家具,甚有情趣。

在干校的生活很艰苦,爸爸和许多同事还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作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时常在大会小会上遭受批斗,交待问题,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改造。但他乐观开朗,坚强勇敢。他带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拉煤,披星戴月两腿泥,到水田里放水浇秧,使我们经受了很大锻炼。挨批斗之余,爸爸不忘诗词爱好,常常和同事们相互打油唱和,自得其乐。当时胡绳老是头号批判对象,许多人不敢接近他,但爸爸出于对胡老多年的了解,在那样压抑紧张的气氛下,仍不忘与胡老互赠打油诗,爸爸曾将胡老那时写的一首打油诗背写给我们:

玄曹空论长,废话最称王。
量米姚家斗,拉鸡黄鼠狼。
秀才称郑顾,胖子属钟张。
骡小能生子,老牛本是羊。
大包营菜圃,猴子管书房。
邓胡分大小,朱刘论短长。
布点心房巧,蜂窝口席张。

(注:曹景元人称曹老玄,王主玉口若悬河;姚维斗管大家的口粮,黄展鹏人称老拉;郑惠和顾明被称为秀才,钟国豪和张先畴身材较胖;罗圣泉生了两个儿子,杨文炬大家叫他老牛;包英杰管菜园子,孙杰仁大家叫他猴子管阅览室;大邓胡即邓力群、胡绳,小邓胡即邓绍英、胡光明,朱仁祥个子矮小大家叫他朱部长,刘际启个子高大,房良均最年轻大家叫他小不点手很巧,席风云爱张罗)

读起它,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干校的叔叔阿姨们各显其能,小诗诙谐幽默地描绘了当时的干校生活和各人特点,其中“秀才称郑顾”中的“郑”即指爸爸,“秀才”是爸爸在干校时的绰号,可见他的才华是被公认的。

爸爸生性开朗乐观,生病住院期间,他精神一直很好,许多来看望他的亲友都说他不像重病在身,我们也一直以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直到爸爸逝世之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病中偶感”一诗中原有“心如古井微澜止,命似阴云大晓迟”之句,才知道他其实早就清楚自己病情较重。只是为了不使亲人们伤心着急,而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并将诗句改为“春烟秋雨征程老,今是昨非觉悟迟”。因此他更加珍惜时间,不放过可能的一分一秒时间。他接待众多的来访者,商讨工作,讲述自己亲历的重要事件及著述思路,医生多次制止也无济于事。他还整理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文集《程门立雪忆胡绳》,审阅了《朱基走向中南海之路》的部分书稿,加快了已经开始的《胡绳传》的写作。由于在突然大吐血而昏迷之前,他一直精神较好,并未遭受痛楚,因此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对康复满怀信心,还计划着做许多事。2003年2月23日,爸爸憧憬着完成自己的鸿篇巨制,携儿孙回故乡与亲友故交欢聚的美好情景,含笑离开了我们,只有他未能实现的宿愿成为留给我们的深深遗憾。

告别会上,爸爸的老朋友们都惋惜说他走得太早了,他们冒着寒风前来为他送行,大量的唁电、挽联、诗词、纪念文章褒扬了他的人品才华和一生的劳作,寄托了深深不已的怀念之情。此篇标题,用的就是石仲泉叔叔写的嵌入爸爸名字挽联中的两句,全联是:

郑重治史,潜心吟诗,敷教先进文化,创办百年潮;

惠泽吾辈,提携后生,秉持诤言资政,弘扬二胡学。

这样的怀念文字还有很多很多,其中的深情厚谊当让爸爸含笑于九泉,也让我们全家感激不尽,永志难忘。

2005年1月16日

(责任编辑 萧徐)

我的老伴金如柏

● 郑织文

金如柏是我的老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去世，去世前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炮兵政治委员。他已经离去了21年。21年来，国家巨大的发展和社会巨大的变化，让我一想起他来，就感慨万千。

“闹革命就没有家”

如今人们最温暖、最留恋的就是家。如柏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最不顧的也就是家。

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去世又早，母亲对他钟爱异常，虽家境贫寒仍供他读完高小。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江西省永丰，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恩江学会，并在家乡搞起了农会，17岁成为乡农协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大土豪刘协济抓住了他，在房梁上吊打，限当日交付一百二十光洋赎金，否则第二天一早押送县城。当时永丰城大西门前遍横“赤党分子”尸首。他母亲一双小脚，整整一天蹒跚奔走，当房子卖地、四处借债，傍晚才凑齐那笔钱。人赎回来了，他又多次外出寻找红军。30年6月，红军克永丰，他得讯到县城参加了红三军。走前母亲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是为了来养老的。”

他还是坚决走了，一走二十年。母亲顶着“土匪婆”罪名被赶离家乡，四处讨饭，在集市上被人用秤杆打瞎了左眼，在小油灯下织带子又熬坏了右眼。革命胜利后再见到他母亲，老人家一身缀满补钉的破衣和一头灰白的头发，只能用模糊的视线辨别想了二十年的儿子。

他后来专门请人在大理石上给母亲画了一幅像，用最好的木头镶成镜框，高高挂在墙上。

如柏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非常重亲情的人。但从1930年参加红军到1984年去世，他只在59年回过一次

家乡。他的生命，没有献给辛苦抚养他的母亲，没有献给家乡的山水土地，而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融化在更多陌生的山水、陌生的人们中间了。

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5年关押中见不到一个亲人，除了“交待问题”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每天除半小时“放风”，没有多少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自由。1972年被释放，本应在非常难得的家庭团聚中好好调养一下身心，他却让孩子们带着简单行装参军上路，奔赴天南地北。临行前全家坐公共汽车出去吃了顿分别饭，他说：“我很早离开自己的家庭。17岁闹农会，家里因我倾家荡产。要革命，不能顾家。”

就这样，刚刚回到阔别五年的亲人中间，孩子们就跟他一一告别了。他长期患心脏病，孩子们在外地得到他犯病的消息，都为他担心。他知道后一面埋怨我走露了消息，一面戴上老花镜给孩子们回信：“我的身体今秋比去秋好，勿念。你妈妈反映我的情况是不完全的”，“一点小病，已过去，何必大惊小怪。”每封信的末尾都是“祝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他不让孩子们耽误工作，更不准因他的病请假回家。其实他是非常想念天各一方的孩子们的。当时我家住在机关宿舍三楼的一个小单元里，严重的心脏病不允许他经常上下楼，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每天除了看书报，他就坐在那张漆面斑驳的两屉桌前，长久的望着窗外。从感情上讲，他是多么希望儿女们在身边以解除这寂寞的时刻呵。他自己去排队买菜，自己抹桌子、扫地。犯病后别人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但他不让子女们知道，不许他们请假回家照顾他。看到孩子们一封封来信，看到他们立功、受奖、入团、入党，每次他都激动得流下眼泪。孩子的立功喜报就放在他的抽屉里，有时间就拿出来，一遍一遍地看。

跟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子女们有出息。什么算“出息”，他有两条标准：生活上艰苦朴素，政治上追求进步。他说：走到哪里也不能忘记这两点。孩子们都知

道,跟他在一起最好少讲个人的小家庭建设、少讲调资晋级。他一生不为经营小家庭费神费时,也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最看重为事业献身的志向。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也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受了很多苦的人”

这句话是1984年3月如柏病危时,他的老战友、女将军李贞赶来看他时说的。

1934年王明路线时期,如柏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撤销团政委职务,“取消做政治工作的资格”。时任红军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把他留下来当文书,在接踵而来的肃反高潮中因李贞的保护他才免于死。

遭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他后来被分配到机枪连工作,背机枪,行军时走后尾,打仗时留在后面掩护。一次完成掩护任务后,疲劳过度倒在路边睡着了,幸亏余秋里同志从后面赶上来看见,叫醒了他,两人一起追赶队伍。如柏当时患严重的痔疮,犯病时走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还要肩扛机枪。他对余秋里说:“你放心,我不会掉队,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战争年代的艰苦以长征为最。因为走在队伍后尾,只好挖前面部队埋在地下的牛、羊骨头吃。他在自传中写道,过草地时,“我连自己的斗笠(牛皮的)、(鞋的)鞋底、裤带(皮的)都吃完了”。余秋里同志后来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很难设想完成这一艰苦历程的。”

战争年代的考验经过了,和平年代的考验又来了。1955年全军授军衔,因为某种原因,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上报中将最后改为少将。他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说明着他的资历和资格。后来在众多战友的反映下,定级时做了补偿。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我也是“文化大革命”后从余秋里、王恩茂等同志那里知道的。余秋里同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金如柏总是替组织、替他人设想种种事情。党的‘八大’推选代表时,他在昆明军区任副政委,党组织准备提名他出席‘八大’。他考虑昆明军区所属部队都是四兵团的底子,而他是从其他单位调去的,没有什么代表性,辞谢了。‘十二大’和六届人

大前他在军委炮兵,在酝酿出席‘十二大’代表和六届人大代表预选对象时,党组织准备提他。他又以调来炮兵不久,没有什么代表性和年大体弱为由,一再表示辞谢并建议从炮兵系统年轻的科技干部或教学人员中选一名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受了更严酷的考验,被单独“隔离审查”五年。五年中被关地下室、锅炉房,经常挨打,关押5年中被打了多少次,难以计数。曾连续四个月每晚只让睡两三个小时,而且必须开着灯、面朝上这样一个固定姿势。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自己从来不对我们讲,我们都是通过侧面才了解到的。证明这一切的,是释放出来后体检表上开列的多种新增疾病:肺结核、胸壁结核、脊椎、膝关节结核……如柏在关押中偷偷在报纸的夹缝里写了许多小诗,名曰“囚中吟”。其中几首写道:“伪造证据何其多,亲痛仇快无奈何。是非自有分明日,只恐病重难渡过。”“贺龙死党斗三年,残酷残酷史无前。左思右想理不通,这算是什么路线。”“历史清白乱追查,伪造证据往上挂。横眉冷笑相对待,胸有成竹我不怕。”听与他一起关押的老战友们讲:当时大家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唯有他经常和警卫人员大吵,整个走廊都听得见。为此他比别人多吃了不少苦头。被关押期间他也出了名:“思想最顽固”、态度最硬。解除监禁后这些事情又使他惭愧。他说,战士们都是执行命令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回家十几天他就带我一一道去警卫班,向战士们道歉。那些战士没想到这种时候他还会来,非常感动。后来一次到301医院看病,又碰到



1973年刚被释放不久的金如柏与郑织文合影



1967年11月同时立为中央“二办”专案四个战友。右起：金如柏，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原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原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

一个曾经和他吵得很厉害的战士，他主动上前握手。那个战士拉着他的手，流出了眼泪。

他并不是忘记过去、以求平安的人，他要忘掉的是——一切个人的委屈和痛苦。他终身不忘这样一件事：1931年苏区打“AB团”，与他同屋的一个战友被拉出去，指为“AB团”。执行的战士挥刀时有些手软，那个被砍的战友扶着鲜血直流的脖颈还在喊：“我是CP，不是AB团哪！”特别到了晚年，这些往事使他热泪盈眶。他反复跟我和孩子们讲：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不应该只是个人恩怨，多少战友倒下去了，在探求真理、寻找真理的道路上，中国革命经历了多么艰难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他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局面啊！”

关押中的三次见面

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当时如柏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军事法院院长，我是秘书。1967年7月，林彪突然在天安门召造反派：“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顿时总政机关就乱了套，加之如柏曾是贺龙的部下，1967年11月8日造反派宣布金如柏是中央“二办”专案对象，我是爪牙，即日隔离审查。我俩被关在总政太平庄集体宿舍的一间小屋里。不到一个月又将金带走，我俩被分别关起来。

我每日要到办公室劳动，中午拔草，晚饭后推垃圾，直至夜间十点造反派才将我的住房门打开，允许我回家休息。这些我都可以忍受，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如柏音

讯全无，他有心肌梗塞病史，还有没有？他睡眠不好，给不给他安眠药？有没有热水给他？衣服换了如何办？我是一百个放心不下。

十多天后，上午我劳动后上楼，听见一片吆喝声：“金如柏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喊声响彻走廊。他们在开他的批斗会，我无论如何要见他一面，当时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勇气，我急忙拿上杯子，倒了一杯开水，快步向会议室走去。我看见他面色苍白地站在中间，这时造反派头头见我进

去，大声骂道：“你干什么？滚出去！”一巴掌打掉了水杯，我的手被烫红了，水杯打的粉碎。我又看了如柏一眼，他睁着既无助又无奈的眼睛说：“你去吧。”我被推出了门，一下子坐在地上，我的心在滴血，他那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那么刻骨铭心啊！

第二次见面是四年后。这四年真是度日如年，不许通信，不许送东西，只知道他活着。属中央“二办”专案，关押在总政自设的“监护室”里，具体关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

北京黄寺总政宿舍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柏同几个“要犯”关押在黄寺院子一座小楼里，每天上午几个人轮流“放风”。第二天上午我就带着小儿子一伟来到那个小楼外，远远的等着。第一个、第二个出来的都不是，第三个出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面无血色，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和胡须都很长。他在房前大约十米长的小路上低头慢慢地走着，有两个战士看守。因为他一直不抬头，我很着急，于是跟一伟说，你推自行车从他面前走过，我在这边喊你引起他的注意。一伟从楼后边绕过去，我就在距他四五米的地方喊：“一伟，我在这里。”他一下子听出了我的声音，抬头看看一伟，又看看我。我比原来瘦了约四十斤，一伟也从十三岁长到十七岁，比他高出一头了，他惊奇的眼光不敢多看，就坐在路边。我俩一直等到放风结束后才回去。

我仍不满足，第二天我又带着二儿子前往，但等了一上午不见一个人出来，第三天又去，仍不见人。

是否因见了我们受刺激犯了心脏病？是否被专案组发现了要为难他？……又是许多没有答案的问号，留给我这颗受伤的心。

第三次见面仍是北京黄寺,又隔了半年多,如柏关在另一幢楼里。

也许是上苍想帮助我,这天我去黄寺办事,朋友说如柏关在B楼里,我去到那个楼前,被关押的四人已经“放风”在外。如柏首先看见我,当时路边正好停放着一辆拖拉机,他站在拖拉机西边不远的地方,我来到拖拉机东边,正苦于无法说话时,旁边来了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她把孩子放在拖拉机上玩儿,我急中生智主动与这一妇女答话:我被关押一年半就放出来了,现在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每三个月可以回来一次;大女儿生了一个男孩,母子都好;二女儿在合肥当军医;三女儿在内蒙兵团劳动;大儿子插队在宜川;二儿子在街道工厂吹瓶子;小儿子在集体宿舍院子里劳动,家里都很好。那个妇女摸不着头脑,瞪着一双莫名其妙的大眼睛看着我听我说。我说完不久,战士催着说“放风”的时间到了,如柏顺手在路边摘了一根柏树枝,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我,摇了摇手中的柏树枝,我勉强挤出一丝苦笑。

恢复自由后,如柏说那天是他关押四年多来心情最好的一天,因为不仅见到了我,而且听我亲口说了家中每个成员的情况,那一天他即兴写了一首小诗:

手摇柏枝情意长,我坐冤牢你不忘,
天河出在人间地,见面不言心齐放。

“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

1972年底他获释,从监禁地回到家整理东西时,从衬衣口袋里掉出一张纸片,上面就是这十一个字:“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这是他在被诬陷、被批斗、被关押、被殴打那个最艰难的时期身患重病、自虑难愈时,用颤抖的手写在一个药袋背面,然后叠好放进自己内衣口袋的“遗书”。他觉得可能等不到真相大白那一天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那一回他流泪了。他把那张揉皱的药袋片拣起来,用手掌展平,对家人说:“我从17岁到处找共产党,参加红军后党员开会,没有通知我还大闹了一场:我早就是共产党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别人笑我一顿。支部书记拿本‘党员须知’给我看,我才知道弄错了。后来我入党了,至今记得誓词有四句:一、遵守党纲党章;二、服从党纪;三、严守机密;四、永不叛党。”

这几句话他真正做到了。他对党组织的信任终身不改。对自己能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员终身不悔。1972年他解除关押放了出来,没有做结论,住在集体宿舍三楼,

生活待遇也比较差,当时有人劝他给江青写信,改变一下处境,他说“我一辈子不解放也不给她写信。”邓小平同志出来后,他找到邓小平同志,不讲自己的处境与待遇,专门讲“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存在的问题。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主管军队干部工作的领导同志说:“金如柏是个大好人。”

他的遗物中,有一组他生前最喜爱的照片。那是1979年底在漳州照的。一路上他反复念叨“漳州、漳州”。随行人奇怪,好像有什么重要事情在那里等他。漳州到了,他不顾长途颠簸的疲劳,一下车就去找一个什么广场。大家跟着他转了半天,才在一个绿荫环绕的露天会场前停下来。他眼里晶亮闪闪,说“就是这个地方,都变样了。他告诉大家: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就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话。四十七年重返故地,他百感交集。”

如柏平时是不喜欢照相的,唯这次没有反对给他拍照。走到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前,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要在这个地方留个影,并且叮嘱:一定要照好。他自己整整军容,摸摸领章,正正帽子,然后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并拢双腿,挺起了胸。身后纪念馆那面墙壁上,还可见到当年红三军留下的大标语:“扩大红军”。他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岁月,回到了那些共同奋斗的战友中间。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在眼前。今天,我好像仍然看见他在那个露天会场神采飞扬的挥手谈笑,看见他在“扩大红军”的标语前立正、挺胸、抬头。回想这些往事,总让我产生一个又一个梦想。当我们国家的许多历史真相披露时,我梦想如果他知道,肯定会比我们更兴奋,因为他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一个满身伤痛的胜利者;我甚至梦想有一天,他突然回来站在我的面前大声说:“我回来了!当年赤脚参加革命的他,又回到了今天已经繁荣富强的祖国。”

他晚年曾经一笔一划地给孩子写下自己参加革命的情景:“1925年五卅运动,我一个十六岁的学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最先接受的革命道理,就是列强欺压中国,中国是一个睡狮。”现在列强不敢欺侮中国了,睡狮业已警醒,他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如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知道我心中的梦想实现不了,但这些梦永远是我的精神寄托。在梦中我看见他赤着脚板,满身伤痛,佩带着将军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组成的全部光荣,与千千万万已经牺牲的战友们一起,走进共和国的史册。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政治史意义下的文学史写作

——《周扬与冯雪峰》序言

● 周巍峙

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感到甚为沉重。他从理

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子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扬的确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一个全民反思的年月里,周扬同志真诚地、动情地向那些受过伤害的同志致歉,同时泪眼模糊地剖析自己。在谈到30年代文艺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对鲁迅先生的意见尊重不够。作为一位文艺界长期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他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想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比周扬同志长5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



周巍峙近影(徐庆全摄)

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建国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到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到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冯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在这次历史的会面之后,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文章中两人胸怀宽阔,对历史有深刻认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因在文艺界工作多年,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关系,我也有所了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徐庆全同志才将这部《周扬与冯雪峰》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读完全稿,提提意见,特别表达了希望我为之写序的愿望。

《周扬与冯雪峰》全书25万字,比较准确地描写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牵绊、纠葛、恩怨,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读完这部书稿后,虽然对我很有启发,也让我颇有感慨,但要提笔写序却让我十分犹豫,难以落笔。

首先,虽然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青年,在上海左翼文艺界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音乐活动,与音乐界领导比较熟悉,但与周扬、冯雪峰、夏衍等人并未见过面。“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我虽然在报纸上看到,但认识不深。对

于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关系,根本不了解。

其次,建国后,我直接在周扬领导的文艺部门工作,但与冯雪峰在工作上的来往不多。只听说二人之间关系不很融洽,我也不很关心。及到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批判冯雪峰,1955年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将冯雪峰定为文艺界大右派等几次“左”的批判运动中,扯到历史旧账,扯到“两个口号”论争,我都感到十分意外。我因对于这种伤人、伤文的批判斗争运动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总感到在运动中一些有才华的人被打倒很可惜,对工作、创作是很大的损失。加之我业务工作很忙,只参加了必须要求参加的一两次会,对整个批判过程基本上不关心。因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一些情况,仍旧停留在30年代的印象中。因此要我作序感到不够格,难以应允。

不过,我还是愿意为这本书说点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政治方向一致的文艺口号竟在文艺界争论了几十年,最后被江青利用,成为在文艺界打倒一切的突破口。这段历史是值得我深思的,这一段“公案”值得我们搞清楚,应该加以分析总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时,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参与者之一。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我认为,这一口号对于抗日救亡、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和文艺活动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周扬文章发表两个月后,有同志要我为进步刊物《生活知识》写文章,我就写下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我的看法是,“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文化运动”,具有“一致主张唤起民众,建立民族文化的国防,巩固意识上的阵线,作抗敌、除奸收回失地的准备”的作用,因而在音乐方面“实有建设国防音乐”的必要,并进而发出“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的号召。我还提出,“建立国防音乐,必须使音乐大众化”,竭力写得非常通俗,使农工商学兵、老幼男女都能懂得。只有大众能明了歌词的意义,才能形成大众一致的救亡意识”。

因为持有“国防的”,同时也是“大众的”看法,所以,后来读到冯雪峰倡议经鲁迅首肯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我也是

拥护的。我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都是抗日的,都是对的。因而对于“两个口号”大争论很不以为然。及至后来这又成为冯雪峰被定为“右派”的罪状之一,我更是不理解。特别在1966年,我读到江青和林彪共谋所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江青污蔑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是“文艺黑线”的说法,让我不寒而栗——30年代进行左翼运动的人,都是提着脑袋在为革命工作,怎么都成为破坏革命的“黑线”人物了呢?后来我也成为这条“黑线”的头目被残酷批判,但从心底来说,我始终认为左翼文艺是革命的,这样的批判是颠倒历史的,因而对许多现象产生疑问,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文革”浩劫后,“两个口号”更闹得沸沸扬扬,是非颠倒。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来看,我认识到:周扬和冯雪峰这两只锦鸡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只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放在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的长河中,在政治斗争中来考察,这样的悲剧不是他们哪一个人造成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氛围,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他们二人关系的每一次变化,同我们党对文艺运动领导上的失误和挫折,同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的风风雨雨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看到这一层后,我很希望有人能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层次上考察文艺运动的历史。因为我觉得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才能很好地总结这场争论。为此,80年代初,冯文彬同志任主任的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时,作为委员的我便向冯文彬同志提出,趁着参加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老同志还健在,应当尽快搜集资料,并组织人员研究总结这一段历史。当时,我虽然兼任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但我觉得力量不足,对这一段的文艺史实进行分析总结,还是应该由党的有关领导部门来进行比较合适。但是,因为这个委员会事务繁多,或其他原因,这个建议也就没有实现。

为了弄清一些问题,我也看过周扬和上海文化界一些党员领导同志在延安时谈到他们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如何坚持党的斗争,开展革命文艺工作的情况,也看过周扬写的自传、回忆录

等文章,并在参与筹办一些30年代文艺先驱,像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人的学术纪念活动时,也多次讲过这一观点,目的是寄希望于一些文学史研究家,希望他们完成这一研究。但是,坦率地说,尽管关于30年代文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但以周扬和冯雪峰的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我很少看到。现在读到徐庆全同志这本书后,留存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又被激活了。

作者徐庆全同志,从1996年开始,致力于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也许正因为他不是研究文学史的科班出身,他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反而是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不仅仅局限在文艺范畴内研究,而是把文艺活动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考察。书中对周、冯二人关系的考察,也是基于这个大舞台。舞台上远景,是我们党一幕幕波澜壮阔、丰富曲折的历史影像;而近景则是文艺运动历史上的一朵朵浪花。远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动的周扬和冯雪峰的形象,也就鲜活起来了。两人50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还原到一个个历史场景中去;进而,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建国后几次“左”的大批判运动的历史,也在这种考察中清晰起来。

比方说,三十年代周扬与鲁迅之间不融洽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没有人云亦云地单纯纠缠在个人恩怨上,而是从30年代整个上海大的历史环境以及党的组织原则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作者看来,考察周扬与鲁迅的关系,30年代上海白色恐怖是最主要的线索。正是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的日渐加剧,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严重破坏,特别是1935年对田汉、阳翰笙等文化界党员的大逮捕,导致周扬等人行动更不自由,没有与鲁迅及时沟通的条件,才加深了鲁迅对周扬的一些误解;而远在陕北的党中央更难以得知上海党的组织的具体情况,才指示冯雪峰先与鲁迅等非党人士联系,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合理的,周扬本不应为此耿耿于怀。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周扬居无定所,行动隐蔽。鲁迅虽然名气很大,为了躲避迫害,也曾多次搬家,周扬和鲁迅难于及时沟通,沟通不到位,误解也就产生了。作为30年代过来的人,作者的这一分析,在我心中引起共鸣。

因此,我很看重作者从历史大场景来定位整

个左翼文艺运动史这一特点。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常听到周扬提到的一句话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而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意味着文艺界的每一次运动,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学史,如果不与政治、历史,也就是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要想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很难的。徐庆全同志在涉足文学史研究之前,就具备了丰富的党史知识,这就使他对文学史的研究,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感。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史实说话。书中的资料非常丰富,有许多是首次亮相。徐庆全同志是从历史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实证史料等素养,他是具备了。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功夫。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有两个方面来源:一是留存在文艺界人士个人手上的书札和机关档案,这些都是未曾披露的,也只有有心人才能搜集到的;二是文艺界人士口述回忆。听他说,自 1996 年转到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后,他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两项工作。他先后采访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我也是在他来采访时认识他的)。抱着“历史的书写从来就不是伟人的专利”的想法,作者采访的对象十分广泛,既有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重量级人物”,也有当年参与历史事件的普通人员,甚至只是高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广泛的采访,同一事件不同背景下,不同参与者的叙说,便于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汇总历史全貌,进而得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采访工作又促进了作者对文艺界档案材料的挖掘和搜集工作。且不说书中的观点如何,就史料而言,此书的出版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具备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品格,古人称之为“史德”。这也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按照古人的说法,“史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秉笔直书,“誉人不益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二是对于此前不甚清楚的、或者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经过自己的探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具有学术探讨的勇气和睿智,尽力追求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他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却不是单纯地铺

陈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地描述历史。应该说,这种探索难能可贵。

当然,我也不是对书中的观点或分析都赞同。而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学术研究也同样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况且,一本书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解决,同时也肯定有某些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和认同,也不妨碍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是为序。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书屋 2005 年第 4 期目录

一孔之见	进入古典中国的五部经典	张远山
不吐不快	岂不冤哉 ——谈《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一文对陈寅恪的曲解	葛春蕃
	也谈华沙起义和巴黎起义	王鑫
	我看《人言》事件”	散木
边走边看	“稀奇古怪的一对” ——克林顿与格林斯潘	陈伟
春夜读史	一片降幡出石头 ——古都史话之四	雷池月
	廷杖三题 ——孟森《明清史讲义》读后	栾保群
	从“糖醋活鱼”到道光皇帝	板儿爷
两性世界	跌落后的中西女性 ——中西女儿国之比较	黄金城
	绣鞋打个相思卦	黎荔
灯下随笔	美丽,然后贴水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赵维
书里书外	杂读八记(下)	朱亚宁
书林折枝	恶的平庸 话讷《毛主席语录》 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	孙传钊
天人关系	敬畏自然:中国语境下的尴尬	胡庄子
名家心曲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么错? ——从米兰·昆德拉《一个变奏的导言》谈起	程亚文
经典回眸	莎乐美 历史和艺术	景凯旋
刊海一叶	被人遗忘的民国电影刊物	余凤高
来稿摘登	漫画一则 “揽道学之终始,亘湖湘而有光”	谢其章
		贾梦华
		吴仰湘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 5.00 元
地 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 话	0731-5791300 5563097	传真 0731-5790197

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

● 苏育英 邬谟侠

编者按 张志新,女,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着国家的混乱局面,她独立思考,对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对毛泽东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有深入的剖析。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之后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张志新尽管受到非人的折磨,但仍不肯认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她被反绑着双手拉出牢房,一把手术刀野蛮地切断了她的喉管,使她发不出正义的声音。两小时后,张志新在大洼刑场被枪决。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对张志新冤案的复查汇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坚决主张尽快平反。他在会上说: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我主张和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其后,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此案平反,震惊全国。

今年是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两位作者写出了《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一文,当年力主为张志新平反、现年92岁的任仲夷老读到此文非常赞赏,将这篇文章推荐给本刊。他在给杜导正同志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现特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坚持真理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每年的4月4日对辽宁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沉甸甸的值得永久纪念的时日。因为这是党的好女儿、好干部张志新烈士殉难的纪念日。到今年,张志新烈士已经离开我们30周年了。张志新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她平反昭雪后已广为传播。在她殉难十周年之际,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等中央和原省委七位老一辈革命家都题词,予以纪念。她的英名已载入《辞海》史册,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中。她的独特斗争的事迹,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40多年前,张志新同志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她1930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教师之家,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大学教育。从军

队复员到地方后,从事理论、宣传和文艺工作。她性格开朗,热情好学,多才多艺,勤奋工作。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她同众多的党员干部一样热情参与。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造成党和国家的混乱,社会上打、砸、抢风行而起,张志新则由疑虑、清醒转为愤怒,痛斥林彪“四人帮”种种罪行,自觉地、坚定地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于1969年9月在盘锦市省五七干校被捕,于1970年8月被判无期徒刑,直至1975年4月4日为坚持真理而殉难。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并于3月31日召开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平反昭雪。

张志新同志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斗

争事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刘胡兰时代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窃踞党和国家高位的反革命。同这类伪装的阴谋家进行斗争,必须具有马列主义水平和高度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真理,捍卫党的正确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时代英雄,她是先进共产党员的表率 and 楷模。

张志新同志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一种浩然正气?在她的斗争事迹中有哪些思想、品质、精神值得我们永久学习?这就是: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张志新同志于1954年入党,她在入党志愿书中曾写“我在任何环境下,都将坚持革命斗争……永不中途动摇,永不叛党,永远跟着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目的,将献出我的青春和生命。”1969年12月,在被拘留的监狱里,她曾写“: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地宣读了誓言: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为人类解放而献身,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张志新同志这种伟大的理想和信念,绝不是建立在表面和口头上,她勤奋好学,始终掌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深入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林彪“四人帮”的种种阴谋言行。在当时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她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管在干校、拘留所和监狱里,她都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她从这些著作中学到的理论,深刻思考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研究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写出了十几万字质疑材料。她运用这些理论武器,联系实际,对历史和现实,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得出正确结论。她看清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从而对文化大革命由参加、疑虑到清醒。张志新同志的可贵之处,就是从社会上发生的大量事实中,上升到共产党人理论上的认知,并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这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从而坚定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坚定了自己的政治方

向、坚定了政治观点、坚定了政治立场。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通知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首先要坚持理想信念。在各个历史阶段,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应该是终生不变的。

再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党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清醒和坚定。她对党坚信不疑,在艰难严酷的时刻,把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看成是改造自己、纯洁党性的磨练。她在狱中六年,针对审讯人员的提问,写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万言书。她明确宣示“:一个党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作为共产主义者,应该要求自己,在斗争中提高政治修养,对敌绝不稚气,对自己也不放松。”在斗争中,她不断探索真理,孜孜以求改造自己,纯洁自己的党性。她说“:对错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



张志新在中国人民大学时留影

解决矛盾,才能合乎党性的判断。”她庄严宣告,“对关系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看法,是忠于党的表现。”她在监狱中每次审讯总是高昂着头,她说:“共产党没有低头的习惯,要想革命吗,你就应当是个强者。”她的万言书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1970年6月29日的夜晚,在狱中她借着微弱的灯光,把手纸裁成一块块,把地板上紫红色的油漆一点点刮下来,用水润湿涂在纸上,把染红的纸贴在胸口上,用体温烘干,最后扎成一朵精致小红花,表达她对党的深深的怀念。在以后几年党的生日时,她又做了十几个精美的圆形、长方形、三角形的小书签,把自己忠于党的誓言写在书签上,时刻表达她对党的情怀和热爱。在她入党十五周年之际,她自己谱写了《迎新》歌,歌词中说:“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宣读了誓言……十五年后的这一天,我严肃接受了党的审判,不是我违背了誓言,为什么没有‘落案’,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追求真理,坚持战斗……铲私根,战恶浪……向前,勇敢接受考验,迎接胜利的春天。”她多么渴望这个春天的早日到来。

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先进性,不惜舍小我而为大我。她抛弃了温暖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及年迈的双亲等21位亲人,身在监狱的她给爱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把我彻底忘却。”她表示:“一个人不管生与死,只要为了革命就有意义。”当张志新年迈的父母知道女儿被冤屈之事后,其父在梦中见她 and 妹妹在舞台上曾经演出过的《魔鬼舞曲》、《悲歌》、《终了曲》后与世长辞。而其母则在病中坐起,没有眼泪,怒目而视,并激愤地说:“不看到志新昭雪的那一天,我死不瞑目。”谁无高堂、谁无爱人、子女、兄妹,张志新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纯洁的党性而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反哺之情、神圣的爱情和子女骨肉之情而被迫离开了她所有的亲人。

三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张志新坚持真理,凭她的坚定信念和纯洁的党性,在共产党的政权下,敢于同林彪“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当时的政治观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触犯政治禁区的。她捍卫

党的正确路线,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她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三忠于”,反对“顶峰论”,批判林彪大树特树搞个人迷信而行篡党夺权的阴谋,她维护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抵制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违反历史规律的倒行逆施,她忧国忧民,反对社会上的打、砸、抢,为国家的安危忧心忡忡,她对林彪不信赖,怀疑江青历史有问题,反对党章上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当她的这些观点被定罪,并被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她仍威武不屈,志坚如钢。在监狱中每一次审讯,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中写道:“我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我不是反革命,我们从来主张讲老实话讲真话,我越来越感到我没有错。”她认为自己的意见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她坚定地说:“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他被定了罪,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时间和实践将会做出公正的裁判。”这就是张志新同志。

1975年2月,“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下令,决定诛杀张志新。1975年4月4日清晨,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判决书,并问张志新有什么要说的?她坚持要看判决书,遭到无理拒绝,她愤怒地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行刑前,行刑的刽子手怕张志新喊口号,竟惨无人道地将其喉管割断,而张志新仍圆睁双眼,挺立在囚车上,直至走向刑场。她只是微微地颤动着双唇,似乎对“四人帮”有万丈怒火,要把自己心中的冤屈向党倾诉。最后,她不得不倒在罪恶的枪口下。

今天我们在回忆这段惨烈的历史,回忆张志新同志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真诚地希望在发扬党内民主,健全社会法制,构建和谐社会中,张志新式悲壮的事件不再发生,让它永远成为历史!

张志新同志,没有离开我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她将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上。

(责任编辑 萧 徐)

长城 汉字 黄河 长江

● 官伟勋

长 城

近年来,不时有嘲笑长城“无用”的议论。说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死那么多人,挡住外族入侵了吗?修长城实在是个又笨又蠢的主意。有的还把修筑长城归结为我们祖先闭关锁国自我封闭心态的产物。

这是很不公正的。

嘲笑长城无用倒也并非今日始。唐人褚载不就在他的《长城》诗里说过:“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三尺高”吗?只不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熙熙攘攘你来我往内外交流的热络,认同这种嘲笑的又多了一些罢了。

然而,细心观察一下可以发现:自古以来对长城持否定态度的,多属文人墨客,鲜有政治家军事家。相反,在那个北方游牧民族一再崛起,长城一线居民一再遭受残酷侵扰的时代,凡身负边防重任又真懂军事的人,鲜有不重视长城作用的。

长城有用没用要看事实。明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从浙东沿海调任蓟州总兵,一到任,就“修边墙,练军队,边防面貌为之一新”。《明史》称,由于他“边备修饬,蓟门晏然。继之者踵其成法,照着他的既定方针”,数十年无事。”而在他之前,17年间撤了10个大将。都是因边境不守“犯罪去职”的。秦朝当年不也因为“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里,不敢南下而牧马”吗?怎么能说长城没用呢?

有关长城的信息,最早见于《春秋左传》僖公四年所谓楚国筑“方城”的记载。其后有战国时期齐、楚、魏、燕、赵等国在要害地带相继修筑城墙的记录。秦灭六国后,“乃使蒙恬将30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河套以南)”,为阻匈奴南侵,便把秦、燕、赵三国的城墙加以修缮,连接为西起临洮,北傍阴山,东至辽东的城墙。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万里长城”。

北魏、北齐、北周、隋,都曾在北边与游牧民族接境之处修长城。到了明朝正统年间,“鞑靼牧地渐次南

展”。为防瓦剌和鞑靼入侵,嘉靖(1522至1567)以后,在与鞑靼及朵颜三卫交界的地方,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老龙头,“多次坚筑长城”,当时称“边墙”。后来为防女真等侵扰,又往东修至今丹东。之后,随着瓦剌和鞑靼势力的扩大,又修了从宣化、大同到山西一线的所谓“次边”。

不久前许多报刊刊登一条消息,说最新考古发现新疆罗布泊有长城遗址,因此,长城的西端不是嘉峪关,而是再往西500多公里的罗布泊。

没几天,又有消息说,社科院的专家指出,在罗布泊发现的应是烽燧。烽燧貌为墩台,也叫亭,是为燃放烽烟报警用的。它不是连绵不断的墙体,不能叫长城。

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错误。

从根本上讲,长城本是农业民族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而建的。以农为本的民族,春播、夏管、秋收、冬藏,一时不能耽误。一误农时全年无收。因此必须定居以保农时。游牧族群则不然,哪里有水草往哪里去,即所谓“逐水草而居”,而且往往伴随着抢掠以补不足。“虏获财畜”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抢能杀被看作英雄的事业光荣的行为!

有人形容我国北方辽阔的草原是个游牧民族轮番演出的大舞台,一个种族经过征战兼并强大了,便四出征掠,所向披靡不可一世。但不久就由盛而衰,由东往西消失了。然后,又一个种族逐渐崛起,重演一场轰轰烈烈的盛衰剧。由于其地域偏北,气候寒冷,干旱少雨,不时有风雪灾害,所以十分向往南方农业地区的粮草财富,于是便趁秋高气爽草盛粮丰之际“南下而牧马”——抢粮抢草抢妇女孩子,屠杀反抗者。所谓“马前挂人头,马后驮妇女”,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

游牧铁骑,来如狂风从天而降,去如闪电,倏忽间无影无踪。长年定居一地的一家一户的农业民族,对之防不胜防。你集中了强大的兵力,他不来。你撤了,他来了。你再回来,他又走了。他的全部家当都在马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用步兵,难以对付;用骑兵,“一骑士之费,可

贍步兵5人。3万5千骑,抵15万(应是17万5)步。”少了,不管用。多了,久了,“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容斋随笔》176)日子一久,再富再强的国家也拖垮了。为了节约开支,用有限的兵力,实施有效的防御,老祖宗才被迫想出建长城加烽火台这个“笨”办法,以迟滞骑兵的突袭,争取宝贵的集中兵力的时间。一些王朝得以“几十年无事”,靠的就是这类“笨”办法。

由此可知,把长城修到罗布泊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那是一个“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法显传》)的地方。不要说根本不可能调集那么多劳力去那个没水没粮没砖石没柴草的沙漠施工,即使能修,也实在没有值得防御的。墙内墙外都是沙漠,防什么?

这样的一条消息,按说是不该经过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手一再编发出去的。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对历史教学的忽视程度。章学诚说过:“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诚哉斯言!国亡了,记住历史还有复国的希望。把自己的历史都忘了,复国还从何谈起?

不错,长城的确多次被攻破过,但“责任”不在长城。再好的武器工事也要靠人用。长城被破,是由于政府腐败,君昏臣佞残害忠良,自毁长城”。长城是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伟大创造。它是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生动象征!它用令整个世界叹为观止的伟大形象向世人宣示:能创造这等重大工程的民族决不会被打垮!她必将永远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愿我亲爱的同胞不要轻易否定我们祖先的作为。

应予嘲笑的,只能是那些根本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只顾个人享乐大刮民脂民膏的国之蛀虫民之蠹贼!

汉字

汉字的名声也像长城一样屡遭责难。与长城不同的是,否定的声音主要出自近现代,但激烈之程度则远过于对长城。说复杂的汉字,是我国难以消灭文盲全民文化素质难以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导致中国落后于欧美的罪魁。说中国如果也使用拼音文字,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五四”时期的一位著名大学的教授不还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吗?

当时的中国,列强横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整个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识之士都在探求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的原因,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妙

药。各就所学各抒己见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主张。这是很自然的。

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中国人书写用的字还是汉字。于是乎,批评汉字的声浪就几乎听不到了。相反对汉字大加赞赏的声音倒时有所闻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国外。

据1982年5月,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杂志《自然》披露:日、英、美、法、西德5个发达国家的学者通力合作,在共同进行的智力测验中,各自对本国的儿童智商进行检查,结果是:英、美、法、西德的儿童是100;日本是110。在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大部分学者认为与是否学汉字有关。他们认为:“学汉字,使得把握复杂的几何学的感觉特别发达。”

以上的见解并不是个别人的随意见解,而是经过调查研究经过科学推论所提出的看法。无独有偶,在今年2月3日法国《巴黎竞赛画报》上又有一篇《德斯坦谈中国》的文章,也谈到了汉字。他说:“中国人的智商远远高过我们,在美国西海岸的大学里,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有人问他这有什么秘诀吗?他回答说:“他们的教育体系完全以记忆为基础。幼儿园的孩子不是画画、捏泥,而是坐在小课桌后面长时间地学写字,因为他们必须记住这些字。一个人要想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他至少得会1500个字,这是最低限度了。如果想上学,就得记住5000到6000个字。除了死记硬背别无他法。所以自然就需要他们勤奋好学。”(2002.2.3《参考资料》)

汉字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而且是从古到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字——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越来越发展越来越丰富,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所使用——这决不是偶然的。

古埃及的文字早已随着古埃及王国的灭亡而灭亡了。它遗留下来的文字,直到18世纪才被拿破仑带去远征埃及的学者商买臣所破译。尼罗河两岸的人民早已不再使用这种文字了。两河流域的古文字也没能流传下来。有名的赫提文化,它的象形文字用于铭刻和印章,至今没能破译。古希腊迈锡尼文化的线形文字,到荷马时代已无人使用。代替它的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借来的。古波斯大约从大居鲁士时代起,开始用楔形文字书写。但即使在当时,“纯古波斯语的应用范围十分狭窄,只有地方和部落的意义。”印度至今仍有400多种语言。独立后,以印地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其古文字的命运可

想而知。

有人主张中国也统统使用拼音文字。天哪！请想一想，如果当年不是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我国各地都各用拼音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拼出来的文字，不要说广东人看不懂福建、浙江、山西、山东人的文字，就是福建人自己，闽南人也看不懂闽西人闽北人的文字。大军南下到福建剿匪时，部队天天行军非常疲劳，战士们很想知道到宿营地还有多远？在福州刚学了一句：“靠关袄换要鬼里？”（到建瓯还有几里？）翻过一座大山就不管用了！如果全国各地都用拼音，中国恐怕就不是“有40种语言”了，四千四万种语言都可能有的！

幸亏我们有统一的方块字，林则徐的福建话再难懂，他的奏折一上，道光皇帝一目了然。康有为梁启超的老广腔再厉害，他们的维新条陈，光绪皇帝也能看个明明白白。

我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为前朝修史的好传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保留着我们这么丰富这么灿烂辉煌的历史典籍文化著作。不懂汉字就没办法在这个无比丰富的精神宝库里畅游欣赏，无法认识并从中汲取可贵的知识。要把它完全翻译成拼音文字是不可想象的。新版《新华字典》里拼“几”的音就含有150来个汉字，是“几”是“急”？是“鸡”？是“挤”还是“激”、“棘”、“乱”？猜吧！读用拼音拼出的我国古典著作，怕比登天还难！

黄河 长江

一些心怀叵测敌视中国的人，一直在散布一种论调：中国太大了！太可怕了！中国应该分成七块才不会给亚洲与世界造成威胁。

国内个别人士也有一种近似或说貌似而神异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国人口太多面积太大，不如欧洲分成若干个国家，互相竞争会发展得更快些！持这种论调的虽与前者动机不同，但同样是非常错误的，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中国，从古到今，这么多的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几千年来一直顽强地生活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决非偶然，其中必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可以决定或加以改变的。

人们常引用《三国演义》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实际上是分的时间很短，而合的时间则很长很长。

中国之所以分裂不了，不仅是由其人文历史决定的，也是由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决定的。

我国的西端是帕米尔高原。往南延伸是直插苍穹“离天三尺三”的喜马拉雅山。往北有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的阿尔泰山。它们形成一道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天然屏障。我国西高东低，从海拔五六千米以上一直东下到海拔50米以下的沿海，落差之大，为他国所没有。在这落差极大的而又极其广袤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就像两条巨龙，一条黄龙，一条青龙，紧紧地把整个大地各个民族连结在一起。

长江在宜宾以上叫金沙江，从宜宾到宜昌叫川江，从枝城到城陵矶叫荆江，扬州以下叫扬子江。金沙江、川江奔腾于崇山峻岭，汹涌澎湃劈崖斩谷直趋三峡。一过宜昌就进入平原地带，汹涌的江水宣泄不通，形成迂回曲折的“豆腐腰”。汛期一来，江水猛涨，“豆腐腰”也容纳不下了，湖泊洼地沼泽地带就成了分洪之处。洞庭湖周围的农民和所有沼泽地带的居民如果要围湖造田，堤坝高筑，武汉三镇就要“人或为鱼鳖”。黄河九曲，兰州地区已经春暖花开，河套一带还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融化的春水滔滔北去，北端的冰层越积越厚，堤决冰溃漫出河床，茫茫牧场芸芸众生瞬间就会被冰河吞没。上游不节制用水，下游不仅无水灌溉，人畜饮水也成问题。千百年的淤积使黄河成了地上河，上游不治下游治，没用。上游治下游不治也不行。一旦堤决河水改道，就不知有多少郡县多少老百姓淹没于黄泥水浆之中。历代王朝之所以都把治理黄河当作朝廷大事来抓，原因在此。中国自古有“黄河清，天下平”之说，充分说明了治理黄河的重要意义。而要治好长江黄河，一会向东，一会向北，一会向南，流域达2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河，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从整体着手是治不好的。

马克思在论古代社会时说过，在靠长河灌溉为生的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地彼此没有什么联系，只能产生由皇帝统一统治的国家。历史正是如此。古代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我们的黄河流域，盖莫能外。而在“海岸线曲折，多岛屿，河流短小，多港湾”的古希腊则均为实行民主制的城邦国家，号称专制的斯巴达，也由两个王族产生的两个国王管辖，而且其权力还受长老会限制。古罗马也一样，早在公元前510年就建立了共和国。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长江黄河的性格也与众不同。

尼罗河出了苏丹就一直穿行在平缓的沙漠之中，河

水泛滥的季节正好给两岸带来肥沃土壤以迎接耕种季节的到来。也不像北美的密西西比河和南美的亚马逊河。这两条长度都在 6000 公里以上的大河,却几乎全程都在海拔很低的平原上流过。亚马逊河几乎全程都在海拔 200 米以下。而且地近赤道,森林密布雨量充沛。南美的太平洋水系则“源短流急,且多独流入海”。欧洲呢?正如世界地理中说的:“在世界各洲中,欧洲的河流,分布很均匀,河网稠密,水量较充足,多短小而水量较充沛的河流。”这哪里是我们中国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呢?

欧洲之所以能分成若干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能说是与其“多短小而水量较充沛的河流”的环境无关吗?

如今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三峡大坝、京九铁路等为全民造福关系国计民生泽及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不要说经过若干国家协商难以想象,就是在一国之内,如果权力分散,各自为政,再加上土地私有,也就“难于上青天”了!有多少人愿意让他的良田,拆他的华屋,平他的祖坟呢?

黄河长江源头往西到我国的天然屏障之间,是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自古以来他们就与长江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交往。有以货易货贸易,有通婚嫁娶,有亲朋之间的走亲访友,也有互相征战。这一切都说明彼此的需要。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正是在

这种交流融合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内地离不开边疆,边疆也离不开内地,华南华中需要华北东北,东北华北也需要华南华中。合则俱利,分则俱伤!而且必然还会给心怀叵测的外敌提供可乘之机。

认为分成若干国家发展才快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只看一点无视其他的观点。非洲、南美、东南亚、南亚的国家还少吗?这种说法,就像说香港因为是被英国占为殖民地才有其繁荣进步一样是经不起推敲的。当年英国的殖民地多啦!“日不落之国”嘛!凡有太阳升起的地方不就有米字旗吗?可又有几个像香港一样繁荣文明的?

规律就是规律,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昂然屹立于世界,是经过了几千年严峻的考验的。这是由我们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中国过去不可分,今后更加不可分。经济的增长使我各族各地之间交往更频繁联系更紧密,综合国力的增强,使觊觎我们的敌对势力更加不敢轻举妄动。那些指望我国分裂的气急败坏的叫嚣,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顽固反华分子的痴人说梦罢了。中国要统一,中国要发展,中华要振兴,是伟大的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责任编辑 致中)

按需出版 征稿

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引进全新数码印刷设备,为广大作者提供最新式的出版服务——“按需出版”。

按需出版三大优点: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

- 各类论文;● 影视剧本;● 丛书、少量印制的宣传画;
- 个人自传、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
- 单位自用、专业性强、由于量少而用传统印刷无法解决的或市场无法大量销售的图书;
- 已经出版的少量重印的图书。

资金投入:自费。收取标准:32开内文每一面黑白页0.125元(70克胶版纸);彩色页2元(128克进口铜版纸);封面彩色每个6元(157克进口铜版纸);黑白每个15元。装订费:胶订一本10元,骑马订一本2.5元。版式设计、审稿费500元(一次性)。50本以下加收20%。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能出版。分为有书号和没有书号两种,没有书号的不能销售,也就没有定价,可以作为留世或赠送。有书号的在费用上增加6000元(一次性,包括CIP数据和编辑、三审费等等)。费用的文字基数是20万字,每增加1万字加收100元编辑费。

印制质量:上乘,完全可以放心。

要求:需要作者提供齐、清、定的稿样和光盘或软盘一份(包括内文和封面设计,录入排版采用的软件基本没有限制,凡国内现行的均可,封面设计需有书脊和封底)。如是手写稿则另外收取录入排版费,一般每一面4元(32开)校对费每千字每校次1元(负责3个校次)。封面设计如委托我方负责,设计费为800元/个。

作为一种新的出版形式,按需出版主要解决印数在1000册以下的图书出版的困难,超

过1000册的还是应该按传统出版运作。我公司也可为作者联系其他出版社以传统出版方式出版著述。比如为企业、各级机关政府部门及负责人在新华、华龄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北一楼5-203A,邮编:100088,热线:010-62359410(传真同)联系人:张三杰。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欢迎来电来函联系。本广告一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炎黄春秋杂志社 举行编辑工作座谈会

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工作座谈会于2005年4月15日在京举行。会议邀请了部分在京顾问、理事、特邀编委及作者，会议由副社长方实主持，社长杜导正对炎黄春秋杂志社一年来的工作作了汇报。杜润生、李锐、龚育之、宋木文、凌云、丁守和、范敬宜、鲁诤、李琼、于光远、刘志琴、姚力文、冯征等同志作了发言，他们在肯定《炎黄春秋》所取得成就的同时，对编辑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希望继续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秉笔直书的办刊方针，继续弘扬中华炎黄文化，与时俱进，争取将刊物办得更好。

出席会议的同志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仲廉	马沛文	方 隤	王俊义	王金凤
王戎笙	王强华	王 才	冯 健	冯东书
华怡芳	纪希晨	许人俊	李 乔	李 普
李 犁	李维民	李耐因	张天来	张广友
张培森	张思之	张惠卿	陈四益	陈大斌
陈 模	杨明伟	杨克现	杨天石	杨兆麟
何 方	何家栋	吴 象	吴明瑜	杜明明
苏双碧	邵燕祥	谷秀敏	陆亨俊	严如平
林 耀	季 音	钟沛璋	赵淮青	高 放
袁 鹰	顾永高	顾 骧	章立凡	彭 迪
雷 颐	薛攀皋	戴 煌	魏久明	

本社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

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汪精卫卖国文字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谜

抗战时一场气象情报争夺战

长城 汉字 黄河 长江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